

讀書偶評

程杏



507.8  
842-5=4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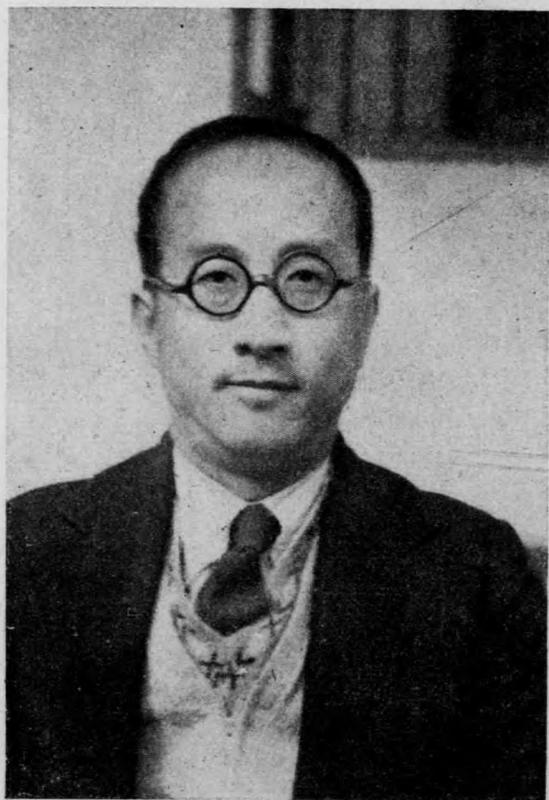
讀書偶評

陸  
奎

心  
沽  
存  
書

A510251





韜奮先生寫本作書時攝

一月四年七三九一

倫敦的博物院圖書館(即 British Museum 的 Reading Room)

藏書之富，在世界佔第一位，其中手抄書稿一部分，尤有非常可貴的收藏。聽說如把書櫥的長度加起來，可達五十英里之遠。在這裏英國出版的大小書籍都有，各國的書籍也很多。無論研究什麼問題，可以一翻總目而知道關於該問題的英文書籍，幾天就可以把該問題的一切文獻整理個大概的頭緒出來，然後再一步一步地研究下去，給與讀者以很大的便利。地板，桌上，都鋪有橡皮，靜寂無聲，真是看書的好地方。世界及英國的學者，不少都是這圖書館的產物。卡爾和恩格斯都會在這裏作過長時期的研究。據說伊里奇有一次因要研究哲學裏某一特殊問題，特爲跑到這裏探討了三個月。我覺得這個圖書館確是最值得留戀的一個地方。我並希望中國在不久的將來也有無數的這樣的圖書館出現。

韜奮記於江蘇高院看守所

廿六，六月廿三日，在第二次開審前三日。

## 目次 (小標題下括弧內數字指頁數)

開頭的話.....一

小小緣起(一)——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二)——讀書尙友(三)——威爾斯的幾句話(六)

政治組織的理論和形式.....九

導言(九)——希臘城市國家(九)——古羅馬(一二)——中世紀(一三)——霍布斯(一三)——洛克(一五)——孟德斯鳩(一七)——盧梭(一八)——法國革命(二一)——英法的比較(二三)——哲學的激進派(二六)——邊心理論(二六)——黑格爾和卡爾(二九)——達爾文理論對於政治理論的影響(三三)——人類學和心理學(三五)——蘇維埃制度(三七)——法西斯主義(四二)——對巴立門主義的挑戰(四五)——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立(四五)

卡爾研究發凡

..... 四

一·卡爾生平の速寫

投身新聞事業(四九)

二·卡爾の一般見解

階級の社會(五四) 經濟倫理和法律觀念の相對性(五五) 卡爾的發展

觀念(五六)

三·歷史の唯物論

觀念論和唯物論(五九) 由觀念論過渡到唯物論(六〇) 唯物史觀(六

三)

四·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的三個學派(六五) 卡爾的主要問題(六七) 各種學派の同

答(六八) 利潤率下降の傾向(七〇)

黑格爾和辯證法

..... 七

世界和思想(七三) 辯證法(七八) 辯證法和社會主義(八五) 辯證法

和觀念論(八七) 新舊兩派(九四)

黑格爾對於卡爾的影響 ..... 九七

絕對(九七) 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九九) 唯物史觀的抽象理論和黑格爾

哲學(二〇〇) 唯物史觀的具體理論和黑格爾哲學(二〇七)

卡爾所受的其他影響 ..... 三三

人物和時代(一一三) 兩件要事(一一三) 李嘉圖和卡爾(一一五) 臨

陣的呼聲(一一九) 綜合的體系(一二〇)

卡爾的理論體系 ..... 三二

唯物論的誤解(一二一) 哲學和經濟(一二二) 資本經濟生產的特點

(一二三) 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一二三) 社會關係(一二五) 勞動和

財富(一二六) 價格和價值(一二七) 資本主義的利潤(一二九) 觀

念(一三一)

卡爾的歷史解釋 ..... 三三

發展的法則(一三三) 偉人和領袖(一三五) 階級(一三六) 辯證法和

經濟時代(一三八)

唯物史觀的解釋.....一四一

唯物辯證法.....一四七

    辯證法的實際運用(一四七)    辯證法的差異(一五〇).....一五〇

辯證法和將來的社會.....一五三

    形式論理學和動的世界(一五三)    人類歷史的動力(一五四)    人類  
    新歷史和辯證法(一五五).....一五五

卡爾的經濟學.....一五七

    事實和理論(一五七)    資本的特性(一五八)    李嘉圖的價值論(一六〇)  
    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一六一)    剩餘價值(一六二)    商業資本·金融  
    資本工業資本(一六四)    地租(一六五)    剩餘價值和利潤(一六八).....一七一

驅趕的工作和被驅趕的工作.....一七二

關於價值論.....一七五

    價格和價值(一七五)    抽象的人類勞動(一七七)    對價值論的反對(一七八).....一八二

恩格斯的生平和工作.....一八二

- 商人和哲學(一八二) 恩格斯和卡爾(一八四) 異趣(一八六) 雜鄉(一八七) 回到舊業(一八九) 高尚的犧牲(一九〇) 軍事文章(一九三) 困苦中的支持(一九四) 資本論的商權(一九五) 暫時的疏遠(一九七) 結婚(二〇〇) 拋棄商業(二〇〇) 遷到倫敦(二〇二)……………二〇五
- 恩格斯的自白……………二〇五
- 伊里奇的時代……………二〇七
- 力量的基礎(二〇七) 資本主義和新興勢力(二〇八) 思想和哲學(二一〇) 危急的階段(二一一) 帝國主義時代(二一五)……………二一七
- 伊里奇的生平……………二一九
- 一·基本的概念和工作的基礎
- 三十年的準備工作(二一九) 個人方法與大眾方法(二二二)
- 第一任務(二二三) 混亂和軟弱(二二六) 不容情的猛攻(二二七)
- 二·多數派和少數派
- 正確路線的領導(二三〇) 多數派和少數派(二三二) 分裂的問題(二三三)

三三三)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二三六) 再接再厲(二三九)

三·世界大戰和革命的國際主義

重要關頭(二四一)

四·俄國革命的勝利

二月革命(二四四) 伊里奇的滯歸(二四八) 十月革命(二五三) 鞠躬

盡瘁的最後階段(二五六)

伊里奇的理論.....二六一

理論和現實(二六一)

一·一般的世界觀

革命的辯證法(二六二)

二·我們時代的理論——帝國主義

烟幕(二六三) 新時代的特質(二六五)

三·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

最重要的鎖鑰(二六八)

後記.....二七一

插圖

柏拉圖	一〇
亞里士多德	一一
霍布斯	一四
洛克	一五
孟德斯鳩	一七
盧梭	一九
法國革命(一)	二二
法國革命(二)	二三
法國革命(三)	二三
黑格爾	二九
達爾文	三三
卡爾	三〇
英國工業革命(一)	三四
英國工業革命(二)	三六

李嘉圖	120
恩格斯	121
伊里奇	122
十月	123
伊里奇被刺	124
伊里奇的死	125

## 開頭的話

小小

緣起

這本讀書偶譯是撮譯我在倫敦博物院圖書館裏所寫下的英文筆記的一部分。在看書的時候，遇着自己認為可供參考的地方，幾句或幾段，隨手把它寫下來，漸漸地不自覺地積下了不少。近來略加翻閱，撮出其中的一部分，隨手把它譯出來，在一些基本的觀點方面，也許可供有意研究社會科學者的參考。

這只是一本漫筆式的譯述，不是有系統的社會科學的書，但是也略為有一點貫串的線索。第一節可以算為簡單的「導言」或「緒論」（其中偶有補充或糾正的地方，可參看譯者的附註。）後面接着的是卡爾的生平和理論，附帶談到他的思想所由來的黑格爾；再後的是恩格斯的生平和工作；再後的是伊里奇的生平和思想。當然，這本書對於這些思想家的任何一個，都不能完全包括他們的一切，乃至某一部分的一切，只是撮

述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幾個要點而已。

此外還有一點，這本書所撮譯的，多為其他作家對於這幾個思想家的解釋；要作進一步的研究，還要細讀他們自己的著作，本書不過是扼要的『發凡』罷了。先看了『發凡』的解釋，對於進一步的研究也許不無小補。這是譯者所希望能夠貢獻的一點微意。每篇來源的原著書名，都附記在每篇的末了，以供參考。

理論和實踐  
統一的  
一助

理論和實踐是應該統一的，所以我們研究一個思想家不能不顧到他的時代和生平。尤其是像卡爾和伊里奇一流的思想家。我們要了解卡爾怎樣運用他的辯證法，必須在他對於革命運動的參加中，在他對實際問題的應付中，在他的經濟理論、唯物史觀以及關於國家和社會的哲學裏面，才找得到；關於伊里奇也一樣，他的一生奮鬥的生活，便是唯物辯證法的『化身』，我們也必須在他的實踐中去了解他的思想。

讀書  
尚友

孟子說：「讀其書尚友其人。」這句話很有意思。革命的思想家的奮鬥生活，常常能給我們以很深刻的「靈感。」我每想到卡爾和伊里奇的艱苦卓絕的精神，無時不「心嚮往之。」

卡爾於一八三六年在柏林大學時，努力研究哲學、法律、歷史、文學等，在他所做的詩裏面，為我所最喜誦讀的有這樣的一段：

“Ne'er can I perform in calmness

What has seized my soul with might,

But must strive and struggle onward.

In a ceaseless, tasteless fight.”

詩是最不容易譯的，我現在姑且勉強譯出它的大意如下：

我永遠不能冷靜地做

那些以偉大力量抓住我心靈的事情；

在不斷的不歇的奮鬥裏，

我必須向前努力和鬥爭。

這段詩的大意是勉強譯出來了，但是原詩的精神——充滿着邁進奮鬥的英勇精神，——是很難傳達出來的。這不只是一段詩，這實在是卡爾一生的實踐生活的象徵。

卡爾在倫敦努力著述時的窮苦，只須舉一件事，可以概見。他有一次爲着要買紙來寫關於康敏信徒在科倫 (Colonia) 被審判的文章，竟不得不把最後的一件外衣送到當舖裏面去！

卡爾的母親說過幾句有趣的話，她說：『假使卡爾能得着很多的資本（按指金錢），不是寫着很多的資本（按指資本論），那就好得多了。』

關於伊里奇，我最感到奇異的是，以他那樣的奔走革命的忙碌，還有工夫寫了許多精明銳利正確的著作，後來仔細研究他的生活，才知道他有許多著作是在流離顛沛驚濤駭浪中寫的；是在牢獄裏，是在充軍中，是在東躲西匿幹着秘密工作中寫的！

伊里奇的政敵，看見他的一點不肯退却的奮鬥，對他簡直無可如何！孟塞維克派的丹恩（在本書裏會提過他的名字）甚至希望他早死！不但存之於心，而且出之於口，被伊里奇的老友克蘭諾夫斯基（Kerzhanovsky）聽到了，大為不平，質問丹恩說：『怎麼一個人就能破壞全黨？難道他們許多人都沒有能力來對付這一個人，以致要叫「死神」來做從犯？』丹恩回答得怪有趣，他說：『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那樣：每日的全部二十四小時都忙於革命，除了革命的思想以外，沒有別的思想，甚至在睡夢中所看見的也。只有革命看你對於這樣的一個人有什麼辦法！』（見 Lenin: A Biography, by

Ralph Fox, pp. 148—149）

這在伊里奇的政敵，算是恨他罵他的話，由我們讀起來，反而覺得是敬他讚他的話！伊里奇在將被暗刺以前，最後說了一句話，值得我們永遠的紀念。在一九一八年，當時伊里奇是革命政府的最高領導者，但他在忙於無數的會議，忙於立法、外交，以及軍事的種種工作之外，還要常常勉強抽出時間到各工廠去，參加各廠工人的會議，藉此接近。

大衆。他在被刺的那一天下午（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還到莫斯科的米克爾遜工廠（Michelson factory）去參加會議，他在這會議裏演說詞的最後一語是：『勝利或死亡』（Victory or death）即不向前努力求勝利，就只有死路一條。這是伊里奇當時爲革命而奮鬥的精神，也是我們今日爲民族解放和人羣福利而應有的奮鬥精神（這段事實見 Lenin: A Biography, pp. 279—280）

他當時說完這句話，剛跑出廠門，將上車時，就被刺客槍擊，這事在本書裏也提到。這裏不多說了。

威爾斯的這句

最後關於這本書，我記起英國作家威爾斯（H. G. Wells）在他的名著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 一九三二年修正本）的導言裏，這樣

提到他自己：『這本書的作者（指威爾斯自己）由於他的天性和選擇，都還夠不上學問家所得的敬意，如同他遠夠不上得公爵的頭銜一樣。正因為他有這樣的情形，使他能夠使大衆對歷史感覺興趣，而不致犧牲他的尊嚴和高貴，不致引起那些被公認的權威

所易惹起的敵視的批評。……他能夠不怕難爲情地參考標準的著作和尋常可得的材料。『威爾斯的意思是說他是個小說家，原來不是歷史家，不必顧到歷史專家的架子，所以他不妨寫這通俗的歷史。威爾斯是世界的著名的作家，（雖則他的關於政治的意見，我却未敢恭維，）他的這本書是世界的名著：我無意把他來自比。我所以引這幾句話，是在表明我更夠不上什麼學問家，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新聞記者，我所以要研究一些思想，是爲着做新聞記者用的，更不怕『犧牲』什麼『尊嚴和高貴』。或許有些朋友也和我一樣地忙於自己的職業，要在百忙中瀏覽一些關於思想問題的材料，那末這本書也許還可以看看，此外倘若抱着什麼奢望，那是要不免失望的。

韜奮記於江蘇高院看守所

被羈押六個月後的廿六年六月二日下午



## 政治組織的理論和形式

導言

自從有了政治理論以來，人們總想運用這理論來回答兩個不同的問題：一個是怎樣能夠把社會，或是這個社會，或是那個社會，組織得最好，並且管理得最好？還有一個是社會怎樣會存在，或是怎樣能夠存在？政治哲學是集中於研究第二個問題：政治學是集中於研究第一個問題。其實這兩個問題時常有着密切的聯繫，時常是併在一塊兒的，並沒有可以分開來的歷史；不過在研究的時候，有的時候特別注重這一點，有的時候特別注重那一點罷了。例如卡爾的理論和由卡爾的理論引伸出來的政治主張，都是把理論的和實踐的研究混合在一起，彼此是分不開的。

在有意識的政治理論剛在萌芽的時候，古典時代的希臘人對於政治上心理的基礎，認為有着重要的關係。柏拉圖 (Plato, 427—347 B.C. 希臘哲學家) 希臘城市國家



柏拉圖

家)的心理學就是他的政治學,他的政治理論也就是他的心理學,這是讀過他所著的共和國的人們所感覺得到的。依柏拉圖看來,人類的心靈有三個部分:有的是能知的(屬於哲學的),有的是充滿着熱烈和勇敢(屬於精神的),有的只不過尋求肉體的滿足(屬於體慾

的)——他認為在人類社會構造裏面,如果這社會構造是建立得適當的話,也有着和這三種相適應的部分。柏拉圖所說的「哲學家·王」(“philosopher-king”,即由哲學家來做統治者)就表示在政治的結構裏面,精神和慾望都有受知識統治的必要。換句話說,在一個「共和國」裏面,監護者的統治也含有這同樣的原理;在監護者的下面有着勇敢而熱烈的軍隊,有着只知滿足體慾的人民,這些人民是要很馴服地做着這社會裏的生產工作。柏拉圖的概念,在實質上是貴族的。他把民主方式的徵求同意和平等權利的說法,一筆鈎消。他的理由是在一個社會裏面,如同在一個人自己的心靈裏面一樣,

最好的部分應該爲着全體的利益而執行統治。他並且選用他的「機能」的說法來維護他的這個信條。這「機能」說法的內容是這樣：每個人依照他的心靈裏面三部分的組織種類，在社會組織裏面有着他所應有的相當的機能。哲學家的機能是來統治，因爲他知道什麼是最好的。其他的人便沒有統治的權利，因爲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最好的。

柏拉圖的繼承者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 C. 希臘哲學家)常被人們



德多士里亞

認爲是政治學之父，如同他被人認爲是其他好多科學的開路先鋒一樣，他所彈的調兒却另有不同。柏拉圖是要在思想上建立一個理想的共和國，使它適合於人類精神的真正的需要。亞里士多德只是在已有的政府形式和方法裏面採用最好的；他雖然知道一切都不是完善的，但是他要根據對於各國制度的充分的研究和比較，把什麼是較好的，什麼是較壞的，分別出來。亞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裏主張『城市國家』(City-state)，他認爲這是文明的最高形式，認爲這是使得

希臘人和當時構成世界其他部分的『野蠻人』所以不同的所在。他所認為最好的國，有一點和柏拉圖的一樣，也是貴族的，那就是他不許奴隸、或做手工的人們，有做公民的權利。但是在公民的範圍內，他却主張政權應有頗為廣大的分配；他所尋求的憲法是個混合的憲法，裏面含有貴族的成分，也含有民主的成分。

但是亞里士多德所以可算為一個政治理論家，並不是因為他描述了最好型式的『城市國家』，却是因為他堅執地主張『人依天性是一個社會性的動物』，因此人在社會裏生活是自然發生的，並不是由於僅僅人造的接觸或強迫，而且因此社會本身並不是真正需要解釋。在社會裏生活是一個事實，發生於人的天性；這種社會生活，只是依着人類在知識和文化方面的向前進步，由家族時代發展到完全長成的『城市國家』。

羅馬也是開始於一個『城市國家』，漸漸地成爲一個世界帝國的皇城。

羅馬人最偉大的所在，是統治術的實行者，因此他們所遺留給世界的政治理論，也是很實際的形式。羅馬人所遺留給我們的，沒有關於政治學的偉大的著作，像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樣，但是他們却遺留下來了一個影響永不磨滅的紀念碑——  
羅馬法。

中  
世  
組

中世紀（約自一〇〇〇年至一四〇〇年）的政治理論，大部分是建築在羅馬的基礎上面。它由羅馬採用了世界觀念；它由亞里士多德也採用了這

樣的觀念，人要達到他在生活上所需要的種種目的，社會在他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在政治方面的表現，他們利用聖經裏所顯示的上帝的意志，和天主教堂所發出的感人的說法，增加國家的一切權威，要求人民的服從。中世紀的有意識的政治思想，是把宗教做外衣，同時却把從亞里士多德和羅馬法裏面引伸出來的觀念，利用來維護教堂的勢力。

當英國國內政治發生衝突的時候，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  
霍布  
斯  
1679）英國哲學家）袒護君主制度，但他却極端反對神權主義，發揮他的著名  
的主權論，他的這種理論是根據於「社會契約」。

依霍布斯看來，社會的第一需要是秩序，因此需要具有絕對權威的力量來強使社



霍布斯把社會看作一種人造的會。有着安定的秩序。霍布斯認爲人類的自然的情況，是彼此互相搶奪的情況；他認爲人類的自然的情況，是彼此互相搶奪的戰爭，必須在一個社會裏，用強力來維持秩序和正義，才是他們逃出這個紛亂情況的唯一途徑。

君生的神權主義被打倒之後，絕對主義失去了理論的基礎。（譯者按：絕對主義即主張政府應有絕對的權力。）霍布斯雖又給與絕對主義一個新的凡俗的基礎；但是他所倡導的絕對主義，並不一定屬於一個單獨的統治者，也可以屬於社會的政府，不管這政府是採用了什麼形式。霍布斯雖更贊成君主制度，認爲這制度在安定社會秩序方面是易於更有效率；但是他也覺得，他的主義不但可以用來說明一個君主政府應該有絕對的權力，而且同樣地可以用來說明一個貴族的或民主的政府也應該有絕對的權力。他的學說的要點是：無論政府採用任何形式，這政府都必須有絕對的權力來統制一切人民。

洛  
克

的哲學家。(譯者案：一六八八年革命爲人權與君主的神權之爭，結果人權勝利，英國巴力門確定它的強固的地位。)洛克的主張，是要限制政府的權力，以爲政府的權力應該限於保障人民的自由和財產。他認爲人是社會的自然的，因此他的主張所根據的是和霍布斯很不同的心理學。他的政治學原理



洛 克

是引伸於上帝和自然的法則，不像霍布斯那樣，政治學原理是引伸於人類理性的行爲，把人從自然的範圍及狀態中移出。但是不管有着這樣的異點，洛克還是有許多要靠霍布斯的「社會契約」的理

論，若沒有霍布斯的理論做基礎，未必能夠得到那樣的結果。

誠然，洛克把社會和政府分清楚，這是霍布斯所未會做的。洛克雖認爲社會的構成是根據於人們的契約；但以爲這社會的持續，是由於人們繼續同意於這契約的存在。依

霍布斯的說法，人民一次建立了握主權者（如君主），便永遠把他們的一切權力都轉移並讓給他和他的繼承者。這樣，成立契約的行爲只是建立政府。到了洛克，這理論便改變了它的內容。依洛克的說法，人民並不是永遠把他們的權力讓給統治者，人民仍然是握主權者；在任何時候，如果他們所建立的政府不能忠實於他們的付托，他們永遠有撤換和廢除這個政府的權利。因爲主權既是仍然握在人民的手裏，而在人民手裏的這主權，是絕對的、無限制的，所以對政府的權力儘可加以限制，要限制到怎樣程度，儘可以隨你的便。這樣一來，霍布斯的絕對主義竟做了洛克的和他很不同的理論的骨架！洛克的理論是主張有限制的立憲的政府，這政府的義務是要做財產權利的保護者——這是英國一六八八年革命的實際的成功，在這裏只是用理論的說法把它表述出來罷了。

自從一六八八年以後，英國便安定於貴族的政府，擁着一個有限制的立憲的君主，做它的徒有名義的首領。因爲有了這樣實際的解決之後，有好久的時候，政治理論的研究趨入了靜默的狀態，或只是枝節的討論，不很注意基本的方面了。

但是這却不是說在十八世紀初葉，人們真正地漠視政府的形式，只是覺得政治的威權太穩固地安定在貴族的手裏，它的性質不值得多大的辯論罷了。

政治理論的研究，在十七世紀的時候原以英國做大本營，這樣一來，便經過海峽，轉移到法國方面去了。



鳩斯德孟

孟德  
斯鳩

洛克的著作對於歐洲大陸有很大的影響；法國的哲學家孟德斯鳩（de Montesquieu, 1689—1755）一方面重新採用亞里士

多德的研究法，把他的研究根據於古今實際制度的比較和分析，不把政治理論看作『先天的』（註）原

則；一方面對於英國由一六八八年革命所遺下的制度，發生熱烈的讚美。其實孟德斯鳩

譯者註：『先天的』原文為 *a priori* 是指以在先假定的原則作推理的根據，即與經驗無

關之意。

可算是第一個近代的政治科學家，他的工作最後使政治研究轉了一個新的方向。由於他的倡導，產生了許多研究實際憲法的政治學的學者。

但是孟德斯鳩所以使人不忘的，多半還是由於他的分權的學說。他的這種學說不久就在美國的憲法裏面發生很大的實際的影響。他在法律的精神一書裏面修正了洛克的意思，把政權分爲三部分——立法，行政，和司法；他宣言這三種權力應由不同的機關各個獨立地執行，認爲這是保障政治和人民自由所必須的。曾經有人指出，孟德斯鳩雖以爲他的學說是發源於英國的憲法，其實他把英國的憲法解釋錯了。但是他的學說在下一世紀的政治史裏仍有着很大的勢力。

盧

梭

緊接着孟德斯鳩便是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法

國哲學家，他用着一種很不同的方法。盧梭自己就把他的方法和孟德斯鳩在法律的精神裏所用的方法，很截然地分別出來。他說：他不像孟德斯鳩那樣，只不過是具體事例的編纂者或比較者，他回轉去用『先天的』方法；要確定基本的原則，作爲一



盧梭

切健全的政治行動和組織的基礎。他回轉去採用了一些霍布斯和洛克的意思。他用『社會契約』的學說，作為社會的根源和存在的解釋，並從霍布斯採用他的主權的觀念，認為主權是不可分的，是無限制的，認為當

『社會契約』成立的時候，主權在社會裏面就發生了。盧梭又從洛克採用了主權和政府應有分別的說法，認為最高的主權仍在全體人民，政府不過是一種引伸出來的威權，要服從握有主權者的人民的意志。但是盧梭和洛克有一點不同，盧梭主張握有主權者的人民應主動地進行社會的工作，對於政府的工作不是僅有着被動和靜默的態度。這樣一來，在盧梭的手裏，這政治理論根本上成爲民主的主張。全體人民不但在名義上是統治者，在事實上也是統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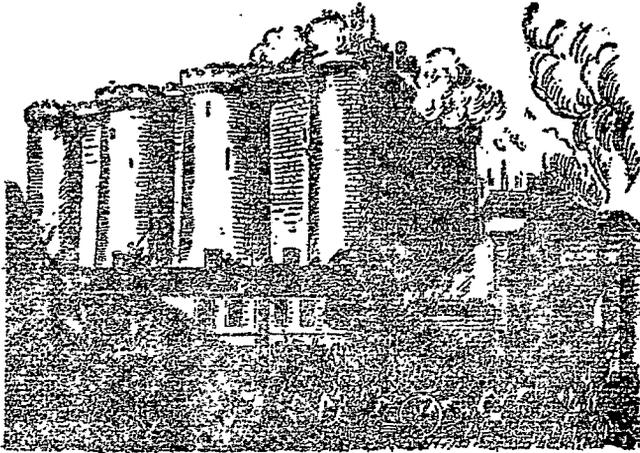
盧梭不贊成握有主權者的人民是可以採用代表制（或代議制）的。這樣，人民勢不得不替自己直接執行立法的職務；而這種辦法，很顯然地只有在一個小得可以使全

體人民聚集起來開會的社會，才行得通。盧梭自己是日內瓦的一個公民，這樣又使我們回到『城市國家』，把『城市國家』認為是唯一一種類的社會，必須在這種社會裏面，才能夠實行『社會契約』的條件。

也許有人覺得，盧梭的這樣的學說，要在十八世紀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和已在逐漸長成的帝國裏面提倡，恐怕很難得到實際的效果吧；但是在實際上，盧梭的著作却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因為人民從盧梭的政治理論所學得的，不僅是平民的主權理論，並且也得到民主政府的理論。他教他們把人民的意志看作政治活動的唯一正當的根據；他的『一般意志』學說，雖然在許多關係上使人不明白，但是却給與政治思想一個新的轉向；因為這種學說特別注重一般的意志力，所以人們把它作為政治上的創造力，人們雖沒有遵從盧梭的命令去恢復城市國家；但是盧梭的學說却鼓勵他們把民主主義作為政治制度的基礎。

例如當美利堅殖民地對英國革命（一七七六年）要替他們的獨立和憲法尋求

## (一) 命 革 國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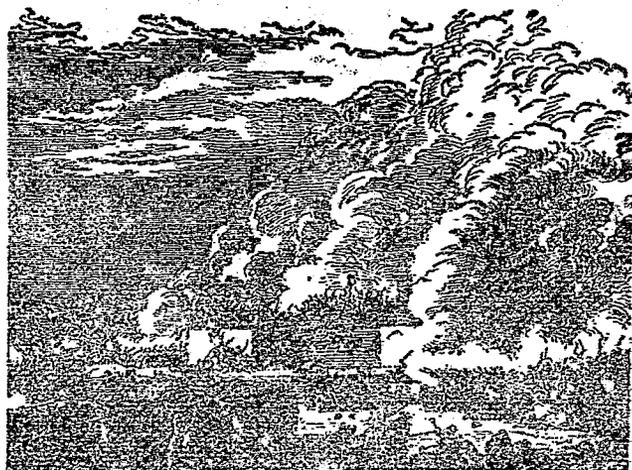


獄蒂士巴佔攻動暴民市黎巴日四十月七年九八七一

一個理論的基礎，他們雖大部分根據孟德斯鳩對於英國憲法的解釋，構成新共和國的形式和辦法；但是他們的最重要的原則，還是大部分採自盧梭的社會契約。最先使積極的民主主義成爲世界政治上一個活的學說，這實在是在盧梭的功績。

法國的憲法，是根據孟德斯鳩的分權學說，洛克的國家的職務在保障自由和財產的主張，以及盧梭人民應有積極主權的說法。美國的憲法剛在這樣安定下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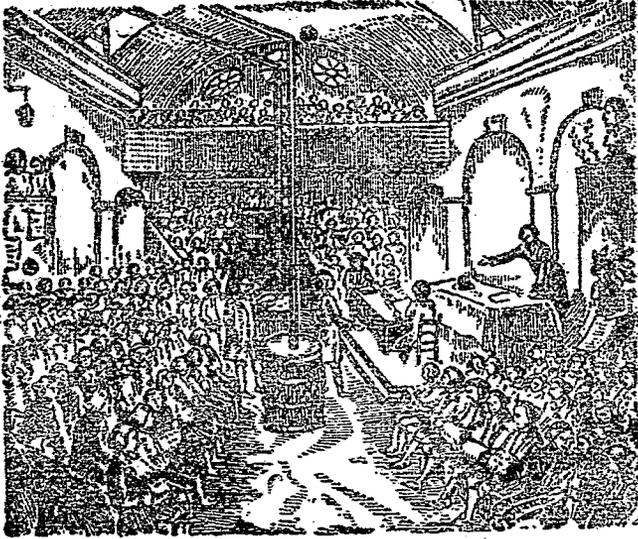
(二) 命 革 國 法



殺 屠 的 野 田 斯 爾 巴

時候，更偉大的革命便在法國爆發了（一七八九年）。於是全歐陷入了戰爭，對於政治和人類權利的最重要的原則，又發生了深刻和激烈的爭辯。人權和公民權的宣言的觀念和爭點，實引伸於孟德斯鳩、洛克和盧梭，如同美國的憲法一樣；但是革命的法國，正和「自由、平等、博愛」的敵人們周旋掙扎着，不久就不得不拋棄分權的辦法，趨向於政治威權的積極的和絕端的集中。當法國大革命的進行期間，使法國和全世

## (三) 命 革 國 法



形情的會開部樂俱賓柯雅在黨命革

界崇拜法國的人們得到最深  
 印象的，是盧梭主義，而不是洛  
 克和孟德斯鳩的學說。同時盧  
 梭主義，因為堅執主張社會的  
 主權是無限的，也替這個剛成  
 立的、受着威脅的共和國的軍  
 事領袖拿破崙，開闢了獨裁的  
 途徑。

英法  
 的  
 比較

英國在一七八

九年後，未曾隨着法

國的革命例子，這倒不是完全  
 地、或主要地、由於壓迫的勝利。

這兩個社會的全部結構和精神，有着基本上的差異。法國在大革命以前是一個專制君主國，在君主之下有個貴族階級，這貴族階級享受很大的權利，但卻沒有政權。這貴族階級不許當時的新興階級所謂「新人」的加入，雖則這些「新人」在商業或銀行業上發了財；而且貴族階級的特別權利使苛稅增加，橫徵暴斂，農民負擔的困苦，幾乎難於忍受。苛捐雜稅所以特別繁重，大半也因為軍費的繁重，這軍費是用來支持所謂國家的勢力和尊嚴的；此外並因為特權階級獨得免稅，更使捐稅加重，不但一般人民感到負擔的繁重，工商業也同樣地感到負擔的繁重。結果是新興階級的「新人」們，不滿於現狀的潛伏的領袖，都不被吸收於統治階級裏面去，却被縱任着在外面和飢餓的農民，城市裏震怒的工人混在一起，共同聯合起來革命！

在別一方面，英國的貴族不但享受權利，而且還有權力；並且還表示有相當的聰明，既不完全避免捐稅，也不拒絕「新人」的加入。在十八世紀的全部時期裏面，英國的貴族階級總是很沈着地容納下一階級裏面的擁護者；容納的方法由於彼此通婚，並直接

准許商界和金融界的「新人」加入統治階級。在當時有許多人口減少的市鎮，選舉的時候，縱任有錢者購買，由此使富有的商人以及其他的富人們也得有機會鑽進巴力門（國會）和擁有土地的階級中人混在一起，參加政權。這樣一來，便使英國的貴族立刻有了大的力量和大的適應性。在英國，沒有像法國那樣，縱任一切不滿意於現狀的種力量集中起來反對政府。因為這個緣故，法國有了大革命，而英國却在一世代中抵抗這樣的大變化之後，滿足於一八三二年的改良律。

英國做了「巴力門式的貴族制」的先鋒之後，隨着柔和地，一步一步地，溜入「巴力門式的民主制」這巴力門式的民主制，在十九世紀，竟成了世界上進步的各國政府的特色。一八三二年的改良律只不過把選舉權給與資產階級；至於勞工階級，還等到一八六七年和一八八四年的新律。但是自從一八三二年以後，英國所朝着走的方向，很顯然地是根據於普選的巴力門政府制度。這制度，直到一九一八年對婦女選舉也護步之後，才算完備；從那時以後，巴力門式的民主制的本身，又受到新的政府形式和理論的威

了。

哲學的

激進派

英國是由貴族制漸漸地演變到民主制，這種漸變所根據的理論，並不是由於盧梭的信徒，或法國革命的製造者所供給，却是由於一個思想學派叫做『哲學的激進派』所供給的。這學派的始祖是邊沁（Jeremy Bentham, 1764—1832

英國法理學作家。）

邊沁

理論

邊沁理論是在十九世紀中對於英國的政治思想和行動有最大的最有勢力的影響。邊沁和他的信徒（實利主義派或哲學的激進派）用不着什麼

『社會契約』用不着什麼天賦人權，也用不着什麼『先天的』判斷；只用得着他們自己的對於人性的特別的見解。邊沁一派的人認為政治權利的唯一根據是便利，他們的民主的主張只是把這個做基礎。便在事實上，便利或實利，當然也要有一種『先天的』判斷標準；關於這一點，邊沁主義者把『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作為政治的目的；可是邊沁主義者由這樣的說法所下的結論，却認為任何人的幸福應該和任何其他的人的

幸福同樣地看重；他們接着又認為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各個男子和女子的個人的幸福，並不是個人所組成的社會全體的幸福。這樣一來，邊沁一派人所主張的『先天的』學說，便含有民主的個人主義；他們的實利概念，也只有在這樣簡單的假定之下，才有實行的可能。（譯者按：在剝削制度之下，每個人的幸福根本就不是同樣的。）

他們對於舊的特權和束縛的攻擊，却替資本主義的發展，排除了障礙，盡了清道夫的任务，雖則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可是他們所主張的『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到了時期成熟的時候，也能被轉到建設性質的效用。在十九世紀的中葉，彌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英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便改變了它的方向。

哲學的激進派和他們的政治的友軍（孟徹斯特學派和該派的繼承者，都主張自由貿易和放任主義的），很勇猛地推動英國完全接受放任主義的福音。隨着工業革命而俱來的經濟制度，經過亞丹斯密士（Adam Smith, 1723—1790）英國經濟學家）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英國經濟學家）的觀察，這些維多利亞時代的

學者們便以為要推進人類的幸福，最好的辦法是力勸國家放任經濟的情況，讓它循着自己的途徑前進。這些維多利亞時代的學者們有一點和洛克相類：他們都要限制國家的活動範圍，讓私人的開創力由此得到自由的發展。以便利為前提的實利主義，有它的缺點，也有它的優點。倘若工、商、業的放、任、主、義是發源於這一派的學說，那末社會的改良運動，在某種限度內，也可以說是發源於這一派的學說。因為，試舉一個例子，調查了英國的人民健康和公共衛生的情況之後，勢不得不想到怎樣執行改良的方法，來增加人們的幸福。在實際上，放任主義的機構還未完備以前，英國對於工廠的視察，早就實行干涉了，公共健康的立法和其他相類的社會正義的計劃，也相繼地實行了。

這種種在彌勒的著作中都特加注意到，也就是構成邊沁主義的福音在建設方面的結果；有許多近代最好的社會的立法，都可以追溯到這一派學說所給與的影響。但是這類新式的建設性的國家干涉，總是以可見的必要為根據。依邊沁主義者的主張，他們的前提，對於什麼事都要採取放任的政策；干涉只是在不得已時才用，只是在私人事業

濫用職權，已有明確證明的時候，非由國家的行動出來補救不可的時候，國家才可以出來干涉。邊沁主義者到最後仍然是個人主義者，一般地說來，他們都相信經濟力的自由作用能增加社會的幸福。

黑格爾  
和卡爾

當這個時候，在歐洲大陸的政治思想現分道揚鑣，另依着很不同的路線發展着。歐洲在革命戰爭之後安定了下來，佔優勢的學派有一個時候是輪到



爾 格 黑

黑格爾主義者。這個學派是黑格爾 (Georg Wilhe-

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德國哲學家)

由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德國哲學

家) 發展出來的，而康德又是由盧梭發展出來的。這

一派和邊沁所領導的實利主義者剛剛相反：英國的

實利主義者主張放任和私人的開創，黑格爾的學說却主張國家的力量和權威，認為個人要求得自我的實現，不僅在他的私人的事業，尤其基本的是在他對於國家的生命能

有貢獻，他的自我實現就在對國家有貢獻的過程中得到。依照格爾看來，國家簡直是一個神秘的存在——它的本身就是目的，對於這個目的，構成這個國家的各個個人必須依着他們的能力，有所貢獻；在這樣的目的裏面，他們自己也能夠實現最善的生活。

這個關於國家的形而上學的理論（註）很顯然和柏克（Edmund Burke, 1729—

1797英國政治家）在英國所倡導的痛罵法國革命的見解，有很類似的地方，因為他們兩人都認為個人應該附屬於國家的福利之下，國家的福利才是最高的善；他們兩人都很強烈地浸潤於一種歷史的態度，用着這樣的態度，觀察附屬於國家的一大串繼續不斷的遺傳慣例，把這種種遺傳慣例視爲人類價值的化身。這個理論又顯然地有着這種種的傾向：一方面傾向於專制政治，因為它特別注重國家的統一，連帶着倡導服從的福

譯者註：一切超乎形體與經驗之外的事物，例如精神神靈等，稱爲『形而上的』，古代哲學家就把研究這一境界的學問，稱爲『形而上學』，反過來，研究具有形體而能爲我們所覺察和經驗的事物，便稱爲『形而下學』。

音；一方面也傾向於貴族政治，因為它所注重的是各人爲國服務的能力的不平等，而不是人類需要的平等。不但如此，這個理論很容易引人根據一國的威力來判斷這一國的美德，並由此很容易使人尊崇戰爭和帝國，認爲這是國家自我實現的手段。而且這個理論既把國家視爲人類功業和價值的最高的形式，它便否認世界大同的願望，並且縱任國和國彼此紛爭着，好像霍布斯所想像的『自然的情況』是人和人彼此紛爭着一樣。

卡爾 (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 德國社會主義者，革命的領袖，作家) 的社會主義由黑格爾的學說中採取了好些它的方式，雖則不採取它的內容。依黑格爾的說法，發展都是由於『觀念』的逐漸的實現，所有物質的事物和情況，只不過是這種『觀念』的反映。這種向前發展的過程，在每一階段，都是一個衝突；在這種衝突裏面，佔優勢的觀念遇着它的對方（它的否定），由這兩方的鬥爭的結果，造成一種舊和新的溶化，創造一個『綜合』(synthesis)，也就是由新舊溶化而成的更高階段的觀念；而這更高階段的觀念，又必然地又要經過一個更前進的、和類似的、衝突的過程，由此引到

另一個更高的階段去。

卡爾採用了這個演進的概念，把它倒置過來。依馬克思看來，具有決定力的要素並不是『觀念』，却是社會的物質的設備；這種物質的設備，永續地指揮着新的生產方法和新的社會的和經濟的關係，繼續向前發展着。這個學說就是唯物的歷史觀，把繼續不斷向前發展的『生產力』視爲社會裏面的社會機構和階級關係，所以有變化的真正的原因。

依卡爾的見解，國家不過是『替全體統治階級管理事務的執行委員會』。因爲這個緣故，卡爾主義者認爲：只要資本主義繼續存在一天，便沒有真正的民主之可能。無論選舉能擴充到怎樣的廣大，因爲人們既然要受制於經濟的大不平等，空談政治的平等權利是沒有意義的。於是人們所珍愛的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民主概念，被他們一揮手一筆鈎消；他們認爲要求得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須廢除經濟的不平等和階級的剝削。

卡爾的學說，在『革命年』——一八四八年——就已經在著名的康敏宣言裏面

很清楚地說出了大概。這宣言是他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德國社會學家，在那一年共同起草的。但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還未成熟，卡爾理論的實行還要等待它的機會。這宣言的影響，到後來的兩次運動才顯著出來：一次是一八六四年第一國際的基礎建立之後，社會民主主義的勃興；還有一次是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成功之後，社會主義的抬頭。



文爾達

達爾文  
對於政治  
理論的影響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被壓服之後，歐洲又向着另一不同的途徑走去。在政治理論的領域內，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英國博物學家的理論。

灌輸思想家以社會有機體的概念，發生了很深的影響。(譯者按：社會的有機體概念，即用生物學上的有機體的進化論來解釋社會的進化。)各個不同的作家由達爾文的學說所引伸出來的結論，却有很大的差異。有些作家

像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英國哲學家) 特別注重「競爭生存」的要素，並根據進化的概念，認為社會是永續競爭的現象；在這競爭裏面，只要我們縱任自然力依着它們自己的途徑開展，適者便能生存下去。這個學說發展成爲最單純而粗率的個人主義，並替放任主義的經濟學派張目，反對國家權力和干涉的擴充。但在另一方面，作家像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 英國生物學家) 却認爲社會的使命應該要控制並代替「競爭生存」，使社會不要成爲一個紛亂的森林，却要成爲有秩序的花園；克魯泡特金 (Peter Alekseyevich Kropotkin, 1842—1921 俄國革命家，地理學家，無政府主義者) 在他的互助論裏，却要從人類和動物在生理方面需要合作的事實，引伸出社會主義來。此外還有別的作家，利用「社會是機構」的概念，提出這樣的主張：社會的一切部分，都須由國家來作協調的控制，好像一個人的腦子，應該協調並控制他的全身。從久遠方面看，後面的幾種概念尤其有較大的影響；因科學的發達，對社會生活作協控制的運動，也隨着更爲強烈起來。但是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後期，

生物學的『類推』在個人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兩方面，都犯了過於簡單化和過於偏重的毛病，以致有批判態度的人們都感覺到厭煩，於是對於實際社會制度的分類和比較，或是對於人類心意的構造和活動，下科學研究的工夫，都要另找一個新的基礎，作為研究社會的根據。

人類學

心理學

上面所說的兩種方法的第一種，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期，因人類學的發達，裏面有斯賓塞信徒們的研究，還有佛雷塞（Sir James Frazer, 1854—英國人類學家）威斯特馬克教授（Prof. Edward Alexander Westermarck, 1892—荷蘭人類學家）霍布浩斯（L. T. Hobhouse, 1864—1929 英國社會學家）以及好多美國和歐洲大陸的學者——例如洛斯教授（Prof. Ronald Ross 1857—英國生理學家及細菌學家）——等等在這方面的研究，對於太古人民的心意和社會組織都有新的發現，使在政治學上研究理論的學者，都從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較早學派的『理性主

義」退出來，從更爲現實的方面去研究太古人民和進步的人民所有的實際的制度和行爲。這各方面的影響所構成的新的匯流，很快地和逐漸發達的心理學研究所得到的材料，混合起來。詹姆士教授 (William James, 1842—1910) 美國心理學家和哲學家) 就在這方面供給了不少材料，準備給社會領域的應用；默獨孤教授 (Prof. William McDougall, 1871—英國心理學家) 和華勒斯教授 (Prof. Graham Wallas, 1858—英國政治學家) 以他們的很不同的方法，利用這種材料，創造社會心理學新的研究。後來到了二十世紀，弗洛伊德教授 (Sigmund Freud, 1856—奧國的神經學家) 的研究，也開始對於政治理論的內容發生它的影響。

總之，這些人的全部的觀點，既完全和葛德文 (William Godwin, 1736—1836) 英國政治學家) 的不同，也和邊沁的不同，乃至和彌勒及格林 (Thomas Hill Green, 1836—1883) 英國哲學家) 也不同。他們認爲人的社會性的行動，無論在任何社會裏面有許多必然地是本能的，而不是理性的，因此對於社會和政治組織的形式和設計的判斷，

必須看它能否適合人的本能和慾望，而不應根據於純粹由演繹（推斷）得來的理性。

蘇維埃制度

（一）階級獨裁的觀念，在社會主義的理論裏面佔着很重要的位置。在資本主義的消滅和社會主義的建立的中間，有一個過渡的時期；在這個過渡時期裏面，普羅列達利亞特必須做「獨裁」者，用它自己的特建的國家，做它獨裁的工具。

（二）但是一個階級不能直接地獨裁。於是在普羅階級和實際執行的政府之間，必須有個居間的集團——無產階級意志之有組織的集體的表現。這便是一個特殊政黨的任務。這個政黨容納一切有階級意識的普羅列達利亞特加入；這些有階級意識的普羅列達利亞特，都有參加這個新統治階級的工作和担负它的責任的意志。

（三）根據這個觀念，在今日的蘇聯有着兩重統系的政府。在那裏，普羅列達利亞特受着兩重的代表：——一方面，在各地和各區的蘇維埃統系裏，上至全蘇聯的全國蘇維埃會議，他們被代表為最高主權的階級；同時在黨裏面，他們又被代表為統治階級（無產階級的附從者，都附屬於這個統治階級之下）。

(四) 在這樣的布置之下，負辯論和決定重要政治問題責任的，在實際上是黨全國蘇維埃會議雖握有最高的立法權，只是使全國周知黨所主持的重要政策，好像播音的作用。(註)有一點可注意的，是這全國蘇維埃會議並不像西歐和美國的國會；西歐和美國的國會多少是有長時期的會議期間的，蘇聯的全國蘇維埃會議只是代表的短時期的聚會，在前後開會的中間時期，是由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代表的；執行職務的機關（人民委員會）和黨的政治委員會，都要和這個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有密切和時常的接觸。

譯者註：在這裏二、三、四諸條，原著者（柯爾）對於蘇聯政治制度的解釋，也許不免引起誤會。按卡伊的學說，政黨是由階級中最覺悟，最活動的份子組成，它是代表某一階級利益的先鋒。如說是普羅列達利亞特和政府之間的居間集團，容易使人誤會為第三者的地位。其實政黨和政府不同，政黨不是行政組織，也不能直接指揮政府。它只能經過自己的黨團，在政治上來領導政府。今日蘇聯的情形，便是如此。

(五)蘇維埃的憲法和在蘇聯政府的實際方法也和西歐和美國的巴立門式民主的根本前提發生直接的抵觸。在蘇聯，選舉權的分布誠然是很廣的，但是它是一個階級的選舉權，凡是屬於「剝削的」階級（包括經營私人商業的商人和富農等）都被排除在外。它的原則不是「一個人一票」却是「一個工人一票」。不但如此，他們的制度反對秘密投票，這秘密投票在巴力門制度的各國，却被認為是廣大的選舉權所必須的附屬物。（註）他們選舉各區各邦各會議的代表，都是用公開選舉的；而這種方法，有許

譯者註：依蘇聯的新憲法，已採用普選制，除有精神病者及法院判決褫奪選舉者外，凡年滿十八歲的公民，不分種族，性別，教育程度，住居年數，社會出身，財產狀況及過去活動，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權；同時，並已採用秘密選舉制，而且工農有着平等的代表人數。以前因為在過渡時期，預防反革命分子的作祟，所以採用公開選舉制；當時工人的政權也有特加保護的必要，所以特重工人的代表權，自從集體農場的政策成功後，這種界限也漸漸消除了。（參看拙著坦白集一四

二頁。）

多時候，就等於從黨的候選人名單中整批地選擇出來。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反映個人的意見，却是要使得一個階級的利益和見解得到適當的代表。於是黨對於選舉有着很大的勢力。而且這種代表的選舉，偏重於城市的工人，由此使他們不致被大多數的農民人口所淹沒；而這種偏重，在實際上也增加了黨對於選舉的勢力。

(六) 這樣看來，在蘇聯，很公開地有一個以階級為基礎的黨派的國家，但是他們也不認為這是一個已經完成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統治工具，只是使現社會漸漸轉變到這樣一種新社會的工具。用來逐漸消滅私人商業的商人和富農的計劃；農業社會化的運動；以及深刻工業化的五年計劃——這種種都是可以看作趨向社會主義制度的步驟；這種制度一旦成功並鞏固之後，便用不着『階級國家』(class state)的存在，因為它到那時將使各階級都不存在了。

(七) 俄國革命原來不是，而且現在仍然不是一個孤立的一國的運動，不僅是只在蘇聯創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它只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倘若沒有世界革命，它的成

功是不能鞏固或穩固的。蘇聯對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關係，只是『階級戰爭』的暫時休戰，這種戰爭非到了世界都實行社會主義，是不能終止的。(註)

(八)但是在蘇聯的本國裏面，那個黨已經在那裏努力建成管理經濟的種種機關，這種種機關到了相當的時候，都有自動的效用，無須再有政治的統治。例如主持種種國營工業的『托辣斯』指導並協調全國經濟生活的計劃委員會和管理會議，在管理的統系裏佔有公認的位置之工會和合作社；這種種都是『社會管理』的真正的機關。這種種機關，等到經濟的管理機關可以取政治的機關（政府）而代之的時候到了，都是要用來代替『階級國家』和普羅獨裁制的；到了那個時候，『階級國家』和普羅獨裁制儘管沒有了，這種種機關還是要遺留下來的。

(九)他們的目的是要創造一種社會，這裏面所有的公民都是有自動的能力，不

譯者註：這裏所謂『暫時休戰』，也許易於引起誤會。據伊理奇的學說，由於資本主義不平等的不發展，一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一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即可促進世界革命。

僅僅是能夠選舉罷了。他們所特別注意的是能喚起大衆的奮發努力。

(十) 蘇聯所實行的五年計劃，因為要努力使工業化能夠迅速成功，不得不忍痛降低目前的生活標準，使俄國的人民，尤其是城市的工人，感到非常的艱苦和緊張，這樣艱苦和緊張的忍受，倘若沒有信仰在後面支持着，顯然是忍不下去的。(註)

法西主義

我們現在要把另一種新的政治組織的形式，和俄國的社會主義比較。這一種新的政治組織的形式，正在今日的歐洲和巴力門主義挑戰。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就方法方面說，有幾點和俄國的制度相似——尤其可注意的例如它要鼓起國民的積極活動；要排除任何不相容的分子和學說；要統治一切自動的結社和一切重要的自治團體的生活；要使法西斯黨在政治的決定上佔着控制的地位。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方法方面是有許多地方很相似的，但是它們的目的，當然是根本不同的。

譯者註：這是指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時期，一般人民的生活標準已逐漸提高了。但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艱苦奮鬥，還是值得我們回憶和注意的。

爲什麼呢？因爲它們兩方面所根據的是根本不同的彼此衝突的概念。在社會主義者方面，他們是崇奉卡爾理論的，他們所認爲根本的現實是階級的現實，必須在無產階級上面建立新社會的基礎。在法西斯主義方面，根本的現實是國家——所謂『國家觀念』和政治的目的是要使國家偉大，並要尋求一個能表現全部國家生活的政治機關。（註）這兩方面的衝突尤其暴烈的，是因爲在意大利人以及歐洲的大部分，所謂『國家主義』已不是要戰勝外國侵略而獲得的東西，乃是已經佔有的東西，不過只要再加充實，防禦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猛烈進攻。

以前做過社會主義者的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所創造的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是發生於大戰後意大利黨派鬥爭的紛亂局面。當時巴力門式的政府既懦弱而且動搖；在大戰之中和大戰以後，社會主義的勢力又高漲，在這樣的潮流中，巴力

譯者註：法西斯主義所謂『國家』却有它的特質，按正確的界說，法西斯主義乃是大資產階級，尤其金融資本實行公開獨裁的方式。

門式的政府簡直是陷於完全無力的狀態。在當時的意大利，幾於可以說是陷入了無政府的地境，沒有人有執行法律的力量或意志。

法西斯主義的觀念和政策，普通的說法，都把它視為『職團國家』(Corporation state)(註)的觀念和政策。依這種說法，法西斯的國家所包含的內容，不僅是這麼多的個人，並且是結成集團的個人，他們依照他們所具有的機能，分配於若干職團裏面，由於

譯者註：『職團國家』原文為Corporation State，是意大利法西斯所採用的制度。其辦法是由全國各業的僱主工人，及自由職業者所組織的『工團協會』，再組成九個『全國協會』，由墨索利尼自任『職團總部長』，獨握大權，指揮全國的工商業及勞資問題。各協會的職員雖由選舉，但政府有取捨之權，且必須是法西斯黨員。入會的會員亦須政府認為『適當的』才得准許，但是各協會所規定的『集體合同』(關於工資，辭歇，及其他有關僱工切身利害的條件等等)經政府核准後，非會員亦須一律遵守。『全國聯合會』雖可參加下議院選舉，但候選人名單完全由政府圈定。全國的經濟生活都受這制度的控制，它的最主要的一點是保障剝削階級的存在。

這些職團的媒介，他們和國家的生活發生聯繫。參加國家的生活。在國家本身之下，各職團只是居於次要的地位，不過在國家之下，通過這些職團來表現國家的生活罷了。

對巴力門主義的挑戰

十九世紀的政治理論家，似乎有大部分都在這樣想像着：只要選舉權的逐漸擴充，巴力門機構的逐漸完善，新的國家採用巴力門式政府的經驗，

這樣一來，政治組織的問題便可以一了百了，永遠解決了！但是在今日，很少思想家，無論他們是怎樣勇敢地維護巴力門制度，還存着那樣簡單的老見解。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立

現在除了美國以外（註）幾於每個國家，在國內都有着一個有勢力的

社會主義運動的政黨，對於政府的成立和推翻，有着相當的影響。而且有一個國家——蘇聯——更是很明確地，在組織和政策上是社會主義的，超脫於資本主義

的國際之外，用它在事實上的表現，證明社會主義不僅是理論的信條，而且是可以實行的制度；由於這樣事實上的表現，對其他的國家挑戰。誠然，在其他國家裏的社會黨有大

譯者註：這是指以前幾年說的。在事實上，近幾年來，美國左翼政黨的勢力，已經很大地增加了。

部分排斥康敏主義，要用和平的手段逐漸得到政權，並要用巴力門的方法來逐漸建立社會主義。但是這樣的政策仍然不能抹煞這個事實：階級的分別和階級見解的差異，在今日已使歐洲各國在政治上分成最基本的陣線；換句話說，這種傾向的強度，已夠使互相鬥爭的政黨不得不改換以前對於政治的假定了。還有一個事實也不能否認的，就是蘇聯的存在；努力實行它的五年計劃，很勇敢地依着社會主義的路線，改組這個偉大國家的全部生活——不但工業，而且包括農業——這必然地要對其他國家的政治發生強有力的反應。

我們已經知道，法西斯主義的最主要的企圖，是要利用國家主義和「職團國家」的觀念，使它在現代政治中佔得優勝的地位，由此超越階級的區分。但是我（譯者按：本文著者自稱）在許多人裏面的一個，就不相信，在久遠方面看來，這是能夠成功的。社會主義，根據於勞動階級的一種運動，是全世界的運動，必然地要伸入每一國的內政裏面去。就是在意大利，除非它能在現有的經濟制度裏面，真能調和勞資兩方的要求，也不能

永久地排除社會主義的。如果『非社會主義的』世界能夠給與它的工人以增高的工資、和相當穩定的職業，在這樣的時期裏面，它或許還能夠支持資本主義，反對國內的社會主義者，抵抗蘇聯的影響。但是『非社會主義的』世界能有把握繼續享受這樣的利益嗎？在今日看來，並不像有把握；而且我還懷疑是否再能使它有把握。

倘若如我所相信的，世界已接近社會主義的時代，那末將來的政治組織將要成爲怎樣的形式呢？二十世紀政治的爭論，不再是像十九世紀那樣的問題，如選舉權的擴充，秘密選舉，人民的直接複決權和撤回權，第二議院的權力、優點、和缺點，或關於立憲君主或共和國的問題；却是關於社會本身組織的、更爲基本的問題。我們的主要問題，不是怎樣組織政府的機構，而是怎樣組織社會全部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生活，以及一個社會和其他社會的關係。政治和經濟將不再是被人看作兩種分開的問題，却是一個的同樣的問題。

當然，這種統一，是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共同點；它們同樣地、推翻巴力門制度

直到現在還認爲是自然的、舊的分法，

任何制度，要企圖協調並控制全社會的經濟生活，它的工作必須有種種特殊機能的機關去執行；對於這種種機關，依着它們各個的範圍，必須給與大的權力。政府的中央機關，倘若它要做得相當的好，必須擺脫一切煩屑的事務，把一切有一定範圍的政務都支配給種種機關，付與全權做去。任何地方的巴力門，倘若能夠這樣做，把它的時間和精力集中於政策最高的指揮，那末巴力門制也許能繼續存在，而且也有繼續存在的價值。但是它能這樣做嗎？我嚴重地懷疑着。

倘若任何政黨真要着手改變社會的根本的基礎，那它必須先要使得自己的政權能夠延長繼續下去，不致受反對黨把它的工作中途廢棄。但是在巴力門制度之下，這兩件事都永遠辦不到的；因爲這兩件事都是巴力門式的民主制所顯然不許的。

那末，倘社會主義來到的話，我相信，它要經過一個過渡時期的、某種形式的獨裁制。

(Theories And Forms of Political Organisation. by G. D. H. Cole, 1932)

# 卡爾研究發凡

## 一 卡爾生平的速度寫

『從前哲學家只是用種種方法解釋世界；我們的任務是在改變世界。』

卡爾：費爾巴哈論綱，一八四五年。

投身  
新聞  
專業

卡爾是於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於特累甫（Triesen）在德國普魯士邦萊茵省的一城。他的父親是一個猶太律師，於一八二四年棄猶太教而信奉

基督教。卡爾幼時入本城公立學校，於一八三二年秋季考入波昂大學（University of Bonn）專研法律。一八三七年秋季轉入柏林大學，研究法律、哲學、歷史、古典的和近代的哲學。於一八四一年畢業於耶那大學（Jena），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為伊壁鳩



卡爾

魯和德謨克里特的哲學 (Epicurean and Democritian Philosophy) 當他在柏林大學求學的時候，他很注意黑格爾的哲學；在大學講師和黑格爾派的學者裏面，交了不少的朋友，他們的年齡雖然都比他大，但是都拿平等的地位待他，而且都很殷勤地要和他做朋友。

在一八四一年，他暫在波昂城住下，想找機會做大學講師，但是因為大學裏對於非正統派的學說都要加以種種的爲難，所以他轉着方向到新聞事業方面去。於一八四二年，他先擔任在科倫 (Cologne) 出版的萊茵報 (Reinische Zeitung) 的通訊員，後來就擔任該報的主筆。這個報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日報，是一些銀行家和中等階級的智識分子創辦的，目的在反抗普魯士的專制政治。但是卡爾所作的時論，常爲新聞檢查所難於通過，因此該報繼續不斷地受着檢查者的爲難，最後卡爾不得不出於辭職，於一八四三年十月，離開了科倫，和他新結婚的愛妻燕妮 (Jenny) 一同到巴黎去擔任德法年書

(*German-French Annals*) 的編輯職務。這報是黑格爾左派的魯格(Arnold Ruge)所發行的。但是這個報只出了兩期，又被迫停辦了。卡爾在這個報上所發表的言論，已經含有他對於社會主義和社會集團鬥爭的見解，所以我們可以說，在一八四三年的冬季，卡爾已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

一八四四年九月，恩格斯到巴黎來看他。恩格斯當時是德法年報的一個投稿者，自從一八四二年的年底，住在英國的孟撒斯特。這次他們倆在巴黎的相見，是他們終身友誼和合作的開始。他們合作的第一次的結果是神聖的家庭，這是一本爭論的著作，意在反駁他們從前的兩位黑格爾派的朋友施爾兄弟(Bruno and Edgar Bauer)。卡爾有時替在巴黎出版的週刊進步報(*Vorwärts*)作文，因為這件事，他和其他幾個投稿者都於一八四五年被法國驅逐出境。他隨後跑到布魯塞爾(比利時的首都)去，在那裏他一直住到一八四八年的三月，用法文寫成他的第一次的偉大著作哲學的貧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反駁普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法國

空想的社會主義者）所著的貧困的哲學。卡爾的這本著作是在一八四六和一八四七年間寫的；在這本書裏面，我們現在所稱爲卡爾理論的一切內容，已多少有了顯明的敘述。在一八四七年的十二月和一八四八年的一月，他和恩格斯替康敏同盟合寫了康敏宣言；這個同盟，他們是在一八四七年的夏季加入的。一八四八年的三月，在法國二月革命發生以後，卡爾被比利時政府驅逐出境！那時法國的臨時政府已經來請他去，於是他離開了布魯塞爾，便到巴黎去。他在巴黎一直住到一八四八年的三月底，所以他有機會親眼看到法國普羅的鬥爭和變遷，親眼看到勃郎克黨徒（Banquists）和社會民主黨人的鬥爭和變遷，有的贊成普羅獨裁，有的反對。三月底，他到科倫去參加德國革命；這次德國革命發生於當年三月，在科倫所出版的新萊茵報是擁護這次革命最敢說話的言論機關；該報由卡爾主編，第一期於一八四八年的六月一日出版。巴黎的普羅列達利亞，特於六月最後一星期的失敗，結果也使德國的革命因之衰落。到了一八四九年的春季，德國革命已完全結束，新萊茵報也被封閉了。卡爾又回到巴黎，於一八四九年的秋季到

倫敦去，一直在那裏住到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逝世。在倫敦，他還編輯新萊茵雜誌 (*Neue Rheinische Revue*, 1850)，撰寫關於經濟的文章，投登當時反對判麥斯吞 (*Pa-Innerston* 英首相)的『自由報』擔任紐約論壇報 ("New York Tribune", 1852—1865)的通訊員；在一八五九年，出版他所著的經濟學批判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在這本書的序文裏面，他敘述了他的唯物史觀的輪廓；在一八六四和一八七二年間，他是國際工人協會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即第一國際的精神的領導者；一八六七年，他出版資本論 (*Das Kapital*) 第一卷；在一八七〇和一八七一年間，他寫了國際對法國內戰的演詞 (指巴黎公社)，在他的最後十年裏面，因為身體多病，以致阻礙他寫完他的資本論；第二、第三和第四卷的資本論，只得由他的朋友恩格斯在他死後替他整理編輯。第二卷於一八八五年出版，第三卷於一八九四年出版，第四卷名為剩餘價值論的歷史 (*Zur Geschichte der Mehrwert Theorie*)，分四部分，由考茨基 (*Kar Kautsky*) 於一九〇五和一九一〇年間編完出版的。

## 二 卡爾的一般見解

階級的  
社會的

級：

人類的社會，脫離了太古部落的和公社的組織之後，分成兩個敵對的階級：一個階級支配並統制生產工具和相應的政府機構（國家）或政權，這機構或政權是爲着保護新的財產關係而建立起來的；還有一個階級所有的只是勞動力 and 技能，被逼迫着去做維持社會所需要的生產工作和一切苦工。這種階級的社會，從物質的生產或社會生活的基礎方面看去，經過三個階段。就是：（一）蓄奴的或古代的經濟；（二）佃農（後來成爲農奴制）的或封建的經濟；（三）工銀制度或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第三階段一天天更爲複雜，所包含的內容更多，所以它的主要的特質，由常人看來，是很模糊的，是隱藏的。

依卡爾把資本主義制度視爲「階級社會」的全部概念看來，他所檢討的並不是各個的資本家，或是各個的勞動者，却是注意於兩個「敵對集團」的階級；在這裏面，一

個階級替別一個階級出勞動力創造剩餘價值。

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發現了它的階級的特質，發現了在這裏面活動的各階級和代理機關的真正的地位、運動和機能。這是卡爾的主要貢獻之一。他從資本主義制度裏面揭穿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眩耀的神話，揭穿了個人的自由、公平和正義的面幕，顯出它的階級社會的一階段——最後一階段——的真面目。這種工作，他在他的四卷資本論裏面完成了。

經濟倫理和法的相對性的相對

卡爾不像他的前輩那樣，把當前盛行的生產方式，把現有的產業秩序，視為永久的、絕對的和合理的（雖則他們也認為是有缺點的）社會制度。卡爾研究社會的時候，却把它視為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個相對的過渡的階段。照他看起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封建主義的產兒，同時又是尚在胚胎中的康敏生產方式的父母。

我們從卡爾對社會的進化的見解看來，很顯然可以看出他所檢討的從來不是離

開現實的抽象的觀念。例如他從來不問什麼是一般的價值，或什麼是勞動的生產力，只是要問什麼。是資本主義社會裏面的價值和生產力；他也從來不深究權利、正義、平等，或自由的一般的觀念，所要深究的却是在社會發展中任何特殊階段中的權利、正義、平等，或自由的意義。依卡爾看來，社會學不知道絕對的真理，不知道觀念有永久有效的界說，却認為都是和社會發展的階段有着聯繫的，是相對的。這是卡爾理論裏面很重要的一點，是研究它的人所不可忽略的。

卡爾的

發展

觀念  
感謝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遺教。黑格爾認為精神、自然、和人類的社會，只是在

較低階段到較高階段的發展過程中，「觀念」發展的向外表現罷了。這種觀念、精神、自然、和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以前和現在所以能夠繼續向前進行，是因為它的正面的或肯定的要素裏面，本身就含有矛盾的、相抗的、相對的、或否定的要素和掙扎，和正面的內容發生衝突。這種衝突引起鬥爭；在這種鬥爭裏面，思惟、自然、和人類社會的一切潛力和

天賦都開展出來；在被否定的那個階段的地位上面，發生一種新的和更高階段的精神的、智力的、自然的、和社會的生活；它是『正』和『反』所有的一切精華的『合』。這種矛盾的發生和邁進，是進步的發展最重要的條件；矛盾的出現是向着更高階段掙扎的第一表現，或舊的『正題』不能再滿人意的第一表現；這種矛盾，倘若開展出來，並向前推進，便是進步的發展之主要的源泉。但是如果缺乏力量來使這個矛盾開展出來，並使它能向前推進，那末進步的發展便無從發生；在這種地方，停滯和衰落便都來了。這種人類思惟上，在自然和社會歷史上向前推進的過程；即思惟、自然、和社會，由於對敵的勢力彼此衝突而向前發展的過程；黑格爾就把它叫做『辯證法』“dialectical method”）或『辯證的過程』（“dialectical process”）它含有三個階段——『正』（“positive”）或稱肯定（affirmative）或稱正題（thesis）『反』（“negative”）或稱『反題』（antithesis）『否定之否定』（“negation of the negation”）或稱『綜合』（synthesis）

卡爾採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作為研究社會的方法；他認為黑格爾的宇宙發展之辯證法的過程，在形式上是對的，但是黑格爾把『觀念』作為發展的源泉，卡爾却代以物質的力量，就是生產力；卡爾認為生產力是人類社會和它的歷史的主要的動力。黑格爾是主張觀念論的（就是認精神是宇宙發展的主力），卡爾却是主張唯物論的，認為物質的力量（講到社會，便是經濟方面的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

### 三 歷史的唯物論

『社會的關係和生產力有密切的關係。人們因為獲得新的生產力，他們也隨着改變他們的生產的方式，——他們謀生的途徑，——他們並隨着改變他們的社會關係。』

卡爾哲學的貧困，一八四七年。

觀念論  
和  
唯物論

人們靠着智力要對自己解釋，換句話說，要對於世界和它的一切，得到一種全部的如連貫的見解，或要了解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由於這種智力上的努力，結果便形成兩種廣大的概念，如用哲學上的名詞來說，就是觀念論和唯物論。

所謂觀念論，它的意義是這樣：只有精神或神靈才有絕對的現實和真實的存在；只有它構成一切「存在」的源泉，只有它是一切現象和發展的主要的本原，也只有它是「宇宙」的自覺的和有意的動力。依觀念論，精神是創造並推動物質世界的。

在別方面，唯物論却認為自然界的真正的現實，和精神的真正的現實，都是物質；它所固有的力，是依着科學所發現的法則而發生效用的。精神只是物質的產物或機能。思惟只是客觀世界的反映或解釋。

這兩大派的概念各有它的種種的差異和合併，但是就大概說來，他們代表兩派界限分明的相反的見解：一派認為思想或精神是主力，另一派認為物質和它所固有的特性是主要的現實，是世界的推動力。

由觀念  
論過渡  
到唯物

德國哲學的偉大時期是大約從一七八〇至一八三〇年。這個時期的主要特色是觀念論；它的著名的代表有康德、斐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1854）和黑格爾。最後一個是最偉大的；他把自然、精神和人類歷史的主要事變的發展，歸納爲『觀念』的自我發展。約自一八三〇年以後，德國的思想拋棄了觀念論而採用唯物論。這個變化剛巧相應於當時的商業、貿易和製造業的勃興，或相應於當時資產階級的勃興和它的自由主義的傾向。這在黑格爾主義方面也引起了一種反應；這個學派分裂爲幾個部分，其中的左翼被稱爲『青年黑格爾派』；他們漸漸地運用理性主義和歷史的批評態度，在一般方面批評宗教，在特殊方面批評基督教和福音。這個時候最著名最激烈的這類批評家，要推費爾巴哈。他在他所著的一八四一年出版的基督教的實質一書裏面，認爲上帝只是人類自己心意的理想化，認爲宗教不過是人的情緒的、智慧的和道德的需要之意識的反映，並不是由上帝創造人，却是人依着他自己心裏的想像而創

此種描述  
非但與  
唯心論  
無涉。

卡爾·黑格爾研究

61

造上帝人的有形的存在是一切宗教和哲學的中心人的意識或心理或意象都是由他的真正的「存在」來解釋並不是人的「存在」要由他的觀念來解釋的。可是德國的思想在宗教和哲學方面雖然這樣變成了唯物的和自然主義的但是在人類歷史和社會科學的領域裏却仍然是唯心的。甚至費爾巴哈自己也仍然漠視工業的和社會的問題建議用人道主義的仁愛來補救社會的罪惡。他始終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和大多數的青年黑格爾派中人一樣。

在青年黑格爾派裏面，能從唯物的觀點去看人類歷史和社會科學的廣大的範圍，來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於經濟學的，只是這一派中最年青的一個——那就是卡爾·倘若費爾巴哈說過，神學家和哲學家所應當研究的是有形的人，那末卡爾也曾經說過，歷史家和社會哲學家所應當研究的是社會。據他的意思，這種研究的基礎是政治經濟學，因為任何社會的意識或觀念的體系，我們要解釋它，必須用這個社會的生產狀況來解釋。卡爾的對象絕不是純屬理論的，或僅是學者的研究，他的目的，一開始就不僅在解釋。

社會，却要改變社會，却是要使社會革命，要使生產階級的重要的利益和原則，成爲統治的利益和原則，要使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運動成爲普羅的有意識的努方。

唯物

史觀

唯物史觀，或唯物的社會生活觀，絕不主張人只受物質的動機所激動，或只受個人的利益或快樂所激動。唯物史觀和實利理論，或十八世紀的唯物論，或邊沁和他那個學派的計較幸福，的說法，都不相同。它的真正的意義是：社會的基礎，或基本的結構，是物質的生產。這個基礎，由於它對精神所發生的影響，決定道德、宗教、哲學和藝術等等的形式，即社會的意識形態；因此，還有一點也就隨着可以知道，那就是物質的生產一有了變化，全部的社會生活和它的意識形態的形式也跟着改變。因爲依卡爾看來，任何社會（公社的、國家的、帝國的、或國際的）的主要機能，或生活的過程，都是要靠所生產的物質生產品來維持生活。這個生活的過程，是最重要的，是最能在社會裏影響和形成人們的本能、情緒、意志和推理的能力。

社會的物質生產包含兩類的要素：（一）生產力；（二）生產的條件。第二類的要

素以第一類爲基礎，依靠着第一類。這兩類的要素構成社會的基本建築或基礎。

生產力又包括無生命的和屬於人的：無生命的力是土地、氣候、礦物、水、水蒸汽、電、工具和機械；屬於人的力是用腦力和用體力的工人、發明家、組織者、管理者、技師，以及其他把原料從原來的出產地運輸到生產的地方所僱用的人們。

生產的條件，是社會裏各階級、各集體和各分子間的法律的和政治的關係，或財產和政府的形式。

這兩類的要素造成基本的結構，在這基礎的上面建立着種種形式的情緒、感覺、幻想、思惟、和人生觀，或宗教、藝術、哲學等等的廣大的上層結構。社會之革命的變化，是要靠着它的基本結構的變化；換句話說，是要靠生產力和生產條件的變化。

在革命的時期，最令人注意的徵候，是有個被壓迫的階級起來爭取政權。必須等到滿含衝突的社會秩序由舊的生產條件中把生產力解放出來，替新的社會秩序創造物質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可能性，必須等到了這樣的時候，革命的時期才能結束。

在由資本主義到康敏主義的過渡時期裏面，生產品的平等分配是不可能的，因為「權利不能超越社會的經濟結構，和它所決定的意識形態的發展；」過渡的社會仍然有着舊的階級社會的殘物。只有在一個完滿發展了的康敏的秩序裏面，勞心勞力的工作已不再分畛域。生產的活動已成為社會裏每個分子的一種基本需要，（成為生存的自發的義務，）屬於人的和無生命的生產力都已達到很完滿的發達，由合作所得到的財富的源泉都已能橫溢湧流着——只有到了那樣的時候，布爾喬亞對於權利觀念的狹隘範圍才能夠擴大起來，康敏的原則才能夠實行起來。

#### 四 政治經濟學

「……依我研究所得的結論，認為法律關係以及國家形態都是不能夠用它們自身來理解的，也不是能夠用所謂人類心意的一般的進步來解釋的。法律關係和國家形態都是根源於物質生活條件；公民社會的解剖，應求之於政治經濟學。」

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綱目，一八五九年。

政治經濟學  
三個學派的

政治經濟學所檢討的是在現今的社會裏面商品生產和分配藉以進行的社會的情況和關係。卡爾把政治經濟學分爲三個學派，就是古典的，批判的，和庸俗的。

古典學派所包括的時期，是從十七世紀的下半段至十九世紀的開始二十五年間，也就是工業革命的開端和發展的時期。卡爾以爲在這個時期裏面，在英國法國和意大利，都有偉大的和有創造力的經濟學家出現。這裏面的主要人物有配第（Sir William Petty, 1623—1687）英國政治經濟學家；法國的重農主義的經濟學家，例如梭內（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屠閣（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1787）等；亞丹史密斯和李嘉圖。這一個學派的經濟學家，對於資本主義還算沒有什麼有意的袒護。他們的主要的對象，是要研究生產和分配財富的過程，要發現統治這種過程的法則，並要指出推動或阻礙這種過程進步的技術上和政治上的方法。

批判的學派發生於工業革命の後段時期。第一次的工業恐慌，民衆的抗議，叛亂，和

勞動人民的公開示威——這種種事實，都使許多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作家及觀察家，不得不不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新的工業制度的進行、傾向和在社會方面的結果；去尋覓資本和勞動在財富生產的過程中各個所盡的職責；去調查勞動人民的狀況。這一個學派的先鋒有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奧文（Robert Owen, 1771—1858）英國社會改造家；聖西門（Saint Simon, 1760—1825）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西思蒙第（Jean Charles Leonard Sismondi, 1773—1842）瑞士歷史家和經濟學家）等。

庸俗的一派和批判的學派同時出現，而且是發生於同樣的原因。不過庸俗派却有着一個相反的作用，那就是極力替現今的秩序辯護。就是這一派裏面最好的腦子，也只是用多少有文彩的語語，替工商階級敘述它的意見、幻想、想像，來袒護當前的經濟的秩序。他們有自覺的或本能的恐懼，不敢澈底研究批判的意見，去得到合理的結論，或在理論上構成一個綜合的論斷。他們把經濟現象的表面的形式，作為經濟現象的本質和原

理。這一派開始於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英國經濟學家) 信往漸漸地加多, 和獻身於社會革命運動中的批判學派相頡頏。

卡爾的

主

要問題

卡爾對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 要回答下面的幾個問題: 第一, 社會的歷史既是一個發展的過程, 現今的社會不過是人類進化中的一個階段, 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是: 這個社會是怎樣來的? 它往着何處去?

第二, 資本主義的社會是一個階級的社會, 在這裏面, 被剝削的階級雖在名義上號為自由, 却供給剩餘勞動的生產品與資本階級, 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是: 這個生產是怎樣進行的? 什麼是能夠表現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社會關係和狀況之經濟的範疇? (包括固定的概念和術語。) 這個勞動的產品和剩餘勞動, 是怎樣被人利用的? 它們是在怎樣的情形之下, 是用什麼方法被人流通着, 分配着?

這些問題, 是跟着卡爾的一般的見解(見前第二節)而俱來的; 卡爾因為要回答這些問題, 他向古典的和批判的經濟學派去尋覓參考的材料。

各種學  
派的  
回答

關於第一個問題，他從這兩個學派裏都得不到回答，因為這兩派都認為自從人類歷史開始以來，資本和勞動已是存在的，不管是什麼形式；都認為自古以來『總常有着貧富之分』；不過他們有着這樣的異點：古典學派以為勞動的狀況是在一天天改良着，並相信只要自由漸漸增加起來，勞動的狀況是要繼續改良的；批判學派却不以為然，他們辯論着說，自從機械進步以來，自從工廠制度勃興以來，就一般說，勞動着的窮人或生產者的命運已遭受到很大的損害，而且除非再回到舊的生產狀況或採用合作的制度，是不能夠改良的。可是他們都沒有發展的見解，其中唯一的例外是傅立葉，他在所著的四運動論（“*Quatre Mouvements*”）一書中，曾經明晰地看到人類社會的逐漸向前發展，是由較低階段升到較高階段的一般的幸福。

關於第二問題或第二類的一串問題，却可以從古典的和批判的經濟學派得到較多的參考。在古典學派裏面，尤其是從亞丹史密斯和李嘉圖，他找到他的見解也得到他們的支持，這見解就是一切商業價值的要素是勞動；價值只是用於生產的『社會的勞

動』之具體的表現；資本，即用於生產的被積聚的勞動，替資本家得到利潤或剩餘價值。他在李嘉圖的著作裏面找到這樣的意思：利潤和工資是反比例的，或彼此是相敵對的。這意思就無異於說：如果工人也能夠由於他的剩餘勞動而獲得報酬，他就在這限度內減少了利潤的數量，因為利潤的來源是剩餘勞動。

依批判學派的想法，利潤和工資的關係，是一個在社會裏有勢力的階級和一個無勢力的階級間的關係，前者從後者裏面榨取剩餘勞動。

但是古典學派和批判學派的這些推想，離明確、清楚，或始終一致，還遠得很。不但如此，古典學派在理論上對於階級的關係簡直提都不提；就是批判學派吧，也不過在這種關係裏面看到不公平、道德上的缺憾、和幸福的障礙，至於消除的辦法，也不過勸勸勞工階級逃避現實，跑到鄉村社會和遠處的公有的殖民區裏面去。

卡爾根據他自己對於社會學的一般的見解（見前），作精密的觀察和研究，分析全部的資本主義制度，發現了它的興起、進行、和趨勢，由此對於上面所說的主要問題作

有系統的回答。他利用古典和批判學派關於價值、工資、利潤和剩餘勞動的推論，作為他的出發點。先把它們的推論從曖昧、瑕疵和矛盾中解放出來。

利潤率  
下降的  
傾向

生產過程從較低的『有機構成』過渡到較高的『有機構成』(註) 這個過渡只是工業革命的另一個名稱。從社會方面看來，這是用機械來代替人。從經濟方面看來，這是和可變資本對立的不變資本之比較的增加。例如從前五十鎊的工資能使五十鎊的生產工具活動起來，能夠生產現在只須二十鎊的工資，就能使八十鎊的生產工具活動起來，用來生產。

譯者註：資本的有機構成，是指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例。用於機器原料等的資本為不變資本，因為這部分的資本價值經生產過程而移轉在商品中，分量是不變的。用於購買勞動力的資本（即工資）為可變資本，因為經過生產過程之後，有比工資價值更多的新價值產生。不變資本比例較大的，有機構成較高，否則較低。剩餘價值既由工人的勞動力所創造，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工廠得利多，但因資本家間競爭的結果，各種資本所得的利潤量仍要趨於平衡的。

這個事實推動工業革命向前進。可是這句話還需要相當的解釋。

供給剩餘勞動或在產品上增加剩餘價值，既然是完全由於活的勞動，那末很顯然的，在較高的「有機構成」每一「商品單位」包含着較少的剩餘價值，遺下較少的利潤。這個事實，用商業方面的說法，便是利潤率的下降的傾向。（譯者按：利潤率是資本家所賺的利潤對所出全部資本的比例。）這當然是就國際和平的常態的時候說。下面的一個公式可以表示下降的利潤率；同時，資本階級的資本總量和剝削的增加率，却並不因利潤率的下降而有所更改。（公式中的S代表利潤，C代表不變資本，V代表可變資本。）

$$\frac{S}{C+V} = \frac{50}{50+50} = 50\%$$

$$\frac{40}{60+40} = 40\%$$

$$\frac{20}{80+20} = 20\%$$

要抵抗這樣利潤率逐漸下降的損失，資本家便運用更大的資本，廣大生產的規模，把工作組織得更合於科學化的方式，採用更近代的工具，更驅使勞動迅速和緊張，更增

進競爭的利器，使生產加多，賣得便宜，由這。樣。爭。取。絕。對。的。利。潤。總。量，以抵償每個商品單位的利潤率下降的損失。『小的利潤和大的售賣，』使得利潤的總量增加。（譯者按：競爭的結果，生產過剩還是要使資本家走頭無路，所以用大規模生產及加緊剝削來爭取利潤的總量，還是有矛盾存在的。）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Marx, by Max Beer)

## 黑格爾和辯證法

世界  
和  
思想

在十八世紀的末葉以前，有學問的和沒有學問的，哲學家 and 淺學的人們，對於世界都有着像下面所說的概念。他們認為世界要末是被創造成功的，要末是無始無終地存在着。這個世界，要末是由一個有人格的超自然的上帝，或普遍的**精神**，管理着，要末是由自然推動着進行，好像一個精巧的機器一樣。這個世界依舊永存的法則存在着，是完善的，是被注**定**來實踐某種設計的，是不變的。在這世界裏的事物和存在，都是被分為種類的。一切都是固定的，不變的，永遠的。世界和人類的一切事情也都是這樣的。普通的俗諺像『太陽下面沒有新的東西』，『歷史自身重複着』，『都不過是這種見解的一般的表現罷了』。

一 和這個哲學相關聯的有論理學，或思想律的科學。這論理學教人怎樣用他們的理

性，怎樣合理地表示他們的意思；教人知道概念是怎樣起來的（例如在怎樣的情形之下，人類能了解關於石頭、樹、動物、人、道德、邪惡等等的概念）不但如此，它還教人知道怎樣把這些概念合併起來而成爲判斷，最後怎樣再由這些判斷裏引伸出結論來。這論理學顯現出人類思想的過程。它是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所開創的；它的內容，一直到十九世紀開始的時候，還仍然是沒有改變的，如同人們的宇宙觀一直到那個時候沒有改變一樣。這個人類思想過程的科學，是根據於三個舊有的思想律，這三個思想律是最能表現當時論理學的特質。正像一個審案的縣官直對準犯人的面孔望着，要認明這犯人的本身，免致遲疑和矛盾的發生，這論理學也是要先對於它所思考的概念建立起「同一性」來。因此這論理學便把同一律作爲第一個思想律，它的公式即：「 $A=A$ 」，也就是說每一件東西，每一個生物，都像它的本身；它有它自己的個性，是它自己所特有的。再說得更清楚些，這個同一律證實地是：地是一個國是一個國；資本是資本；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

第二個思想律是矛盾律。A不能夠是A而同時又是「非A」。如再用我們在上面

所舉的例子，那就是：地不能夠是地而同時又是一個火球；一個國不能夠是一個國而同時又是一個『無政府』(anarchy)；資本不能夠是資本而同時又是貧窮；社會主義不能夠是社會主義而同時又是個人主義。依這樣說來，世界上必然沒有矛盾，說一件東西對自己發生矛盾，這是胡鬧；至於在實際上或思想上確發生有這樣的矛盾，那只是被認為是原則上的偶然的例外，只是曇花一現的不常有的現象。

跟着這個思想律而來的是第三個思想律，那就是排中律。A 要末是 A，要末是『非 A』；沒有中間的名詞。如再用上面的例子來說，便是：地要末是一個固體的形體，要末，倘若不是固體的，便是『非地』；沒有中間的名詞。國家要末是君主國，要末，倘若不是君主國，便是『非國』；資本主義要末是壓迫的，要末全然是『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要末是革命的，要末完全不是社會主義；也沒有中間的名詞。

(形而上學)

這三個思想律——同一、矛盾和排中——都是形式的論理學所用的。我們立刻可以看出的是：這個論理學的效用只是適宜於呆板的、不變的、固定的概。



加困難，簡直是更不可能的了。從十九世紀的開始，思想家都感覺到有建立一個新的論理學的必要；黑格爾對於此事有很大的貢獻，他下了一番周密的艱苦的工夫，建立一個新的論理學，適合於世界進化的過程。這種工作，在他看來，尤其覺得迫切，因為他的全部哲學的目的就是把思想和存在、理性和宇宙彼此密切地聯繫起來，一致起來，把它們視為彼此是分不開的，是彼此同一的，都是『理性』的逐漸發展的具體化。『凡合理的必定是真實的；凡真實的必定是合理的。』哲學的任務便是要了解存在的現象。每一個個人都是他的時代的產兒。就是哲學吧，也是在思想上把握着它的時代。（見黑格爾所著法律哲學的序言。）很顯然地，黑格爾並不是抽象的思想家；他並不是不顧實際，發出沒有邊際的空論。他却是要使抽象的和純粹理想的觀念有着物質的內容，簡直是要使它具體化。沒有『真實』的『觀念』，或沒有『觀念』的『真實』，在他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因此他的論理學不能僅僅研究思想律，並且要同時顧到世界發展的法則。只不過玩着『思想形式』的把戲，再加上觀念以作護符：這是舊的論理學家所慣做的，

依黑格爾看來，似乎是無用的、抽象的、不真實的推論。因此他創造了一個思想的科學；這思想科學的內容不但有系統地陳述了思想律，並且也有系統地陳述了進化律。雖則不幸的是黑格爾所用的說法很使他的讀者感覺到艱深難懂。

辯  
證  
法

黑格爾論理學的重要內容是辯證法。

辯證法，依古昔的希臘人所了解的意義，是指對話和答辯的技術，用破壞對手的主張和證明的手段，暴露其中的矛盾，由此駁倒對手的話語。這種對話的技術，我們如加以仔細的研究，便知道它雖然是一種矛盾的、和顯然消極的（破壞的）思想工作，但却是很有用的，因為從相反的意見之衝突裏面，可以顯露出真理來，由此喚起人們的更深刻的思想。黑格爾就採用這個名詞，把他的論理學叫做辯證法。這個方法的觀點，是把宇宙的事物和存在，都看作是變化的過程中，由於矛盾的要素之鬥爭和融化而向前發展着。他用着這個方法的幫助，重新估量原有的三個思想律（這在上面已經提及過）同一律只是抽象的、不完全的真理，因為它把一件東西或一件事情和其他事

物分離開來，認爲彼此是沒有關係的。這個缺點是很顯然的。讓我們再用下面的這個命題來做個說明的例子：地是地。任何人聽到這個命題的頭上兩個字，當然希望下面接下去所說的應該要告訴他一些話，使它知道和別的東西有什麼分別。但是他看下去，所得的却只是一個空洞的呆板的『同一』。同一律最好也不過是不完全的真理，那末矛盾律和排中律便是完全的非真理。矛盾不但不致使思想沒有意義，而且正是開展思想，推進思想的東西，因此也是開展並推進思想所表現的對象的動力。假使原來只是一個噴火的汽體集塊的地，仍然是停在那樣的狀態，沒有矛盾發生（就是由冷而凝結），那末便沒有生物能在這地上出現。假使國家仍然停止在專制政治的狀態，沒有矛盾（即資產階級的自由）的存在，那末國家的生活便要呆板固定起來，文化的進步也就不可能了。假使資本主義仍然停在原來的狀態，沒有它的普羅列達利亞特的矛盾存在着，那末它便要轉到一種工業的封建制度了。全靠有着矛盾或衝突，自然和人類的潛力及其天賦，才有發展的可能。只有在矛盾開始呈現出來的時候，向着更高階段的思想和存在之

進化才開始向前推動。不過在這裏有一點要附帶說明的，那就是我們在這裏所說的並不是論理學的矛盾。所謂論理學的矛盾是指一個人因思想不清楚，或是把事實說得亂七八糟，於是也會發生矛盾。但是黑格爾（和在他以後的卡爾）所提出檢討的是真正的矛盾，其中有反題和衝突，是在事物和環境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來的。

矛盾所對準活動的事物或存在，黑格爾把它叫做「肯定」；矛盾的要素，或反題，黑格爾把它叫做「否定」。在我們所舉的例子裏面已可以看出來，這個「否定」並不是消滅，並不是化為無物，却是一方面清除，同時也在建設；一方面是在剷除，一方面却在變為新的存在。這只是向着一個更高階段的運動。關於這一點，黑格爾曾經這樣說過：「直到現在，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論理學上的成見，和通常所相信的說法，以為「矛盾」並不及「同一」那樣是思想和存在的主要的、或內在的特性。其實如把「同一」和「矛盾」比較一下，便知道「同一」在事實上只是簡單直接所想得到的事物之特性，只是無生命的「存在」之特性。矛盾却不然，矛盾是一切運動和生命的根源；事物必須含

有矛盾，才能夠有運動、力量和效果。」

矛盾、反題，或否定所有的作用，在一個膚淺的觀察者，很容易被他所忽略。誠然，他看見世界是充滿着種種的事物；在任何地方有着任何事物，也有他的對方，例如：存在——非存在；冷——熱；光亮——黑暗；溫和——粗魯；快樂——苦痛；歡喜——悲傷；富——窮；資本——勞動；生——死；道德——邪惡；觀念論——唯物論；浪漫主義——古典主義等等。但是膚淺的思想並不覺得它所對着的是一個矛盾和衝突的世界；它只知道世界是充滿着各種各類形形色色的事物。黑格爾說：『只有主動的理性，能把種種的錯雜現象歸納為反題。必須在種種的現象被推到這樣一點的時候，這些現象才會變成互的，互相激動着，由此產生否定的階段；這是進步和生命的中心動力。』必須由於反對的力量和要素之分化 and 開展，才能超過否定的階段而更向前進展，達到一個更高的音的地位。黑格爾接着這樣說：『但是如果缺乏力量來推進矛盾，來使它更向前發展，那事物或存在，也要在矛盾中被打擊得粉碎的。』（見黑格爾的論理學 Science

了此中缺乏之力量  
第俄俄的力，所以辯  
這是相否之也  
一物故  
81

Logic” 第六六、六九及七〇頁。）

我們如要了解卡爾理論黑格爾的這種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這種思想是卡爾的社會集團鬥爭的學說，不全部的卡爾的思想體系的靈魂。我們可以說，卡爾是暫時不在注意社會發展中的矛盾；因為無論在什麼地方，一有了矛盾（反題——社會集團鬥爭）表現出來，依卡爾（黑格爾也這樣）的看法，向着更高階段的進步便在這裏開始了。

講到這裏，我們已熟悉辯證法中的兩個表現，就是肯定和否定。我們已知道，在思想和現實上的生長過程中，先有這兩個階段。但是這個過程並不是這樣就算完了。它還需要一個第三階段。這個第三階段，黑格爾把它叫做「否定之否定。」由於否定之繼續的發展，建立一個新的事物或存在。

如再用我們在上面用過的例子來說明，便是：地殼的完全冷卻和凝結，中等階級國家的勃興；普羅列達利亞特的勝利；這種事情都表示否定之停止或拋棄，這樣一來，矛盾解決了，在發展的過程中一個新的階段也達到了。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也稱為正

## 題、反題和綜合。

爲更要明白了解這種思想，使心目中得到一種更清楚的印象起見，讓我們舉一個蛋來做說明的例子。蛋是肯定的東西，但是它裏面包含有一個胚種，這胚種在漸漸生長的當兒，漸漸消耗着（就是否定）這個蛋的內容。但是這個否定並不是僅僅破壞和消滅；相反地，這否定的結果是這個胚種發展成爲一個生物。這否定完了的時候，雞便由蛋殼裏衝破出來了。這就是否定之否定；由這樣所發生的東西，在有機體上比原來的蛋更高了一個階段。

這種人類思想以及自然和歷史的發展方式，黑格爾叫做辯證法，或辯證法的過程。這辯證法同時也是一個觀察的方法和哲學。黑格爾用下面的話語說了他的辯證法的概要：

「科學的進步所需要的一件唯一的事情，同時也是我們所要明解的一個基本的原則，那就是我們要認識下面這個論理學的原則：否定和肯定是同樣的重要；矛盾並不

變爲無物，並不變爲抽象的空洞的性質，却在實際上變爲一個特殊內容的否定。……只  
要這個由衝突而發生的結果，這個否定，是一個明確的否定，那末它便有着一個內容。它  
是一個新的概念，但却比前面的一個概念有着更高的、更豐富的內容；因爲它已被否定  
或反題使內容更豐富起來了；所以它含有前者的內容，而且比所含的前者的內容還要  
豐富，它實在是本身和它相反的方面之綜合的統一。依這樣的情形，概念的體系，是要經  
過繼續的純粹理想的過程而形成，而完備；這過程是獨立於外界的種種勢力之外的。」  
(見黑格爾所著論理學第一卷導言。)

辯證法的過程使自己完全達到，不但是由於逐漸的變化，而且也由於突然的飛躍。  
關於這一點，黑格爾說過這樣的話：

「有人說，在自然是沒有突然的飛躍；有一個普通的見解，認爲事物所由來的根源，  
是由於逐漸的增加或減少。但是我們也有從量到質的突變。例如水冷却的時候，並不漸  
漸地變成堅硬；它最初變成軟塊，最後變成冰的堅硬；但是變成堅硬是突然的。倘若使溫

度降低到某度數，水可以立刻變成冰；這就是說，由量（溫度的度數）變到質。（這東西的本質的改變。）」（見論理學第四六四頁。）

辯證法和

社會主義

卡爾最能很精巧地運用這個辯證法；靠着辯證法的幫助，他尋出社會主義的發展律。在他的最早的著作神聖的家庭（一八四四年）和哲學的貧困（一八四七年）裏面，（都是在他正在研究唯物史觀的時候寫的，）也如同在他的資本論裏面一樣，他都是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來研究那些法則的。

他在神聖的家庭裏曾經說過：「普羅和財富（在後來卡爾便要改用「資本」這個名詞）是相對立的。在這樣相對立的形勢中，它們構成一個全體；它們都是私有財產的世界之表現。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是它們在相對立的形勢中所佔的特殊的位置。僅僅把它們描寫作一個全體的兩方面，這還不是一個充分的解釋。私有財產不得不保全它自身的存在；隨着它自身的存在，也不得不保全它的對方普羅的存在。在自足狀態中的私有財產，是這個相對立中的肯定的方面。在另一方面，普羅不得不廢除自己，因為要

廢除自己，不得不廢除造成普羅的私有財產。普羅是這個相對立中的否定的方面，是不安定的內在的根源。……所以在這個相對立裏面，私有財產的所有者是保守的一造；普羅是破壞的一造。要維持這種對立形勢的行動，是由前者來的；要破壞這種對立形勢的行動，是由後者來的。從經濟的發展方面看去，私有財產當然是要繼續地被趕到自己瓦解的路上去，但是這只是由於不自覺的發展。這種發展只是由於創造了普羅階級，這普羅階級因貧困而感覺到自己在物質或精神方面的窮乏，被腐化的人類感覺到本身的腐化，因此才奮起掙扎，反對這種制度。

『私有財產制度因造成普羅階級而爲自己留下的罪，由普羅階級來執行；猶之乎「工銀勞動者」因替別人創造財富而爲自己留下的罪，也要由普羅階級來執行。倘若普羅階級得到勝利，它不會變成社會上絕對的東西，因爲它所以能勝利，正是由於廢除普羅階級和它的對方（即私有財產）。這樣一來，普羅階級和它所被決定的對方（即私有財產）都被廢除了。』（見神聖的家庭，在馬昂文存第二卷一三二頁。）

關於辯證法。在資本論第一卷裏有名的第二十四章（第七節），也有着很顯著的敘述。資本主義由中等階級的小有產，經過居間的各階段，最後發展到社會革命；關於這樣的過程，在這一章裏有着很大膽的概述：『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構成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這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就是「靠自己勞力所得的私有財產」的「第一否定」。但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由於自然的過程之必然性，也產生了本身的否定；這便是「否定之否定」。』這裏我們有了這樣的三個階段：正題——私有財產；反題——資本主義；綜合——公共所有權。

辯證法  
觀念論

看了上面所提供的辯證法，也許有人以為黑格爾也可算是一個唯物論的思想家。這樣的意見是錯誤的，因為黑格爾是一個觀念論者。依他看起來，生長過程的根源和要素不在物質的力量，却在論理學的觀念、理性、普遍的精神、絕對或是——在它的宗教式的表現——上帝。在上帝創造世界以前，上帝是一個「觀念」，在它的本身裏面含有『存在』的一切形式，由它依辯證法把這些形式發展出來。這個

是格爾曼的  
物度不過是  
觀念的反映  
形態的反映  
以運動，不才  
是觀念的反映  
才不說，物度是  
物度的反映  
是物度的反映  
覺，自由。……

「觀念」替自己創立一個物質的具體表現；它最初把自己表現於無機性物質的體，隨後表現於植物生命萌芽的有機體，再後表現於動物，在動物裏面，這「觀念」達到理性的曙光；最後表現於人類，在這裏理性超升到精神，獲得自覺和自由，成了自覺的精神之後，它便把自身表現於各民族的歷史，表現於宗教、藝術和哲學，表現於人類的制度，表現於家庭，表現於法律，最後把自身實現於國家，作為它的最後的最高的對象。

依黑格爾的看法，普遍的觀念發展到上帝，和物質世界從無機升到有機，最後升到人的過程，相配合地並行前進着。在人的精神的部分，「觀念」達到了自覺和自由而變成上帝。在他的世界觀裏面，黑格爾是德國神秘主義的一個直接的「後裔」。他的自從來布尼茲（Leibnitz, 1646—1716）以後，比任何德國哲學家都更為高度的「德國化」的德國人。

最可奇異的事情是：依黑格爾看來，日爾曼主義、基督新教、和普魯士邦，都是普遍精神的最高的表現；尤其是一八四八年三月以前所存在的普魯士邦，當時該邦拒絕資產

階級的一切改良和自由主義，全然以政府的強力做基礎。

我們在這裏，並不要得到黑格爾世界觀的一個論理的概念。它不但是觀念論的，而且如我們已經說過，是神秘的；它在人類理性方面之不可思議，好像聖經裏的話語一樣；它是不合理的，在理性的範圍之外的。這世界觀的概念認為宇宙是發生於純粹的理性，發生於論理學的觀念，經着辯證法的過程，有着自由的自覺而向前發展，但是結論却是不合理和頑固的宿命主義。依黑格爾看來，自由主義只是一個簡單的否定，一個純粹破壞的要素，它分裂國家，把國家分解成爲許多個人，由此破壞國家的團結和組織的力量。他責備巴力門制度，說巴力門制度所要求的是『每件事情都須經過他們（許多個人）所表示的權力和同意才能發生。在巴力門裏多數人的意志推翻內閣，推翻之後，由反對黨起來握政權，但是只要它是政府，它也要受巴力門裏的多數人的反對。這樣一來，煽動和不安繼續着下去。這個衝突，這個糾結，這個問題，便是歷史所要應付的事情；這個問題在將來總是要解決的。』照我們看起來，巴力門制度正是因爲有着不安定和煽動，有

着它的對立和相抗，應該特別合於黑格爾的口胃才是，可是他却恰恰相反，不以巴力門制度爲然。這又怎樣解釋呢？

黑格爾對於普魯士邦的關係，可用他的強烈的愛國情緒來解釋。他的性格在政治上很強烈地使他傾向國家主義。在他青年的時候，他親眼看到日爾曼帝國的完全瓦解，深深地痛心於德國情況的困苦。他曾經這樣寫着：『德國不再是一個國家了，就是德國所打的仗，結果也沒有替德國爭得什麼榮譽。布根第（Burgundy），亞爾薩斯（Alsace），洛倫（Lorraine）都被割棄了。威斯特發里亞（Westphalia）的和約，有人讚爲德國的守護神，其實由於這個和約，德國的完全分裂在以前更澈底地造成了。德國人感謝萊塞留（Rechenien）法國政治家，他毀壞了他們的力量！』在另一方面，普魯士在『七年戰爭』和抵抗法國的解放戰爭中的成功，喚起他的希望，認爲能救德國於危亡的是普魯士邦。關於這個思想，他於一八一八年十月在柏林大學的講演開幕詞裏，和他的關於腓特烈大帝（Frederich the Great）的講演詞裏，都有着暢快而熱烈的表現。

所以凡是依他看來似乎可以凌駭普魯士邦權力的任何事物，都被他一概拒絕。這位辯證法專家竟被國家的感情所克服了！

但是黑格爾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不靠他對於「世界創造」的解釋，也不是靠他的德國國家主義的政治學，却是靠他的辯證法。他運用着這個方法，探討廣博的人類知識，由此散播了令人驚異的許多唯物論的、嚴格科學化的觀察和暗示，倡導活的歷史觀，認為人類由發展而達到自覺和自由。這種概念使他的弟子和讀者們受到他的感動，由此使他們能夠更作向前的研究，使他們能夠從一切的神秘主義裏面解放出來。黑格爾哲學有唯物的傾向，關於這一點的例子，下面所說的很可供參考。他的歷史哲學裏面有一個全章討論世界歷史之地理的基礎。在這一章裏面，他有下面的幾句話，和他平日把國家神化的說法顯相反。他的那幾句話是這樣：「一個真正的國家和一個真正的中央政府之建立，必須在階級的區別已經有了的時候；這時財富和貧窮都很大。這時社會裏有着一種情況，有許多人按照他們從前所習慣的方法，不能再滿足他們的需要了。」此

外還有一個例子，就是他對於希臘人建立殖民地的解釋：

『這個殖民地的突現，尤其是從特勞哀戰爭（Trojan War）到賽拉斯（Cyrus）的時期內，是一個特別的現象；這個特別的現象可以這樣解釋它：在各個市鎮裏，人民有最後決定國事的權，就這一點說，他們可算是把統治權握在自己的手裏。因為長時期的和平，人口大大地增加，市鎮也大大地發達，很快地聚積了多量的財富，此時不免隨着來的現象是多數人的痛苦和貧窮。依我們現在意義的所謂工業，在那個時候還沒有；那時的土地都很快地被獨佔了。可是貧窮階級裏面有一部分却不願被抑制在貧窮的境域，因為每個人都覺得他自己是個自由的公民。於是唯一的出路是殖民。』

就是在下面所引的一段，也很可注意；這一段的內容，認為哲學的體系只是已成的事實之結果或反映，所以拒絕烏托邦的一切渲染。這一段的內容是這樣的：『……哲學常是太遲出來說一句話，指示世界是應該怎樣的。哲學既是宇宙的意象，它的發生，必在真實已經完成它的構成的過程，和達到最後模樣之後的時期。這個世界觀所指示的，必

然地要被歷史證實；例如理想要能顯現出來和真實相應，只有在真實已完成了之後；理想所改造的是這同一的世界，是從真實的內容去了解的世界……密內伐（Mineva 羅馬神話中的智慧的神）的貓頭鷹只在黃昏的時候才開始飛翔啊。」（見法律哲學序文。）

沒有唯物論者能夠說得比這句話更好：貓頭鷹——智慧的象徵——只在夜裏，只在世界的忙碌的活動已過去了之後，才開始它的飛翔。同樣地，我們先有了宇宙，然後才有思想；先有了存在，然後才有意識。

這樣看來，黑格爾就是他自已學說的一個例子，因為在他自己就有矛盾的要素同時存在着。他的心裏含有觀念論和實在論，但是他却未曾用推理的過程，把這些矛盾的要素引到矛盾的尖銳點，由此達到一個更高階段的思想。而且因為他認為哲學的任務只是認識事物的原理，並有系統地在理論方面把這原理應用到廣大領域的真實，更加上他的神秘的傾向，所以他仍然只是一個觀念論者。

新得  
兩派

黑格爾是普魯士邦的哲學的代表，但是他的保守主義却可悲地和德國資產階級的逐漸覺醒的意識，不相容起來；這個資產階級在經濟方面雖仍微弱，但是已嚮往着更自由的國家制度和一個更大的行動自由，這種願望已經更強烈地發展在普魯士邦和其他日爾曼各邦的較大的市鎮和工業中心。『青年黑格爾派』奮發起來，在哲學的範圍，擁護這個資產階級的覺醒，好像『青年日爾曼』一派在文學領域內所做的一樣。

正在卡爾還在大學的時候，青年黑格爾派開始攻擊黑格爾弟子中的保守的部分和普魯士基督教的怪誕。這新舊兩派的對抗，表現於宗教的哲學和政治的文獻，但是這兩種傾向同時發現於同一人的却很少。史都勞斯 (David Strauss, 1808—1874) 德國理性主義的神學家，對於福音作直率的批評；費爾巴哈 研究基督教和一般宗教的特質，他在這一部門，把黑格爾的觀念論轉變為唯物論；鮑爾 (Bruno Bauer, 1809—1882) 德國神學批評家，從歷史和哲學方面，對於基督教起源的因襲的武斷，加以痛駁。但是

在政治方面，他們都仍然停止在個人自由的階段；就是他們都只是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可是當時在青年黑格爾派裏面，也有若干不甚知名的人，他們對於政治的意見，却屬於自由主義的左翼，例如路格（Arnold Ruge）便是其中的一個。

但是在當時，青年黑格爾派的人沒有一個曾經運用辯證法，來對他們的老師的學說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後來還是青年黑格爾派裏面最年青的一個——卡爾——第一次把黑格爾的辯證法引進更高的階段，應用到社會科學方面去。卡爾已不為黑格爾所知道了，否則黑格爾也許在死的時候，心裏要覺得更滿足些，或者反而要覺得更慌亂一些，也說不定！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德國詩人和作家）是一八三〇年和四〇年間屬於黑格爾一派的，曾經敘述過下面關於黑格爾的一段軼事：這軼事是否真確雖不得不知，但却也很足以做個例子，用來說明這位大師學說的難懂。

據說黑格爾躺在牀上彌留的時候，圍在他牀前的弟子們看見這位大師的憂慮而憔悴的面容上，皺紋加深起來，便問他為什麼這樣悲傷，並極力安慰他，提醒他在他身後

留下了許多敬仰他的弟子和信徒。黑格爾喘着回答他們：『我的弟子裏面沒有人了解過我。』只有密希勒（Michellet）曾經了解過我，『可是他接着歎一口氣說下去：『就是他也誤解了我。』』

黑格爾死了之後，他的弟子們裏面就發生了差異的意見，尤其是關於他對於上帝、不朽、和耶穌人格的學說。有一部分所謂『右翼』對於這些問題傾向於傳統的說法。反對他們的有『青年黑格爾派』就是進步的『左翼』屬於這一派的有路格、鮑爾、費爾巴哈、和史都勞斯（耶穌傳的著者）。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Karl Marx, by M. Beer.)

## 黑格爾對於卡爾的影響

絕對

依黑格爾看來，宇宙之內在的、基本的特質是「絕對」；這「絕對」在本質上是理性的或理智的「存在」，於是黑格爾就把它叫做「理性」。『理性』是「真實」的基礎，我們所見的世界只是它的表現。這個表現的過程，在黑格爾所著的哲學百科全書裏面有全部的敘述，雖則有些方面是並不詳細的。這部著作分爲三部分，代表『理性』所表現的三個主要的階段。這部百科全書的第一本是論理學，這可說是這個表現之直接的、抽象的、純粹的形式。這自然是肯定，換句話說，它是黑格爾『三題律』(“triad”)的第一個要素。這部百科全書的第二本是自然哲學，它敘述自然界，即客觀的世界、物理科學的世界。在『三題律』裏面，它是反題，或否定，因為它和『理性』之抽象的形式（即表現於論理學的體系）是相反的，必須有一個居間的、不同的階段，

在這裏便是自然界。自然和其他一切的相反一樣，這敵對的兩方面——正題和反題，或肯定和否定，——必須有一個合題或否定之否定來調和。這部百科全書的第三本就構成這樣的一個綜合。這第三本叫做精神哲學，它研究人類和人類制度的領域。思想和自然的對立，便完全融化在人類的社會制度範圍裏面。

精神哲學本身又分爲三個部分：第一，『主觀精神』就是個人精神的發展；第二，『客觀精神』即人類的歷史，和人類社會制度的特質；第三，『絕對精神』即個人和社會之最高的結合，這結合是得自人類的三個最高的部門——藝術、宗教和哲學。最後『絕對』達到了它的大目標：自我實現。這自我實現的獲得，是由於它的自我發生的敵對之調和——『抽象的普遍』和『具體的特殊』間的敵對，個人和社會間的敵對，主觀和客觀間的敵對。這是黑格爾有系統的哲學之終局，因為他的哲學的最高的目標，最特別的終局，也就是所謂『絕對真理』，也就是所謂『絕對』，它本身已在最後成功了。

黑格爾的  
歷史哲學

歷史的全部過程，可用這樣的幾句話綜述下來：一個民族的精神是『普遍精神』之具體的實現；但是這只是不完全的實現。除了這個不完全的實現之外，『普遍精神』把『更完全的』實現，安排在這民族的思想 and 理想裏面，——至少是這民族的更前進部分的思想 and 理想。這『完全』和『不完全』彼此對立相抗着；有着這樣真實和理想的矛盾的社會，便被一個新的社會取而代之，於是便開始着一個新的歷史紀元。這個新的民族精神，在本身裏面包含着過去歷史的一切，但是仍須受到同樣的沒落過程。

偉人在歷史上雖是有重要的意義，但是開創和成功這些歷史上的變化，却不是靠偉人。偉人不能夠把原來沒有他不會發生的事情，由他可以發生出來。偉人們的所以偉大，是在乎他們能夠比平常的人先感覺到『精神』的目的。偉人的功用只是加速歷史的過程。

關於『絕對真理』一點，恩格斯認為黑格爾犯了一個很嚴重的矛盾。恩格斯以為

辯證法的過程既然是和全體的真實是一致的，任何人要說已經達到了『絕對真理』，像黑格爾那樣，便是笑話！——因為任何個人，他本身只是這個發展過程裏面的一分子，他怎樣能夠知道這個過程的全體？尤其是因為這個過程或許是沒有終局的。但是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裏面，沒有比『絕對真理』——完全的真理——更為重要的概念；同時也沒有概念像『絕對真理』那樣，和辯證法的運動之一般的傾向立於相反的地位。

唯物史觀  
的哲學理  
論和黑格  
爾哲學

卡爾的信徒似乎尤其反對黑格爾的這個學說，因為『真實』就是『理性』，而『理性』又是自我表現於人類精神之最純粹的形式（例如論理學）那末世界之基本的特質，必須由複雜的、一長串的人類觀念顯示出來。因為依卡爾的信仰者看來，這是給與單純的觀念以『先天性』使單純的觀念優越於世界的事實，但在實際上，前者顯然是不能優越於後者的。這個問題，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只是形而上學的詭辯，可是依卡爾的信仰者看來，這個問題不僅是很厲害地隱約出現於社會的理論，而且也很厲害地隱約出現於實際的方面。人們必須明白他們的觀念

和真實間的關係，這樣才能夠充分知道自己能力怎樣大（同時也不估量得過高）；否則便要變成完全地、無望地、懦弱；依卡爾的信仰者看來，人們的觀念是和他們所處的環境相應的，而這種環境的特色，却是決定於它的基本的，也就是決定於它的經濟的結構。衰落的社會制度在本身裏就產生有新社會的胚種，而這些胚種又依次產生人們的前進的觀念。有着這些前進觀念的人們，在行為上當然要受到這些觀念的影響；這影響所達到的程度，常要使社會的秩序完全改變。

代替黑格爾所主張的『自由』——精神的要素，——卡爾的信仰者却把經濟、生產工具和交換，視為最基本的動力；一切歷史時代的特性，和由一個時代到別個時代的轉機，都是由於這種經濟的推動。

依卡爾的信徒看來，在一切社會裏面，在一切時代裏面，外面的複雜的風俗和制度，（使一個民族具有它的特色和特性，便是這種風俗和制度）其主要的特性都是由經濟的結構引伸出來的；這種風俗和制度，都不過是這經濟結構之忠實的反映罷了。生產

工具和生產品交換之最直接的反映，是表現於「交換的方式」和與此種方式相適應的階級。在這個中心的周圍，便建立着全部政治的、宗教的和社會的組織。只要這些組織的特性是仍然適合於當前盛行的經濟制度，這些組織便要給與這經濟制度以種種便利，使它格外鞏固起來。但是經濟的結構却是辯證法的、或發展的；換句話說，經濟的結構必然地要繼續變化、發展、生長，終於要變為新的、更適合的方式。可是很不幸的是：生產的機器雖依着它所特有的法則而常在向前發展，而生產的方式，也就是附屬的組織，（即「分配的方式」和相應的階級）却不能跟上這些變化，變成不適合起來了，反而阻礙甚至和新的經濟秩序發生衝突。這種新舊的衝突所取的形式，是兩個階級的敵對：一個是代表舊的形式，掙扎着要維持自身的繼續生存；還有一個是新的形式，是要企圖代替舊的形式。這樣一來，歷史的變化是由社會層的鬥爭而造成的；這種鬥爭的結果，總是被壓迫階層的勝利，這被壓迫階層由於經濟的原因，負有建立新社會制度的使命，用革命來推翻舊的統治階層；這舊的統治階層，却在盡力保護着已不適用的生產關係。

依卡爾的信徒看來，這個新社會就是這兩個敵對要素的「綜合」。因為從來沒有東西能夠真正地、完全地被毀滅掉；在一切的事物，都有它們的敵對的方面，在這正反之間有個鬥爭；但是無論怎樣，沒有事物會被它的對方所完全消滅，——不但不會消滅，而且還要產生一個新的要素，這新的要素包含由敵對兩方裏面所修正的、融化的，但却仍然存在着的東西。例如在新的經濟制度裏面，也含有更高階段的舊的生產方法裏面一切有用的特點。這些舊的特點和新的特點融化混合之後，（這些新的特點，也是舊的所產生而滋長起來，和自身對抗的，）便構成新社會的具體的材料。

這個一般而抽象的唯物史觀，初看起來，似乎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很不同，但是彼此之間却有令人驚異的相應的地方。

黑格爾的「精神」概念，相應於卡爾的社會經濟力的概念，因為這兩個概念都被視為一切歷史進步的基礎。在他們的兩個體系裏面，還有一個相應的概念，就是他們都注重一個完全的社會，一個全體的社會，或一個「具體的社會」。據黑格爾看來，這樣一

個社會之一般的特色，是要靠它的歷史的水準，也就是『自由』向着『完全實現』的進展中所達到的階段；社會之一般的特色，不過是這個階段的具體表現。和這個截然相反的是卡爾的見解；依他的意思，任何社會的全體，（它的宗教的、政治的、美術的、和教育的組織及意見，都包括在內，）它的模型和格調，都要靠『工具』的發展所達到的階段；換句話說，就是要看生產工具所達到的複雜情況和效率到了什麼程度。

在這促成歷史進步的兩種最不同的方法裏面，還有一個特別的類似黑格爾和卡爾的信徒都認為新社會的『胚種』是發生於舊社會的『殼』裏，或者引用另一種說法，其先被黑格爾用過，後來卡爾也用過，那就是說新社會的『胚種』出現於『舊社會的子宮』裏面。依黑格爾看來，所謂『胚種』即種種理想，這些理想是人羣中更進步，更開明的部分所支持，所努力推進的；這一部分更進步，更開明的人們，能實現更爲發展的『自由』。在卡爾的體系裏面，所謂『胚種』是更爲複雜，新的和更有效率的生產方法，漸漸代替陳舊的工具和組織，新的生產方法含有一種改變的『分配方式』和這種『

分配方式」相應的，當然還有新的階級的對立；這新的生產方法，連同和這方法相應的階級，以及階級的意識形態，便是新社會的「胚種」。在黑卡爾兩種體系裏面，理想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黑格爾的體系裏尤其重要，）但是他們兩人對於理想的見解却彼此不同。依黑格爾看來，這種理想的出現是由於理性的必然性；就是說「自由」要經過一串逐漸發展的、彼此相關聯的階段，由一個轉到別一個「自我安排好的」敵對——這裏所指的是或多或少的「自由」的理想——最後變成完全自覺。但依卡爾的信徒看來，這些「理想」却是多少直率地代表和這些理想有關係的階級之經濟的利益；這些理想的效用，是各階級用來爲本階級的經濟利益而鬥爭的工具。最後我們要指出的是，這種衝突的結果，在兩方面都是一個「更高階段的綜合」；在這個更高階段裏面，敵對的兩方——正題和反題——都已被「揚棄」了。（譯者按「揚棄」譯自德文 *Aufheben*，或譯音爲「奧伏赫變」，意思是說棄却陳舊的部分，昇揚到更高的階段，並綜合成爲新的主體。）

有一點有趣而且重要，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兩位思想家都顯明地說過，羣體、民族、階級、構成歷史研究的單位；因此，他們並不主張所得到的一般的原理也可以適用於個人。

還有一件事實也頗爲重要的是：卡爾幾乎不加修正地採納了黑格爾關於「偉人」在歷史上任務的結論。依黑格爾看來，「偉人」不過是非常地覺醒聰明，或能幹，並且如在前面已經說明過的，能夠在別人之前，先發現在「自由」發展中的其次的步驟，向前努力幹去，領導運動向着目標前進，最後當然或早或遲達到成功；因爲人們所願有的變化，無論怎樣，終於是要到來的，他所能成就的只是某種程度的加速罷了。這個見解根本和卡爾的一致；卡爾也主張偉大的人物是相宜的環境所造成的，——認爲他是有着足夠的聰明和幸運，來做兩個鬥爭階級裏面的這一個或那一個階級的領袖，這階級是獨立存在於他之外的。倘若他在裏面做着頭兒的那一羣成功了，他便成爲一個歷史的英雄；倘若那一羣失敗了，他也許仍不致被人忘却。

唯物史觀  
的具體理  
論和系統  
的哲學學

卡爾既決定物質的要素是在歷史上有着主宰的勢力，他第二步斷定：在物質的基礎裏面，最有勢力的是經濟。關於這一點，卡爾和其他唯物史觀的哲學家如巴克爾（Buckle）及孟德斯鳩等不同，因為卡爾認為歷史在

基本上是一個變化的過程；本身是靜止的東西，顯然不能產生在根本上是個運動的東西，所以僅僅用物質環境來解釋歷史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採用一種更適當的解釋：依這個更適當的解釋，生產工具由於本質上內在的必然性（這並不是說有一種神秘的內在的力，只是工具之自然的進化和改善），擴充並發展起來；每次生產工具的重要改革，隨着來的是全部社會組織和這個改革相應的變化。

根據這個經濟的基礎，卡爾的信仰者把社會分為三大階段：（一）「文明以前」或太古康敏主義時代；（二）文明，或私有財產時代；（三）將來康敏主義時代。在這個三階段的分法裏面，不僅是「三」的數字上含有黑格爾「三題律」的暗示，在意義上也含有這樣的暗示，因為將來康敏主義的時代，是以前兩個時代的真正的綜合。那個時

代的特點，將要和太古康敏主義時代很相類，不過它的基礎却和太古時代大不相同。在太古時代，人們謀生所用的是「文明以前」的方法，專靠漁獵爲生，將來的康敏主義便不再這樣了，它知道高度機械工業的一切優點，（却消除了現在的缺點）——在文明時期裏面長時間發展而成的產物。

卡爾的一般歷史的「三題律」中的第二個階段，相應於黑格爾的歷史的全部時代。黑格爾拒絕允許「建國以前」的民族在歷史上佔一個地位；卡爾的信徒却從私有財產發生之後，就作爲文明時代的開始。（私有財產的維持，需要國家的組織。）這樣看來，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全部時期，在時間上只合於卡爾所研究的人類發展範圍裏面的二個部分。

關於這方面，還有一個奇異的差異，值得我們注意：依卡爾的信徒看來，有個將來的、最所願有的時代，構成他們計劃中的一個主要的部分；黑格爾却不然，他似乎覺得日爾曼的世界已足夠代表「精神」的完全實現。雖然他也曾經不一致地暗示過，美國也許

可以作為將來的國家——這將來究竟是什麼？黑格爾怎樣能把這個見解和他以前的不是偶然提到的說法相照應，這却是我們所不易懂得的了。

卡爾主義者所提出的中間的時代，即「文明時代」也就是私有財產和國家已發生的時代，是由較早的時代發展而成的。這發展之所由生，是因為某種經濟的變化，尤其主要的是犁的發明；犁的發明造成分工，使奴隸制度有利可圖，於是便使奴隸制度建立起來了。私有財產既已發生，國家便出現，成為私有財產的保護者。這個見解和黑格爾的概念恰恰相反；照黑格爾的說法，國家正是「自由」達到「自覺」的標識，因為國家和成文的法律是聯在一起的；非到「自由」的「自覺」表現於成文的紀錄，例如法律的條例，黑格爾不承認「自由」有達到「自覺」的可能性。

依卡爾的信徒看來，「文明時代」裏面的三個部分代表三種不同的社會形式；這三種不同的社會形式又根據三種不同的私有財產的形式。在每一個階段裏面，都有着兩個主要的階級：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也就是生產工具的所有者，和使用生產工具的工作者。

人。(「社會之種種經濟的形式，例如建立於奴隸勞動的社會，和建立於工銀勞動的社會，它們彼此之間的主要的差異，是要看每一種這樣的社會從實際生產者，即勞動者榨取剩餘勞動所用的方式。」這幾句話見於卡爾資本論二四一頁。)

關於上面所說的「文明時代」中的三個部分，卡爾的信仰者採用下面的三個名稱：第一個階段叫做古代社會，是建立於奴隸勞動的；第二個階段叫做封建社會，是建立於農奴勞動的；第三個階段，即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它的特色是一種特殊的束縛形式，叫做工銀奴隸制度。

比解釋歷史上任何階段更為重要的，還有一件事，就是發現一種社會滅亡和另外一種社會取而代代之的種種原因。在黑格爾的體系裏面，關於這方面的解釋，幾於完全說是由於非物質的、被尊崇的力，如所謂「自由的自覺的程度」；由於「精神」之最完全的代表之努力，使下面的事實能夠實現；就是不但「一個」而且「多數」或更好是「一切」都得到「自由」。在別一方面，卡爾的信仰者却把一切歷史的變化歸納於經

濟的原因。

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解決『社會的生產』和『個人的分配』彼此之間的基本的矛盾；這解決的方法是由於建立一個社會公有的組織，來和生產方法相應這件事的成功，必然地要由革命。

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和『個人的私有』合併而成的一種制度——曾經代替或否定了封建主義。封建主義社會的特色是：既為個人的生產，也為個人的私有。在這個地方，反題顯然不僅是正題的反面，它却是一個發展，部分地、不完全地、包含有它的前面的一個階段。例如：封建主義裏面的個人私有，已被資本主義採去了，同時封建主義的其他方面，即個人的生產，却被廢除了。同樣地，將來的康敏主義時代，即前兩個時代的綜合，也將由反題裏面發展出來，因為資本主義裏面的『社會的生產』將和新社會裏面的『社會的公有』合併起來。

(The Logical Influence of Hegel on Marx, by Rebecca Cooper, 1925)



## 卡爾所受的其他影響

時代和人物

要澈底了解卡爾，必須也用卡爾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他。卡爾也是他的時代的產兒。他的學說的體系，是由他的時代裏某種經濟的和社會的現象所引伸出來的論理的概念，並靠着他的幾個前靠的先鋒工作和思想，做檢討的出發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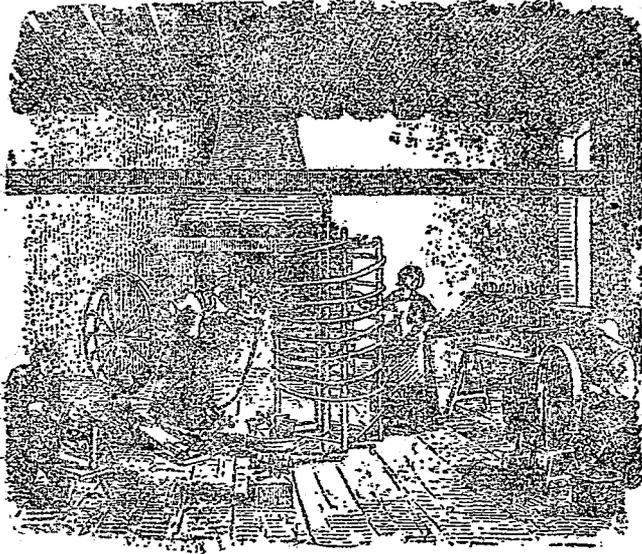
兩件要事

有兩件重要的事情，對於卡爾的思想有很重要的影響：一件是法國革命，還有一件是英國的工業革命。（註）據路格所說，在一八四三和一八四四年間，

譯者註：工業革命的原文為 Industrial Revolution，有人譯為『產業革命』或『實業

革命』，是指英國在十八世紀末葉三十年間，生產方法上發生了根本的革命，使工廠中的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廠的徒手勞動。在工業革命以前，英國只是個農業國，但在工業革命期間，不過數十年，增加了許多大城市，發生了許多大工廠。這工業革命一方面炸毀了封建制度，一方面發展了資本主義，引到資本主義的否定。有人稱為這是近代史的界碑，其重要可以想見。

(一) 命 革 業 工 國 英



織 紡 庭 家 的 國 英 前 明 發 機 織 紡

卡爾已經搜集了許多材料，要替法國國會寫一本歷史，就撇開這個事實不說，我們在卡爾於一八四四和一八五二年間所寫的著作裏面，也可以看出法國革命對於他的思想，是有着怎樣深刻的影響。可是更深刻的影響，是他因為研究英國在一七六〇和一八二五年間經濟改造所遺留的印象。這兩

件事，都是階級運動和階級衝突之顯然的表現。在這個衝突裏面，資產階級——當時更高階段的經濟秩序之代表者——戰勝封建勢力的專制政治，戰勝由國家統制所構成的寡頭政治；在這個衝突裏面，同時有個新的階級——勞動階級——也抬起了頭，開始和戰勝者成了對立的形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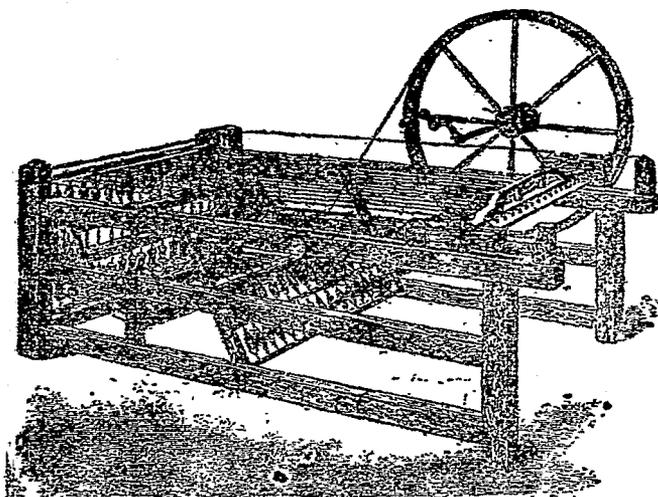
卡爾對於這些事實作這樣的解釋，並把這些事實作為他的歷史觀的基礎。這也是受了黑格爾、李嘉圖和李嘉圖以後英國反資本主義學派的影響。

李嘉圖  
卡爾

卡爾在黑格爾的學說裏所得到的神秘性的觀念，却在李嘉圖和反資本主義學派的學說裏得到經濟的解釋。李嘉圖的著作是出現於十九世紀的最初十年和二十年間；他的著作的內容，是在經濟體系的掩護之下，陳述了工業和土地貴族間的敵對。其實他的著作在實際方面表示了辯證法的真實性。李嘉圖學說的基本觀念大概是這樣：

資本是社會的動力和文明的創造者，但是資本的效用所造成的結果，却不為資本

(二) 命革業工國英



機織紡的明發所 (James Hargreaves) 工布

家所享受，而為土地貴族所享受。這是他所提出的命題。其次我們要看他怎樣證明他的這幾句話。一切商品的價值都包含於生產這些商品所費去的勞動量。一切商品的價值都表現於生產的成本。這成本的最重要的成分是工資和利潤。工資和利潤是立於敵對的地位。倘若工資增加，那末利潤便要下落；反過來說，倘若工資下落，那末利潤便要增加。工資是包

括生活需要品的一定的分量，這分量要足夠於使得工人能繼續做工。無論何時，生活的費用增加，工資顯然地也要增加起來。依事實的表現，這種情形是真實的。下面所說的理由，更能使這種情形格外清楚。因為資本有增加文明的效果，工作的機會隨着增加，人口也隨着增加，結果生活需要品的要求也隨着增加。這樣一來，農業必然地要被擴充起來了，但是農業的土地却是有限制的，而且土地的性質也有種種的不同。因農業的擴充，較劣的土地也被用到了；要耕種較劣的土地，勢不得不用更多量的勞動。勞動量既然決定商品的價值，生活的費用因而增加，地租也因而很快的增高，工人們要求更高的工資，於是僱主們的利潤便被減低了。而且還有一種情形也要注意到的。一方面農產品的價格增高，一方面工業產品的價格却減低，因為由於機器的發明和分工的嚴密，製造品的生產只需要少量的勞動。這樣一來，資本替文明的社會所做的大部分的工作結果，只是利潤的減低，資本的貶值，和工資的增高。可是工資的增高對於工人並無益處，因為糧食的價格一天天增高，全部的利益都落到土地貴族的手裏。這些土地貴族對於文明的推

進絲毫沒有貢獻，但却由於地租和保護關稅，竟得坐享其成。

這樣看來，李嘉圖的學說體系是利潤、工資和地租間的矛盾；或布爾喬亞、普羅列達利亞特和貴族間的矛盾；不過在這個矛盾裏面，布爾喬亞和普羅列達利亞特的敵對還在未發展的狀態中。

李嘉圖的原理發表的那一年（一八一七）正是英國的社會主義開始勃興的時候。在那一年，奧文在倫敦的一個公開集會裏，宣布他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二年後有人對於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作第一次的批判。這種批判認為：李嘉圖雖說勞動是價值的來源，但是他却認資本是在社會裏具有創造作用的要素，勞動階級不過是資本的附屬物。其實恰恰相反，因為工人們創造價值和剩餘產品，這價值和剩餘產品都受着資本階級的支配。

這類著作對卡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是在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剩餘價值論裏面可以顯然地看出來的。他完成了李嘉圖所暗示的和反資本主義學派從李嘉圖所

引伸的觀念。

呼聲  
的  
臨陣

英國反資本主義學派從李嘉圖所歸納的觀念，在政治的意義方面，表示英國工人第一次有了階級意識的覺悟，第一次有了反抗資產階級的覺悟。正

好像李嘉圖的關於價值和地租的理論是資產階級反抗貴族作戰時的臨陣呼聲，——這個臨陣的呼聲創造了自由貿易運動，並粉碎了土地貴族的權力，——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理論成爲普羅列達利亞特反抗布爾喬亞的臨陣呼聲，也可以說是勞動階級的「獨立宣言」。英國的普羅列達利亞特缺少一個哲學家，對這個觀念作澈底的研究，得到邏輯的結論，幸虧有卡爾出來專心研究這個問題，並且在哲學上用科學的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把研究的結果貢獻給勞動階級運動。

依卡爾看來，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理論，是普羅列達利亞特反抗布爾喬亞的根據，好像李嘉圖的地租理論是布爾喬亞反抗貴族的根據，或「社會契約」和天賦人權的學說是資產階級反抗專制政治和神權的根據。

綜合的  
體系

卡爾從黑格爾、李嘉圖、和英國反資本主義學派所提出的要素，從他對於法國革命的研究，對於英國工業革命的研究，對於英國和法國社會主義的研究，成功了一個綜合的體系。這體系的使命是要引導人類從已往的束縛的歷史，踏進新的世界；在這新的世界裏面，精神的文明要圓滿地發出它的燦爛的光輝。這在卡爾的心裏，一定是覺得愉快和歡樂的。人們必然地將要離開貧乏的境域，轉入自由的世界；在這個新的世界裏面，人們必然地不必再做替別人謀利的工具，却有着他們自己的目的，自由地和伴侶們聯合起來，為大眾服務而工作。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Karl Marx, by M. Beer)

## 卡爾的理論體系

唯物論  
的誤解

有些人有一種誤會，以為一個唯物論者的為人總是粗陋的、卑鄙的、和自私的。他們以為一個唯物論哲學家的觀念，總是和粗陋的享樂生活結不解緣，以為這種人總是要睜開眼睛想投機！他們以為任何「理想」或「高尚的」動機，在這種人的特性裏，是一個絕對沒有關係的要素！

這種見解當然是荒謬的。哲學的觀念論或唯物論，和實際生活中的理想的動機，絕對不可混為一談的。在哲學上的觀念論，或唯物論，所指的只是這個問題：我們是否要從我們的感官所能知道的世界以外，去了解真實的世界？所謂真實的世界，也就是這世界有一種圓滿的和獨立的存在，因此在它的本身就含有它自身的存在和發展的法則。觀念論者認為環繞並包含着我們的這個物質的世界，並沒有獨立的存在；某種非物質的

東西，即觀念才有獨立的存在，因此才有它們（指觀念）自身的發展法則；物質的世界只是跟着這些觀念的發展，物質的世界不過是這些觀念的影子或表現罷了。在別一方面，唯物論者却宣言說：唯一的真實的世界，只是我們的感官所知道的物質的世界；而且，在我們由感官的幫助所獲得的知識之外，我們不知道什麼；觀念沒有，也不能夠有任何真實的、獨立的存在，觀念不過是由我們感官所知道的物質世界的反映罷了。

哲學  
和  
經濟

卡爾的批評者還有一個毛病，好像把卡爾的『哲學』和『經濟學』拆開，彼此間絕對沒有關係似的；乘着批評者自己的高興，往往容納其中之一，而拒絕其他的一個部分。其實卡爾的『哲學』正是由於研究人與物在歷史進展中的經濟狀況所歸納而成的通則；他的『經濟學』也只是他的一般的歷史理論，在特殊的經濟結構（即資本主義制度）中的應用。

資本主義  
生產  
的特點

資本主義生產之顯然的特點是：在這個制度之下，人並不生產物品，只是生產商品。換句話說，他並不生產他自己要用的東西；他所生產的東西，只

是要賣給別人，至於別人怎樣用，不是他所注意的。他不像以前在別一種生產制度裏面那樣，生產物品備自己用，他現在所生產的却是要拿到市場去的商品。所以卡爾在他開始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時候，就說這樣的話：『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盛行的社會裏面，其財富只是商品之鉅量的集聚；這財富的單位是單獨的商品。所以我們的研究要開始於商品的分析。』必須先分析商品，我們才能得到一把鎖鑰來澈底了解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的財富之種種特性。

交換價值和使  
用價值

一件商品的顯然的特性——這特性使一件物品能夠成爲一件商品，——是它的交換價值。這就是說，這件東西除了它具有供人消耗的性質，使買它的人可以那樣使用之外，它還具有給人交換的性質，即不用它做自己消耗品的人，可以用它達到交換的目的。所以一件東西的交換價值，雖然根據這件東西終究能供人消耗的特性，可是交換價值却和這使用價值完全不同，交換價值的變化也獨立於使用價值之外的。其實這兩種價值的特性，可以說是彼此立於敵對的地位：一件東西只在對

它沒有使用價值的人，在他才有這件東西的交換價值；當這件東西發生使用價值作用的時候，它便失却它的交換價值了。這件東西所以能成爲商品，是在乎它的交換價值；因此這件東西在被人用來備作交換的時候，它就仍然是一件商品；當這件東西被支配作消耗品使用的時候，它便失却這商品的特性了。一件東西的使用價值，在一方面，是有着它的固有的性質，是有着它的存在的方式，並不倚靠它所由生產的「社會的形式」；無論它是怎樣生產出來的，它仍然有着同樣的使用價值。在別一方面，一件東西的使用價值，是這件東西和使用它的人彼此間的純粹主觀的關係，所以一件東西被不同的人使用的時候，所發生的不同的使用價值，在這些不同的人方面也是純粹主觀的。在這兩點上，都不在政治經濟學的範圍以內；(註) 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是要解釋在資本主義生產

譯者註：按照現在一般的說法，政治經濟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是研究一切經濟形式的基本特徵，及其發生、發展，以及滅亡的法則；狹義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只是研究資本主義發生、發展、與滅亡的法則。

制度之下的財富之特殊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性質上是純粹社會性的。就歷史方面說，物品先於商品，使用價值先於交換價值。

當我們的財富不是僅僅用作消耗，却仍存有資本主義化的特性的時候，這財富便是資本，便是交換價值的集體。我們已經知道，交換價值不是一件東西所固有的要素，或它的自然存在的條件。我們也已經知道，當這件東西被人用作交換價值時，它在這個人方面，並沒有主觀的關係；這交換價值的存在，並不因為這個人做什麼、或不做什麼，却是一種客觀的屬性，從它所由生產的那個社會裏個人間的社會關係而造成的。因此我們必然地要得到這個結論：資本，即交換價值的集體，只是個人間的社會的關係；資本的種種特性，——資本所以具有這種種特性，就靠它是交換價值的集體，——只是社會關係的結果；資本不過是這社會關係的表現罷了。

社會關係  
 什麼是交換價值和它的集體（資本）所代表的社會關係？什麼是交換價值和資本的種種特性？什麼是統治着它們的存在之法則？它們是怎樣由這

些社會關係所引出；又怎樣受這些社會關係所統治；這些問題的回答，依卡爾看來，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對於這些問題的批評的研究，便是卡爾一生工作所盡瘁的事業。

價值是一個社會關係，所以它是受社會的情況所決定的；價格是個別的估價，所以它是受個別的動機作用所決定的。

又在資本主義到來之後，一個人的勞動力才從他的身體和人格裏分離出來；這個時候，他的勞動力是由他的人格裏「抽象化」出來，得到一種獨立的存在。就歷史方面說，因為有了這個商品（按指勞動力）的出現，資本主義方才有可能性；並且因為這個商品的特異的性質，這個制度（按指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幕才被許多神秘所包圍着，使人如陷入五里霧中，不易了解它的真相。

勞動和財富

卡爾並不主張勞動是財富的唯一的來源。在別的一方面，他却也否認「自然」（包括生產物品所需要的一切物質和力）是與交換價值的創造有關。卡爾這個否認是對的。「自然」是從來就有的。「財富」（這裏所指的意義是有

用物件的集體)也是這樣,可是交換價值便不同。雖然從不可知的太古時候就有「自然」存在着,雖然從有人種以來就用勞動來開發「自然」,但是這兩者的合併,在資本主義出現以前,仍然不能產生交換價值。(使「物品」變成商品的,就是這交換價值。)這樣看來,交換價值顯然是和資本主義制度發生聯繫的東西,所以這個結果是要資本主義制度來負責的,並不是「自然」的責任。

在一八七五年的時候,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在哥達(Gottha)所舉行的全國大會裏,曾經採用了一個政綱,開頭的句子就說:「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來源。」卡爾聽到這些領袖們所建議的草案內容,就寫了一封信,對此點有所解釋。他開始就引這句開頭的話,表示了下面的意見:「勞動並不是一切財富的來源。自然和勞動同樣地是使價值來源(物質的財富就包括使用價值);勞動本身就是一種自然力的表現。」

價格  
和  
價值

我們不要把價格和價值混爲一物。當商品放在市場上的時候,並且在價格交付以前,這時的商品便具有價值;人們肯交付價格,就是因爲這商品具有

價值。價值是價格的原因。不但如此，價值和價格在量的方面，並不能常常一致的一件東西的價格，依據不同的情形，有時可比它的價值高，有時也可比它的價值低。

供給和需要不是「物品」的特性，只是「物品」存在的偶然的情形。供給和需要並不是包含在「物品」裏面的東西，也不是和「物品」的生產有任何聯繫的東西。「物品」所以有它的特性，不受供給和需要的影響。在「物品」裏面，並不含有和其他物品共有的特性，可以叫做供給和需要的條件，因為沒有「物品」在本身裏包含有它的供給的條件；至於關於它的需要，不但不能包含在它的本身裏面，恰恰是表示缺少了它，表示它的存在！所以從論理方面看來，我們當然不能夠說：「供給和需要」這件事能夠成爲各種物品的共有的特性，可以用來作爲價值的來源和估量價值的尺度。（註）

有人覺得供給和需要對於價值似乎也有影響。這只是視官的錯覺。供給和需要所

譯者註：傳統的經濟學認爲供給和需要是和價值有關係，這是因爲沒有從社會關係的發

展方面觀察。依卡爾的理論，只有勞動創造價值，價值是社會關係的表現。

影響的是價格。價格對着價值波動着，把價值當作它的常態的停息處，常被價值吸引着。（譯者按：這可用鐘的搖擺作譬方。）明白了這一點，便知道爲什麼當供給和需要正相適合的時候，價值並不變成零；這時的價格正在它的常態的停息處——價值；這時價格和價值便一致了。

資本主義  
的利潤

資本主義的利潤歷史表示了什麼？那就是資本的利潤率減低的傾向。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本總量」的生長，資本的利潤隨着經常地減少下去。雖然隨着「資本總量」的生長，資產階級所得的「利潤總量」也經常地增加起來，但是按着所用的全部資本做比例的利潤的數量却經常地減低下去，因此某一定數量的資本的利潤率也就經常地減低下去。這在政治經濟學上叫做「利潤率下降律」。

根據卡爾的理論，「不變資本」常是不變的，並不因爲經過生產的過程而有變化。（譯者按：「不變資本指廠屋、機器、原料等等的價值。」在別一方面，「可變資本」却是變化的；再說得具體些，便是在生產過程中要增加起來。）（譯者按：「可變資本」指勞

動力的價值。只有勞動創造價值；資本家的利潤是從剩餘價值來的。

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靠在勞動生產力的增加；因為這個緣故，資本的『有機構成』愈高，這個發展必然地要趨向於減低利潤率；因為利潤是全從資本之可變的部分中得來的，而因資本『有機構成』日高，可變資本經常地比不變資本減低下去。

依卡爾看來，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充滿着內在的矛盾；倘若縱任它自己生存的法則自由地發生作用，那末它自己的發展將要陷入最終的、迅速的破壞。這是因為不但資本主義的法則是含有內在的矛盾，而且資本主義的發展所達到的階段，已使資本主義原來所靠以存在的矛盾，反而摧毀資本主義的本身；破壞資本主義和代替它的各種力量和要素，都正在迅速地、在我們的眼前，一天天成熟起來了。將要取資本主義而代之的制度，已有着明確的形式和大概的模樣，明白地呈現於我們的眼前，叫做社會主義。

卡爾的社會主義是科學的；它和以道德的應用為根據的烏托邦社會主義不同之點，是在乎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必然的崩潰』為根據，但是要明白並解釋這

種必然的崩潰，只有借助於卡爾的價值論。因為這個緣故，在卡爾的理論體系裏面，他的價值論和他的社會主義彼此之間，是有着密切的聯繫。卡爾的社會主義是根據於他的價值論。但是它所根據的是經濟的結果，却不是道德的應用。

觀

念

有些哲學家，像黑格爾，不相信我們的物質世界的真實性。他們相信：唯一真實的世界是觀念的世界；物質世界只是「絕對觀念」依着它本身的發展法則向前發展之表現。依這些哲學家看來，觀念對於歷史的全部途徑，有着很大的影響，那當然是不成問題的。依他們看來，除了這觀念的發展外，歷史的全部途徑中就沒有什麼東西是真實的。這些哲學當然是真正的觀念主義者。但是在相信「物質世界的唯物性」的哲學家裏面，卡爾最能認識觀念所有的真實性。據卡爾看來，觀念是堅強地根於真實，因此當這些觀念存在的時候，它們就有着永續的影響，是容易被改變的。他的這種見解，根本和有些人不同；有些人認為觀念只是有着空幻的存在，從無何有之鄉來的，在我們的歷史的存在裏面，沒有什麼特殊的存在的理由，因此，觀念的消失和我們的

社會環境簡直沒有關係。卡爾便不然。他對於觀念的重視，我們在討論「人類是造成自己歷史的要素」的時候，對於這一點是要特別加以注意的。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Karl Marx, by Louis B. Boudin)

## 卡爾的歷史解釋

發展  
法則

辯證法是發展的法則，在一切領域裏面：在自然、社會、和人類的思想裏面，都可以覺察得到的。一切現象在它們的生長過程裏面，都是以矛盾為根據而向前進的；都是以正題、反題、綜合為根據而向前進的。沒有東西能享受一種永續的存在；每件事物都要過去的，留出地位來給更高的秩序。每件東西都是生在相抗的暴風雨中，充滿着不和諧，養育在矛盾中，發達於敵對中，死在反題裏面。

對於人性的直接的、強迫的動作，是由人們所屬的階級出發的。社會建立着廣博的基礎，養成人們一般的眼光和習慣；但是特殊的性質和詳細的情形，却受着人們所屬的階級的影響。嚴格地說起來，人是他的階級的產物，和他的階級是一致的。他的觀念和利益，他的目的和態度，他的行為的方式，他的全部的心理，都是他的階級所特有的。卡爾在

他的資本論第一卷的序文裏，就宣言說：當他揭穿資本家和地主的內幕的時候，他沒有責備個人的用意；他認為他們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特殊階級關係和階級利益的具體化。」生產的方式，這種生產方式所構成的社會的種類，這種生產方式所創造的社會的制度，以及這種生產方式所產生的階級——我們談起卡爾和恩格斯所認為社會環境對於人性的影響，所要注意的就是這些東西。

卡爾和恩格斯的意思，個人的日常生活和歷史的一般途徑，彼此是有區別的；短時間的個人的偶然事情，和從長時代的觀點看去的人類命運的前途，彼此是有區別的。他們都覺得，一個尋常的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在他的日常職務的作爲中，他並不像風中吹的一根毛那樣，自己一點作不得主；他不是僅受外部刺激的、唯命是從的犧牲者。一般地說來，他是一個有判斷、有計劃、有理想、有奇想、有熱情的人。他常常能夠深思遠慮，選定計劃，並實行他的計劃。在某限制內，他是有着意志的人。但是普遍歷史的進展，却是另一回事。在表面上看來，它也許好像是種種波動的、胡亂的、莫測的動作之表現，受着動搖無

定的人類幻想的控制；但是在骨子裏，它却是受着一定的、一致的、普遍的法則所支配的。它是人類的歷史；但是它却受着堅定的法則所統治着，如同自然一樣。在歷史裏面，沒有人的意志是有決定作用的原因；但是外部的、靜默的力，却以鐵一般的必然性，施展它的作用，向着一個無可抗拒的目標前進着。這些推進歷史的力，主要地是生產制度和辯證法。人造歷史，誠然；但是他們造歷史，不是出於他們的自由的意志，却是順應物質的經濟條件的命令。歷史是在種種條件之下造成的；這種種條件不是選擇得來的，是在當前發見的。

偉人  
和  
領袖

至於偉人和領袖，他們不能夠抗拒一般的潮流；他們不能夠使歷史的激則之持續的動作所織成的力的密網，把他們自己做的經緯線加進去。著名的人物不能完全不顧當前時代的需要，而另行創造不相干的問題；他們也不能逆着社會的激流，或和社會的現實不接近，而能解決當前的問題。必須在環境已使新問題的解決方法成熟

的時候，新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法才發生。恩格斯曾經這樣解釋過：倘若一個偉人能夠不顧歷史的必然性而成功新的事業和決勝的行動，那末『他也儘可以早生五百年，免去人類在五百年間所犯的錯誤，所遭受的衝突和苦難！』一個真正的領袖，只能了解在一定情況中發生作用的各種的力，解釋得出時代的符號，促成適當的行動。他的行為如能和這種種的力配合適宜，並忠實地依照着它們的囑咐做去，他便能夠執行他的任務。

階  
級

一個階級的界說，可說是一羣人民，他們在某種生產制度的某種社會裏，依下面的兩種區別而同處於一個相同的地位：一方面是勞工過程所需要的財產之所有者，一方面是非所有者；或另一種說法，一方面是享得個人的自由者，一方面是個個人自由被剝奪者。卡爾在他的著作裏，對這一點雖然沒有過整個有系統的解釋，但這是他的見解，在他的散布着的討論裏是很可以看得出的。

對於本羣的利益具有強烈的意識，對於本羣所用的方法具有充分的知識，對於本羣的目的能鍥而不捨，對於本羣的鬥爭能百折不回，持續地向着本羣的目標向前邁進，

團結一致，組織起來——這是卡爾所說的階級。

無論具體的詳細的內容是怎樣，社會的發展總是建立於生產方式之繼續不斷的辯證法的過程；社會進化之實際的進行是由於各階層的鬥爭；這些階層承受着否定的使命，看到他們的利益受到危迫，因此參加鬥爭，由此使一個經濟時代變成別一個經濟時代。社會的動力和卡爾所說的階級，是彼此有着密切的聯繫；歷史上的各頁就是階層鬥爭的各頁。卡爾曾經說過：『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他並且說：『文明一開始的時候，生產便開始建立於制度的敵對，國家的敵對，階級的敵對，聚積的勞動（即資本）和當前的勞動間的敵對。沒有敵對，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現在還遵循着的法則。』在舊的、複雜的社會機構裏面，使革命成爲社會的和政治的進步之強有力的要素，就是由於這個階級敵對之迅速的和熱烈的發展。』這樣看來，階級和社會階層鬥爭的觀念，是卡爾的『歷史解釋』的一個主要的部分。生產的方式和生產力是歷史之基礎的，但却是『非人格的』客觀的要素。階級供給活的執行者，執行『物質的力』的命令；階級造成

社會的結構，爲「意識形態」的根據。

辯證法  
和經濟  
時代

依黑格爾，「觀念」是「非人格的」；它是浮蕩在人事的上面和人事不  
生關係的，只是自我表現於辯證法的過程裏面。但是依卡爾和恩格斯，歷史上  
的辯證法却是一件塵世的事情，和人類的利益是混合在一起的。依卡爾和恩格斯，辯證  
法在每一個決勝的時代，都需要人類來參加努力的。它和階級、利益及社會階層鬥爭有  
着不能分離的聯繫。而且照他們兩位看來，辯證法在歷史方面有着深遠影響的動作，只  
在生產的各種「經濟時代」的範圍內發生效力；它的最高的成功，是在促成由一個時  
代到別個時代。卡爾所說的由氏族制度到蓄奴制度，由蓄奴制度到封建制度，由封建制  
度到資本主義制度：這一串制度的連續，就是勞動依辯證法向上發展的各階段的連續。  
在別一方面，黑格爾却未曾替辯證法畫出這樣一個有着「經濟的里程碑」做標誌的、  
向前進展的大道。

卡爾和恩格斯都極重視辯證法。辯證法是他們解決一切神秘的鎖鑰；是他們多年

的「最妙的工具」和「最銳的利器。」這是恩格斯自己所承認的。他曾經說過：「辯證法在事實上是自然、人類社會、和思想的運動及進化的法則的科學。」

自然和社會是一切觀念的來源，並不是由上帝使人在心裏能夠神秘地創造和外面世界完全脫離關係的觀念。

卡爾和恩格斯屢次鄭重地指出：真實反映於人的腦子，呈現為觀念或意象。

「依黑格爾，人類腦子的生活過程，即思想的過程，（這思想的過程，在「觀念」的名字之下，黑格爾甚至把它變成一個獨立的主體，）是真實世界的創造者；真實的世界却只是「觀念」之外面表現而已。據我看起來，恰恰相反，理想這東西無非是在人類頭腦中所翻譯（或轉移）過來而加過工的物質的東西罷了。」（見資本論序文）

「我們認為觀念……是真實事物的圖畫。——這樣一來，……黑格爾的辯證法被倒置過來，在以前它好像是倒轉身用頭向下立着，現在却倒回來用腳站着了。」（見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

(Karl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by M. M. Robey)

## 唯物史觀的解釋

爲着要解決使我（卡爾自稱）迷惑的疑難，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用批判的態度，重新檢討黑格爾的法律哲學。這本書（按指卡爾自著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言，曾經登載在一八四四年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書。我由研究所得的結論，相信法律的關係和國家的形式不能由它們自身來解釋，也不能用所謂人類精神的發展來解釋；恰恰相反地，它們的根源是在人們的物質的生活條件裏面。這種物質的生活條件，黑格爾仿效十八世紀英法人的榜樣，概括起來，叫做「公民社會」（註）我並相信，要分析研究這「公民社會」必須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着手，因此我的其次的事情，便是注意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

我由這樣研究所得的一般的結果，成爲我以後繼續研究的南針。我現在把這節

一般的結果簡括地敘述如下：

人們在社會的生產中，加入某種必然的、莫由自主的關係。

這些生產關係，是跟它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的。

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

在這個基礎上面，建立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結構。

和這個基礎相應的，有着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即所謂輿論。

在任何社會裏所盛行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決定着一般人的社會的、政治的、和

譯者註：『公民社會』原文爲“civil society”，係指資產階級的社會而言，有人譯爲『有

產者的社會』，又有人譯爲『市民社會』。不過『市民』與『公民』略有不同，一般所謂『公

民』，係指享有公權而能參加選舉的人民而言。所謂“civil society”，係對封建社會而言，在

封建社會裏，人民沒有權利可言；在資產階級的社會裏，有一定資格的人民，即享有公權和選舉

權，故把資產階級的社會亦稱爲“civil society”，譯爲『公民社會』似較適當。

精神的生活過程。

決定人們生活的方式，在基本上並不是他們的意識；相反地，決定他們的意識的却是他們的社會的生活。

當社會中的物質生產力便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這生產力便和現存的生產關係相衝突了；或借用法律的說法，發和舊的財產關係相衝突；生產力在這舊的財產關係裏面，一向是活動着的。

這些陳舊的財產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方式變為障礙物了。於是社會革命的時代便開始了。

隨着經濟基礎的改變，全部重大的上層結構，或遲或早，也要經過一翻革命。

在我們研究這種革命的時候，我們必須把兩種變化分別清楚。在一方面，我們有着經濟的生產條件的物質的變化；這個變化可用自然科學精確地確定的。

在另一方面，我們有着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總而言之，意識形態

的變化；藉這種意識形態，認識這種衝突，並爲着突破這種衝突而鬥爭。

這個衝突是出於社會集團鬥爭的形式。

我們對於個人的判斷，如僅憑他自己對自己的感想，這判斷所得是很有限的；同樣地，我們對於革命時代的判斷，如僅憑關於它自身的意識，那判斷所得也是很有限的。

反過來說，這種意識，應從物質生活的矛盾，應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的現有衝突，來加以解釋。

一個社會制度，尚有餘地足讓一切生產力可以發展的時候，它永遠是不至沒落的。而新的更高一級的生產關係，在其物質的生存條件，在舊的社會母胎內尚未完全成熟的時候，是永遠不會出現的。

所以人類所提出的，總是他們能解決的問題。

倘若我們仔細地研究一下，便可看出：問題本身，僅在解決它們所需要的物質條件已具備，或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的。

就大概的輪廓說來，我們可把亞細的、太古的、封建的、和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  
視為社會經濟形態遞進的幾個時代。

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乃是社會生產過程之最後的一個敵對方式；這敵對的意義  
所指的，不是個人間的敵對，却是發生於社會中個人生活的種種條件。

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發展着的生產力，同時却造成了解決這個敵對所需要的  
的物質條件。所以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將是人類社會前史階段的末了一幕。

(Preface to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 唯物辯證法

辯證法的實際運用

歐洲通訊月刊 (European Messenger) 的作者說 (譯者按：這個月刊的作者曾在一八七二年五月份的該刊上批評過卡爾所著的政治經濟學)

批判)「……卡爾所特別注意的只是一件事：根據準確的科學的研究，證明社會的關係、明確而有序地、連續表現於各種形式，其中都有着必然性；他並在可能範圍內，完全正確地陳述種種事實，用這種事實作為他的意見的基礎和辯護。當他證明了現今社會秩序的必然性的時候，他同時也證明現今秩序必將轉變的那個不同的秩序之必然性，無論人類對這個轉變相信或不相信，覺得或不覺得。卡爾把社會的運動看作自然的過程，控制這個運動的法則，不但是獨立於人們的意志、意識和目的之外，而且反而要決定人們的意志、意識和目的……意識的要素，在文明的歷史中，既然只有着附屬的作用，那

末以研究文明爲材料之批評的探討，顯然更不能以任何意識的形式或結果做基礎。這個意思就是說：這個探討的出發點不是觀念，只是外面的現象。這個批判要把一件事實和別一件事實比較對照，不是要把一件事實別一個觀念比較對照。在這個探討裏面，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對於這兩件事實都要盡可能地加以準確的研究；而且在對照中的這些事實，要真能構成種種演變的要素，尤其重要的，是我們對於演變的各階段的連續和關係，要加以準確的分析。但是有人却要告訴我們說，經濟生活的一般法則總是常常同一的、同樣的，無論這些法則是用於現在或已往。這恰恰是卡爾所否認的。根據他的意思，經濟的生活並沒有這樣的抽象的法則……每個歷史的時代都有它自己所特有的法則……當生活經過了演變中的一些的時代，向着別一個時代進展的時候，它便受着新法則的支配。簡單說一句，經濟的生活經過演變的歷史，好像我們在生物學的其他領域中所習見的情形一樣……較早的經濟學家把經濟的法則和物理學及化學的法則相比，他們實在誤解了經濟法則的性質……倘對現象作更深刻的分析，便知道種種社會

的機構都有基本上的差異，好像植物的機構及動物的機構也有基本上的差異一樣。……不但如此，同一的、同樣的現象在不同的社會的機構裏面，也受着不同的法則的支配；因為這些機構在一般的結構上，是彼此不同的；因為這些機構的各個器官彼此也有變異的；因為這些器官在不同的情況之下，也有着不同的機能。例如卡爾就否認人口的法則是在一切時間和一切地方都是同樣的。他以為每個演變的階段都有它的人口法則。……生產力發展的時候，社會的情況和支配社會情況的法則也隨着變化。卡爾的目的，是要從這個立場去研究並說明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所以他只限於應用嚴格科學的名詞、陳述對於經濟生活的細密研究所應有的目的。……這種探討之科學的價值，在乎發現特殊的法則；這些法則能指出一定的社會機構之根源、存在、發展和死亡（按即崩潰或消滅），並指出更高的一種社會機構對於舊機構的替代。這在事實上便是卡爾所著的書的價值。」

這位作家對於我（卡爾自稱）在實際上所運用的方法，描寫得這樣親切，並對於

我個人在這方面的運用，描寫得這樣寬大，他在這裏所描寫的除了辯證法外，還有別的什麼呢？

辯證法  
的差異

我（卡爾自稱）自己的辯證法，不但在根本上和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而且恰和他的相反。依黑格爾看來，思惟的過程（黑格爾在觀念一名稱之下，甚至把思想過程變為獨立的主體）是現實的創造者；依他看來，現實只是這個觀念的外部的表現。反過來說，依我的見解，理想這東西，只是在人的腦子裏所轉移過來並加過工的物質的東西。

在三十年前，當時黑格爾主義仍然風靡的時候，我對於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祕作用的方面，曾經加以批判。但是在我著述資本論第一卷的時候，現在得到德國知識界傾聽的那班暴躁而傲慢的庸俗人，竟喜歡把黑格爾……作「死狗」看待。因為這個緣故，我直率地公開宣言我是這位大思想家（按指黑格爾）的弟子；甚至在資本論裏討論價值論的時候，戲用着黑格爾的術語。雖在黑格爾的手裏，辯證法遭受了神祕作用，但是這

件事並不能抹煞這個事實：黑格爾是第一人把辯證法運動的一般的形式用概括而定全自覺的方法詳細解釋出來。在黑格爾的著作裏面，辯證法好像一個人倒立着，你必須把它倒轉過來，使它用腳立住，倘若你要發現隱藏在神秘的外衣下面的合理的核心。

在神秘形式之下的辯證法，在德國所以曾經風靡一時，因為它似乎能說明當時的現狀。在合理形式之下的辯證法，在布爾喬亞和空論的代言人看來，便是誹謗和憎惡，因為這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時還包含着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使我們知道這現狀是不能免地要崩潰的；合理形式的辯證法所以使他們覺得是可憎惡的，因為這辯證法是從運動中，因而是從暫時的方面來考察每個既成的形態，因為它對任何東西不屈服，在本質上就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資本主義社會的十足的矛盾的運動，已使實際的布爾喬亞，在現代工業週期變動中，有着切膚的感覺：這一循環的最高點，便是普遍的危機，這樣的危機又在重新接近了，則它還是在初步的階段。由於這個危機的普遍和尖銳，就是新的，神聖的，普魯士·日爾

曼帝國的驟然顯貴的人們，也將不得不為辯證法所震動了。

(Marx's Preface to the Second German Edition of "Capital" )

形式論比印  
即形而上的家  
終極二字印  
絕對之義，故，各  
之是合物根到  
底的思想。

# 辯證法和將來的社會

形式論  
理學和  
世界的

卡爾的辯證法有一點和黑格爾的辯證法相似，也是否認形式論理學的概念有終極的正確性。形式論理學的基本原則是矛盾的排除。在形式論理學的範疇裏面，一個事物不能夠是而又非是，不能夠同時是自己而又含有不是自己的東西。顯然地，倘若真實是被看作靜止的，論理學家的這個立場是對的。一個不能變化的事物，不能夠是而又非是，不能夠同時是自己而又含着不是自己的東西。只要我們停止在不變化的領域內，形式論理學是立得住的。

但是，如同卡爾和黑格爾所堅執主張，靜止的領域並不是真實的世界。它只是抽象的世界；這種抽象的世界所以能夠是靜止的，只是因為不是真實的。人的腦子能替自己造成靜止的概念；但是這種概念永遠不能適當地表現真正的事物。個個事物，只要是真

實的，就都是常在變化的過程中，都是要繼續地變成在以前不是的東西。真實永遠不會停止着，人也不能叫它停止的；他所能使它停止着，只是在他自己的腦子裏造成抽象的概念——可是他往往就把這抽象的概念當作真實的本身，或至少當作真實之真確的和充分的代表。

其實論理學不能排除矛盾而且必須承認矛盾是發展律的一個極重要的部分。

人類歷史的動力 終極的真實既然是物而不是觀念，那末人類歷史的終極的動力，必然是物而不是觀念。什麼物？卡爾的回答是：歷史的基本的力是變化中的「生產

力」。生產力因為人們的知識和機會的增加而擴大，人類的歷史也隨着經過相應的發展階段。人類進化的每一階段都和生產力發展的每一個廣泛的階段相應。

卡爾認為，生產力所達到的每一階段都在人們裏面開始一種經濟的關係，用來推進這生產力的運用；和這經濟關係相應的，還有相當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關係；這政治的和社會的關係是發生於經濟的情況，對於這經濟情況也有它們的反作用。卡爾的要點

是這些關係必然地要使人們分成經濟的階級，造成人類社會的鬥爭，就發生於這些階級中間。根據卡爾的意思，正題和反題便是這些階級；綜合便是在歷史的每一次轉變，由社會集團鬥爭中所發生的新階級，直到最後的衝突，建成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這樣才結束了階級衝突之辯證法的過程。

人類新  
歷史的  
辯證法

但是到了那個時候，辯證法的過程又怎麼樣呢？顯然地，它不能再繼續採用社會集團鬥爭的公式了，因為到了那時沒有階級的存在。爲着那時開始的人類歷史的新階段，並爲着繼續出現的更前的階段，一個新的公式是需要的。卡爾這樣寫着：「歷史以前的時代結束，歷史才開始了。」但是什麼是這個沒有階級的社會的新的歷史所適用的法則呢？卡爾信徒的回答是：他們不知道。因爲卡爾認爲每個時代只提出它所需解決和所能解決的問題；人類現在不能而且也無須解決將來的社會主義者的問題。顯然地，這意思並不是說辯證法不再適用了，因爲辯證法的法則除了社會集團鬥爭的公式外，還可以容納許多不同的公式；公式儘管改變，同時並不改變。歷史過程

的辯證法的特質

(Marxian Economics, by Ernest Untermann, 1913)

## 卡爾的經濟學

事實  
和  
理論

我們對於卡爾的三卷資本論加以仔細的研究，便知道這三卷書有着理論的一致，和有機的相互關係。第一卷揭穿生產範圍的秘密機構。第二卷暴露流通範圍的主要動機。（譯者按：流通係指運輸售賣等。）第三卷是在最後把前兩卷所得的結果，應用於資本主義工業之典型的情況，顯明生產和流通間的相互關係。

我們在得到具體的材料以前，不隨便作臆測的理論。我們首先要得到材料，要從直接的接觸所得到的實際的事實裏面，造成我們的理論。我們要使理論適合於實際的事實，不是要強把實際的事實，牽強附會到預存成見的理論裏面去。我們用着所謂歸納的研究法。我們是從具體的事實進行到抽象的理論。我們綜合各事的時候，是從辯證法的觀點去做的。這意思就是說，我們對於世界和社會的看法，是把世界和社會看作正在構

造過程中的東西，不是固定的和呆板的。我們要推究實際事物間的相互關係，和他們在空間及時間方面的連續性，要注意它們的一般的類似和典型的差異，由這些相互關係引伸出一般的結論或理論來。然後我們再把這些理論應用到實際的事物上面去，由這樣繼續不斷地測驗這些理論的真確性，好像我們尋常在算學中用除法來測驗乘法所得結果的真確性。

辯證法的思想之典型的特徵，是把正在構造中的事物，反映成爲因求生存而鬥爭的過程；在這個鬥爭過程裏面，更能適應的勝過不能適應的，經過克服和吸收的作用，向前發展而達到一個更高的形式。我們就是從這個觀點去看資本和資本主義的生產。

資本  
的特性

資本不僅是一件東西。它在基本上是一個剝削階級和一個被剝削階級間的經濟的關係。如果沒有階級，成爲一個經濟範疇的資本是不能存在的。固然，土地可以成爲資本，工具可以成爲資本，消費品和原料也可以成爲資本。但是這些都不能稱爲資本，除非它們印上了資本之典型的符號。這符號就是這些東西被人用作工

具。來。剝。奪。工。人。由。自。己。勞。力。所。造。成。的。產。品。勞。動。和。勞。動。力。在。工。人。的。手。裏。永。遠。不。會。成。爲。資。本。的。當。資。本。和。勞。工。的。關。係。存。在。的。時。候。勞。工。總。是。被。剝。削。的。一。造。

總而言之，被用作資本的東西，在它本身並非原來就是資本。它必須在某種很明確的社會情況之下，才可以成爲資本；在這種情況之下，不同的經濟階級爲着爭取勞工的產品統制權而鬥爭。

我們所以和官派的經濟學家分裂，就在這個地方。這些官派的經濟學家不顧資本所由發生的主要的根源，——對於勞工階級的勞動的剝削，——由此隱蔽了資本的秘密。

此外還有一個條件是貿易。勞工的產品必須在能夠獲得利潤的情形之下出售；這樣，剝削的工具才能具有資本的特質。

這裏要談到商人的資本。商品和金錢，是商人藉以致富的材料。我們一方面有工業的資本，一方面有商人的資本。商人的資本是流通範圍的統治者；在它的直接統轄的範



圖以外，剝削生產者的剩餘生產。工業的資本是生產範圍的統治者；它在公開的市場上購買僱工的勞動力，和購買其他任何商品一樣，直接在生產範圍內剝削它的僱工，控制流通的範圍，為着聚積工業資本的目的，進行着生產。這兩種資本是兩個重要的資本形式，每一個形式都表示一個不同的歷史時代和所盛行的不同的社會制度。

李嘉圖  
的  
價值論

是在英國，為生產劃一新的歷史階段的人物是李嘉圖。他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十九世紀的最初二十五年間。他是工業資本主義的機械生產之典型的經濟學家，因此他是近代形式的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之典型的代言人。

李嘉圖認為：先由已往的勞動在原料和機器裏面  
李 集聚了價值；再由後來工人的勞動在這集聚的價值裏  
面加入新的價值，這新的價值是被分為資本家的利潤  
和工人的工資；他並認為地租是從工業資本家的利潤  
裏面減下來的。依李嘉圖看來，由這樣得來的富然的結

論是工資和利潤的升降，彼此成爲反比例，同時不直接影響價格的一般水準。當價格隨着商品的真正價值波動的時候，李嘉圖主張這種波動是受着供給和需要所調整的。

李嘉圖的這種種主張，都是從他的價值論所引伸出來的。李嘉圖未曾明白了解生產範圍內「資本的有機構成」和流通資本價值的各部分之種種構成，彼此是有區別的，所以他沒有得到價值和剩餘價值問題之科學的解決。他沒有把當作一般範疇的剩餘價值和它的特殊的形式如資本家的利潤、地主的租金、銀行家的利息、明白地分清楚。總之，關於工人他自己的產品所參加的部分，李嘉圖並沒有從他的價值論裏引伸出邏輯的推斷。

不變更  
本利可  
變資本

機器的耗損和原料的使用，在這個限度內，不變的資本價值重現於製好改變了形式。但是資本家並不僅僅於注意不變資本的價值之再生產。他還要購買勞動力，因爲他要獲得新的價值，增加他的資本。這新的價值是在勞動過程中由工人創造出

來的。當工人工作的時候，他就在不變資本的價值裏面，加入他的工資的價值。這工資就代表資本家的可變資本。依這個樣子，資本家的全部資本（不變的和可變的）都由工人的勞動而再生產。但是這樣還不能使資本家獲得利潤。倘若只不過資本家的資本被繼續地再生產，那末資本主義社會的交換價值便不能增加一些兒。所以當工人工作的時候，必須生產更多的價值；這更多的價值，既不存在於不變資本的價值裏面，也不存在於可變資本的價值裏面。這更多的價值，便是剩餘價值。

剩餘  
價值

剩餘價值的意義，是在資產階級全體的全部產品的成本價值之外，所增加的新的價值。

根據卡爾的價值法則，只有勞動力能夠再生產一個某社會現有的價值，能夠生產含有新增的價值的商品。

當然，我們無意的否認有些資本家也做工；是的，其中有一些資本家工作的時間，也許比有酬的再生產的工作所需要的時間更長。在他們這樣工作的限度內，他們是他們

自己的剩餘價值的生產者。可是如果他們同時還僱用工銀勞動者的勞動，他們便是資本家，把他們僱工的無酬的剩餘勞動的價值，放在自己的腰包裏去。

於平均的時間之外，延展工作的時間，由這樣產生的剩餘價值，卡爾把它叫做絕對的剩餘價值。在平均的工作時間內，增加剩餘勞動，也就是相對地減少必要的勞動，由這樣產生的剩餘價值，卡爾把它叫做相對的剩餘價值。

有的資本是投在機器裏面，一些兒一些兒漸漸流通着的；這種資本，卡爾把它叫做固定的不變資本。有的資本是投在原料等等裏面，是在一次流通的（按即一次就用完的）這種資本，卡爾把它叫做流通的不變資本。

在流通部門裏的工銀勞動者（譯者按：例如運輸工人和做買賣的僱工等）之被剝削，好像在生產部門裏的工銀勞動者一樣。但是前者却沒有替資本家產生任何剩餘價值。他們的工作時間比有酬的時間更長的時候，依着更長的時間的比例，替資本家省下已經產生的一部分剩餘價值；他們在這更長的時間裏面，替資本家售出更多的商品，

由此替他實現更多的原來已存在於商品中的剩餘價值。

借款的人付給該款所有者以利息，這利息的來源也像商人的利潤一樣，也是出自生產勞動者所產生的剩餘價值。

減去了利息所餘下的利潤，卡爾把它叫做企業利潤。

商業資本  
金融資本  
工業資本

到了工業資本已經成爲生產的主宰者之後，在任何情況之下，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或說得概括些，可統稱爲商人的資本）不再在流通的範圍內佔優勢了。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式裏面，商人的資本是流通範圍內的主宰者，甚至進攻並侵入生產範圍裏面去。但是當工業資本一旦佔據了生產的範圍，它的「迴轉」

（按即一次的資本流通）便要控制投資於流通範圍的一切資本的「迴轉」。於是工業的生產使商人的資本受工業資本的需要所支配，所以終究說起來，商人的利潤和銀行家的利息，都受工業資本家所收獲的利潤率所決定。我們必須先把工業資本家的利潤解釋清楚，然後才能解釋商人的利潤和銀行家的利息之來源和升降，才能了解它們。

在工業資本的「迴轉」裏面所有的作用。

卡爾對於地租所做的先鋒的工作，如同他在工業的剩餘價值的範圍內

地

租

所貢獻的一樣。卡爾的「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理論（註）是政治經

濟學上唯一的真正澈底和滿足的理論。工業資本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問題以及這種價值在流通中實現的問題，都已解決之後，才能進而解決下面的這個問題：地主從何處受到他的租金，什麼決定地租率？

譯者註：級差地租是由於土地的肥沃程度的不同而產生的。依李嘉圖的級差地租論，因為土地有限，人口增加之後，劣等土地（即最不肥沃的土地）亦須被人用來耕種，決定農產品的價格是劣等土地的生產條件，上等土地的投資（即最肥沃土地的投資）便有着額外的利潤，這額外利潤便構成級差地租。李嘉圖的用意是要指出這是地主不勞而獲的財富。卡爾的貢獻是在級差地租之外，還指出絕對地租。絕對地租是由於土地私有權而產生的。因土地的獨佔，除級差地租外，土地所有者還要加上因為許人用他的土地而收取絕對的地租。

卡爾地租論的基礎，是他的平均利潤率的理論。（註二）依他看起來，資本主義之下的農業利潤率是決定於工業利潤率。經濟的租金，依卡爾的這個名詞的意義，是指「較多生產的農業資本」（註二）所造成的額外利潤，這額外利潤是超過「最少生產的農業資本」所實現的平均利潤。平均的價格，（「最少生產的農業資本」的產品，就依照這平均的價格出賣的，）是等於這產品的成本價格，加上平均利潤率。「最少生產的農業資本」的生產價格，能夠調整其他各種土地產品的市場價格，（譯者按：各種土地是指肥沃程度不同的土地，）無論由這些產品所獲得的利潤是多於平均的利潤，或少於

譯者註一：資本家所賺的利潤對其資本的比例，叫做利潤率。資本家因互相競爭的結果，資本由一部門自由轉入別一個有更多利潤可圖的部門，於是兩者的利潤，終要趨於平均的。故有所謂平均利潤率。

譯者註二：「較多生產的農業資本」即指用於較肥沃的土地的資本；「最少生產的農業資本」即指用於最不肥沃的土地（即劣等土地）的資本。

平均的利潤。

由卡爾的地租論所引伸出來的一般的原則是資本主義的地租（即額外利潤）（註）在一切土地上都絕對地增加起來，（譯者按：這是土地私有權的關係。）雖則這種增加並不和所投的資本之增加成比例。

我們不要把從能生產的資本裏面得來的，以額外利潤為形式的地租和其他同時存在的別種地租相混。資本主義的地租，在基本上是由於勞動的生產力和土地的生產作用。終究說起來它必須倚靠土地的肥沃，因為倘若沒有土地的肥沃，超出工業平均利潤率的任何額外利潤，便失了根據，這是全部地租律的基礎。

譯者註：土地所有人把土地租給資本家，由資本家僱用工人來經營，由工人以無酬的勞動（即剩餘勞動）生產剩餘價值。資本家將這剩餘價值的一部分歸為己有，便是企業利潤，就是他的資本所得的利潤，還有一部分，即超出這利潤的餘額（即額外利潤），付給土地所有人。這付給土地所有人的額外利潤，便是資本主義的地租。

工業平均利潤律含有這樣的意思：一般地說來，工業資本所得的只是平均的利潤；至於工業的額外利潤，那却是例外。在另一方面，地租律却含有這樣的意思：農業的剩餘利潤却是原則的（即非例外的）；除非用在農業的資本，至少能得到平均的利潤，沒有人要把資本投在農業的；要人增加資本到農業方面去，必須能夠得到比平均的利潤更多的利潤，否則便沒有更多的資本增加到農業方面去。這種農業的額外利潤，終究地說起來，除了土地的肥沃，或自然力像水力之類外，不能歸到別的原因；而這土地的肥沃，或自然力像水力之類，資本家却沒有付出什麼酬報，如同任何資本家對於他所得到的平均的利潤，也沒有付出什麼酬報一樣。

剩餘價值  
和利潤

根據卡爾的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理論，表現於金錢的商品價格所包括的，只是不變資本的價值，加上可變資本的價值，再盡量加上競爭容許資本家所能實現於利潤的剩餘價值。倘若商品出售時的價格，是等於生產範圍所給與的全部的價值，那末資本家所得的利潤，便等於他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剩餘價值。倘若這些商品出

售時的價格，是高於或低於它們的全部的價值，那末這資本家所得的利潤，也是隨着高於或低於這些商品所包含的剩餘價值。

(Marxian Economics, by Ernest Untermann, 1913)



## 驅趕的工作和被驅趕的工作

有個名叫里昂的 (Daniel De Leon) 著一本小冊子 (‘Marx on Mallock’) 在那小冊子裏面，作者暗示這樣的意思：依卡爾，經理和監督，由於他們的腦的工作，也在生產財富。這作者並且宣言：依卡爾，資本主義之下所生產的財富，並不是所僱用的勞動者的單獨的產物！其實上面所指出的這些話都是很錯誤的；這些話已很不幸地領導錯了。多少研究卡爾理論的學者。（譯者按：這裏所謂經理和監督，指的當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機關裏的經理和監督。）

這作者在該小冊子第十四頁上並告訴我們說：卡爾「把那個特性（按指起出於各個個人力量的總和的、羣衆的、集體力量）界說爲「社會的力」，「集體的力」，並說這是「集體地」存在於勞動者和他們的指揮者。」這也是不正確的，而且含有惡意的。

倘若「指揮」的工作能生產額外的財富，或這財富中的任何部分，那末生產這額外財富之合作的力量。（按此處所謂「合作」不是指尋常合作社的意義，是指成羣的工作者共同工作，因連合的活動而造成有用的結果，）也費去了資本家所出的某些成本，因為這資本家是要付報酬給他所用的指揮者。但是卡爾却小心地告訴我們，生產這額外財富的額外力量，在資本家是不費去什麼的。……倘若經理和視察員也是「合作」行動裏的一部分，（按這「合作」的意義和上面所說的相同，）卡爾怎麼會告訴我們：「當工作正在進行的時候，」這些經理等等「是代表資本家發命令呢？」這命令的動作，並不是在做着被命令的生產的工作啊！這「指揮的動機」是「要抽取剩餘價值之最大可能的分量」，但「抽取」剩餘價值却不是在生產被抽取的剩餘價值。倘若那額外的財富「相對的剩餘價值」（這是得自勞工「合作」所增加的生產力，）不是被僱用的勞動者之單獨的產物，那末卡爾把它叫做「相對的剩餘價值」有什麼用處呢？

里昂認為指揮的工作（即「對工人工作的工作」『the work of working the

Workers)現在不是由資本家自己做，却由別人來做了，所以資本家在現在是不必要的；這固然是很對的。但是里昂和其他的普羅作家却很錯誤地未同時表示這個事實：對於生產的指揮，並不是被指揮的生產本身，——驅趕「財富生產」的「工作」並不是被驅趕的「財富生產」的一部分；因此「指揮」或驅趕並不是生產財富。里昂有句話說得不錯，他認為剝削工人的「勞動」(即這種「勞動」是用來剝削工人的)是「剝削勞動過程」中的一部分。(誠然是如此，無論這種剝削是直接由資本家自己幹的，或是間接由資本家的代理人幹的。)

其實依卡爾的學說，被剝削的、合作做工的勞動者們，(因合作做工而增加各個人聚集起來的生產力，同時各個人的生產「效率」也比未參加合作以前的增高起來，)——即被驅趕着的勞動者們，用着他們的勞動，做着一切的工業生產。他們甚至生產一切「苦幹的指揮者」的生計，一切資本家的生計，一切其他許多人的生計。

經理和指揮者的腦子工具，其「生產」任何財富的唯一途徑，有些像貨車夫驅趕

着裝了十噸貨物的裝貨馬車上山；經理的腦子工作剝削勞動力，好像貨車夫剝削馬力。其實正像拖這貨車的幾隻馬替貨車夫拖着裝滿的貨物，連那位忙得什麼似的貨車夫的體重也包在內；相類地，被剝削的勞動者生產一切勞動的產物，全部資本主義的社會都靠他們生活，——全部資本主義的社會包括經理、領頭、指揮者、監督、觀察員等等。

(Appendix in Emment's "Marxian Economic Handbook")

## 關於價值論

價值  
和  
似  
值

交換價值表現於金錢的時候，被稱為價格。因為價格依着供給和需要的關係，天天有變動，各地也有變動，於是常有人以為價格和價值都受供給和需要的法則所決定。其實供給和需要的影響，只是要使價格或升或降，並不影響於經濟的「地心吸力」——就是價值——價格只是圍着這「吸力」而或升或降地波動罷了。

卡爾在這方面的貢獻，就是在他的勞動價值論裏面，證明價值和價格都不是在科學分析的範圍以外，都可以歸到有系統的思想範疇裏面去。一切商品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就是都有種種的勞動用在它們裏面——例如有的用着木匠的勞動，有的用着金屬工人或紡織工人的勞動。由於近代技術發展的結果，每一件通常的商品都含有各樣種類及各種技術程度的勞動在裏面，每件商品也含有不少遲滯的勞動在裏面。商

品都有某種人類勞動用在他們裏面；我們可以說，在商品裏含有平均技術的人類勞動，便是『商品都有交換價值』的這個事實的根據。倘若水是清潔的，而且很多，要用多少就可得到多少，在這樣情況下的水，便沒有交換價值；但是如果這水是須要用方法把它弄清潔，或須要運輸到需要它的地方，那它就有交換價值了。我們爲着便於理論上的分析起見，可把一切商品的價值簡化爲一個共同的測量單位：——平均的人類勞動。（有人譯爲中等的人類勞動。）

但是，一件商品除非是有用，就是除非它有着使用價值，那永遠是找不到一個買主的。所以我們所藉以測量價值的勞動，不是無用的勞動，必須是社會必要的勞動。這樣，我們便談到了『平均的社會必要的勞動』這個觀念。

能創造新價值的勞動，必須滿足下面的兩個條件：（一）這勞動的生產力量，必須依照當前流行的效率標準。試舉一個例子。假使在今日還有一羣製造者要用手工來製造汽車，一部汽車用一個模型，那一般的汽車價值是不會被他們所影響的，因爲這樣的

勞動便是可笑的耗費，把社會進化到我們這階段裏所可用的一切方法，都置之不顧了。（三）這勞動的結果，必須造成社會所需要的產品，也就是必須爲『社會必要的』。在這個地方，我們要把『社會必要的』和在理想上所願要的分清楚。例如殺人利器的炸彈，在資本主義的現階段是『社會必要的』可是在一個合理的、平等的社會組織之下，便完全是非必要的了。）

誠然，『平均的社會必要的勞動』是一個抽象的東西，它不是你所能接觸或看得見的東西。所謂『抽象』，我們的意思是利用一個說得出的象徵，

抽象的  
人類的  
勞動

使在思想格外明白，由此可以研究任何對象的某種特性或屬性，和其他的對象分得清楚。例如我們常談起『抽象』的人，這『抽象』的人和一個有着特殊國籍、高度、重量、和年齡的具體的個人，是有分別的。我們就利用這個觀念，把『抽象』的人（舉爲一個例子）和其他抽象的動物比較。在這種地方，我們在我們的腦裏，特把人所以異於其他動物的特性分離出來，以供研究。

依卡爾的勞動價值論，一件商品的價值，在任何情況之下，總是可用生產這商品所需要的『平均的社會必要的勞動』的時間來量度的。價值是創造在生產裏面，不是創造在交換裏面；也就是價值是創造在製造商品的時候，不是在售賣這商品的時候。

由於特殊的各地的情形，或是由於時季的關係，供給和需要可有暫時的升降波動；這種暫時的升降波動，在某一些時間，或在某特殊的地方，可以影響到價格；可是在自由競爭之下，一般的價格，在長時期內，總是要『接近』於價值的。

對價值  
的理論  
的反對

常有人因誤會卡爾的理論在實際上的主張，以致反對他的理論。例如有人以為卡爾的勞動理論是贊同緩慢的、勞苦的、和耗費的工作方法，因為我們能夠把更多的勞動結晶在一件物品或職務裏面，這物品或職務的價值也更大。這個等論很錯誤地假定人類努力的目的在基本上應該是創造價值。我們只要略加思考，便可以排除這個幻想，便可以明白工作之唯一合理的動機是生產財富，——表現於可供一般效用的產品和服務。在這方面，卡爾信仰者和一切眼光遠大和熱心公益的人們一樣，

希望。能。增。加。財。富，同。時。却。要。減。少。生。產。這。財。富。所。必。要。的。勞。動；這。樣，便。要。減。少。工。業。商。品。的。價。值。

有時還有人爭辯，說價值論是不真確的，因為它不能解釋名著的草稿的價格，或名畫的價格，或舊的石刻寶物的價格。但是這種無獨有偶的物體不能算是合於真正商品的意義。價值論是在檢討可被再生產的商品。

(An Outline of Economics, by W. T. Colyer)



# 恩格斯的生平和工作

商  
和  
哲  
學  
人

恩格斯於一八二〇年十一月廿八日生於巴門（Barmen）在德國普魯士邦萊因省的一個鎮，比卡爾小兩歲半。他是一個富有的製造家的兒子，在

一種很守舊的傳統宗教的氣氛中生長起來的。他在



恩本鄉的一個中等學校讀完之後，（該校特別注重古典文學，）又入易北菲爾（Elberfeld）也在萊因省的一個中學校，（該校特別注重物理和自然科學，）但是在最後考試的一年前，他就離開學校，加入

了他的父親的商業。在那個時候，德國在哲學方面正在漸漸地發生一種革命；這革命的最高點是黑格爾的哲學。像卡爾一樣，像那時候的進步的德國知識青年一樣，恩格斯也

受到這個哲學復興的很深的影響，成爲一個黑格爾派青年。雖然他在商業機關裏工作的時候，成績並不壞，顯出他是一個好商人。（其先在巴門，後來在布勒門（Bremen））但是他的心永遠不在這上面，他的一切餘下的時間和思想都用在哲學的研究。

自一八四一年十月至一八四二年十月，恩格斯在柏林的砲隊服役。如同他在辦公處是一個好商人，他在兵營裏也成了一個好軍人。他研究軍事學，後來軍事學竟成爲他最喜歡研究的一門學問。

他在軍役結束之後，回到巴門；在一八四二年十月，他往孟徹斯特（Manchester）在英國（去，担任爾門（Ermen）和他的父親合開的紡織廠的代理人。他在此行的途中，到科倫（在萊因省的一城）的萊因報館去看看，在那裏第一次遇見卡爾。但是他們第一次的遇見是很冷淡的。恩格斯在當時已受到鮑爾兄弟反對卡爾的影響，他和鮑爾兄弟仍然是很接近的；卡爾却已經和鮑爾兄弟分道揚鑣了，後來他和柏林的「自由」學派哲學家也斷了關係，而當時的恩格斯對於這一派仍然是尊崇的。除哲學以外，恩格

斯在當時就已對經濟學有着深切的興趣。在孟徹斯特——資本主義祖國的工業中心，——他得到直接研究經濟學和經濟情況的極好的機會。他這次在英格蘭費去的二十一個月對於他自己以及卡爾的將來的一生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直接研究僱主和僱工間的關係，觀察羽毛幾已全豐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工階級的實際苦況；他對於普羅運動的注意很迅速地深切起來，不久他便參加空想社會主義者的運動，並參加勞工和查梯士（Chartists英國一八三六至一八四八年的新憲運動者）運動。所以他和奧文派的報紙新道德世界（“New Moral World”）和查梯士派的機關報北星（“North Star”）都發生關係。他的哲學的卓見和明銳的智慧，不久就使他深刻地感覺到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的趨勢，勞動者的現今的任務，以及勞動階級的偉大的歷史的將來。在德法年書裏面，他曾經發表文字批判國家經濟，卡爾認為這批判的文章顯示他是一個真正的天才。這批判的內容，已經含有科學社會主義的有效果的胚種了。那時他才二十一歲。

恩格斯  
和卡爾

卡爾和恩格斯，這個時候還各自獨立研究着，一個是根據於法國革命和哲學的研究；一個是根據於英國工業狀況的研究；他們倆對於布爾喬亞社會的性質，怎樣在實際上達到同樣的結論，這倒是一件很可注意的事情。唯物史觀，在他們當時的著作裏，都已露出了它的特色，雖則在那時，這在卡爾的著作裏或許是有了更完整的形式。

他們兩人因為都在德法年書裏發表過文章，彼此互相通起信來；在一八四四年的九月，恩格斯從英回德的途中，到巴黎去訪問卡爾，勾留了幾天。他們兩人對於哲學的和經濟的問題，都有了完全同樣的意見，立即開始合著一本書，叫做神聖的家庭；即對於鮑爾和他的信徒們的批判的批判。

這本書於一八四五年出版。據該書兩位著者的意見，這本書的目的，是要使更廣大的一般人能明瞭空論哲學的幻想。在這本書裏面，他們已經採用了普羅的立場，雖則該書內容直接涉及經濟範圍的還很少。恩格斯只寫了幾頁（印刷的頁數），經卡爾把它

擴充到許多倍數。

雖然恩格斯自己是一個很謹慎的、很辛勤的作家，但是關於這本書，他却許多次催卡爾趕快脫稿，不要因為要把稿子弄得更完備一些，延誤迅速出版的時期。這是因為他相信革命已經迫近。例如在一八四五年的一月，他寫給卡爾的一封信裏就這樣說：『請你留意要把關於國家經濟的那本書趕快寫完。縱然你自己對於這本書有許多不很滿意，——那是不要緊的。時期是已成熟了，我們必須乘着鐵熱的時候打鐵，——現今是最好的時期了。所以請你要在四月間把這本書準備好。照我一樣做法，替你自己定下一個日期，到了這預定的日期，你要絕對地把它寫完，並要設法把它立刻印出來，——要立刻使它出版。』

他們經這次在巴黎聚會，並合著神聖的家庭這本書之後，便開始在歷史上兩個偉人所少有的忠誠的友誼；這忠誠的友誼是他們終身沒有改變的。

他們在巴黎聚會並得到完全了解之後，恩格斯就回到巴門，整理並出版他在英國

對經濟調查所得的結果——這便是有着歷史價值的一八四四年英國勞動階級的狀況一書。

卡爾和恩格斯間的通信，有四卷之多，在這些信裏面，他們討論他們的關於哲學的和經濟的理論，討論他們在當時所讀的和所寫的書，討論當時歐洲的重要時事。他們並討論到勞動階級運動和在歐美的勞工領袖。關於一切科學的發明，實際的和理論的，他們都感到深切的興趣，彼此常常交換意見。

異

趣

恩格斯的家庭很希望他能夠從事商業，當然尤其希望他能加入他父親的商業，但是恩格斯的心靈的每一纖維，都要對這個命運抗議。他的志願是在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在一八四五年的三月，他寫給卡爾的一封信裏有過這樣的幾句話：『我現在過着一個真正的生活。因為會議的事情，和這裏的康敏主義者裏面有幾個人不修邊幅，（我當然和他們有來往，）我的老統治者（按指他的父親）的一切老的宗教狂，又重新被激起了；因為我宣言要明確地拋棄商業，他的忿怒更增加起來了。

不但如此，因為我公開出現為一個康敏主義者（當時在巴門開了幾次會議，恩格斯都出席演說），他愈加熱烈的布爾喬亞的宗教狂了。」

他在這封信裏又接着說：「你想想看我所處的地位。因為在十四日左右以後，我就要離開這裏，不能再和他們爭吵。我讓每件事在安靜中過去，不提出什麼抗議。他們不習慣於這樣的情形，因此他們的精神更高張了。……倘若不是為着我的母親——她真有着一個極好的人格，所差的只是她不能立起來反對我的父親，可是我真愛我的母親——我真夢想不到我肯對於我的熱狂的專制的統治者，有絲毫的退讓。但是我的母親常常生病；每次她有所愁慮的時候，尤其是關於我的事情，她就要頭痛八天。這是難於忍受的。我必須離開這裏；在還要逗留着的幾個星期，我不知道怎樣支持過去。但是總要過去的。」

離鄉

在一八四五年，恩格斯拋棄商業的生活，離開巴門，到布魯塞爾去。他所以要這樣做，有一部分是因為他的家庭和朋友們在他的本鄉，阻礙他的康敏的

工作，但是主要地，還是因為他要和卡爾共同完成他們所共同的、哲學的和經濟的原理。就在布魯塞爾這個地方，他們共同完成了他們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體系，同時並努力使已有的勞動階級運動具有階級意識，把它放在他們的理論體系的基礎上面。

在一八四九年的五月，萊因省有一部分爆發了反抗恩格斯一聽見這個消息，他就趕到行動的區域，就趕到易北菲爾去；但是工人們因被小布爾喬亞所賣，這次的起事弄得虎頭蛇尾。在帕拉替內特（Palatinate，在德國巴威邦）再一次起事失敗後，他悵往瑞士去。他到了佛非（Vevey）的第二天，就寫信給卡爾的夫人，說明他許久沒有寫信的原因，和這次起事的經過。他對於卡爾的近况非常望慮，他在這封信裏說：『我只要得到卡爾是自由的確實消息，那是多麼快樂！我雖在普魯士的槍林彈雨之下，仍常常這樣想：我比其他在德國的人們，尤其是在巴黎的卡爾，所處的地位還更少危險得多了。請你立刻讓我知道卡爾的實在狀況，免我時刻懸念着。』

卡爾在復信裏告訴恩格斯他怎樣爲着恩格斯着急，他們夫婦得到恩格斯的來信

又是怎樣地愉快。在一八四九年的八月，卡爾從巴黎被驅逐出來，決定到倫敦去，他寫信給恩格斯，極力勸他也到倫敦去，因為他再留在瑞士是不安全的，在那個地方，普魯士人是可能抓他的；同時也因為他們兩人同在倫敦可以共同工作。果然，不久恩格斯就隨着卡爾到倫敦去。

回訓

恩格斯的父親不願意看着他的兒子在英國的革命運動中混着，寫信給恩格斯，他要替他在加爾各答（Calcutta，在印度 孟加拉省）弄個位置；但是被恩格斯所拒絕。恩格斯覺得他如果從事新聞事業，（這是他決定要做的事業，）所得的收入儘夠養活他自己。可是在另一方面，卡爾有一個妻和三個年幼的孩子，僅僅靠著作的收入，很難養活他的全家。恩格斯覺得他不能夠立在旁邊，眼巴巴地望着一個像卡爾這樣的偉人消耗他的力量於無足重輕的著作，以求餬口。（他的天才，是恩格斯在巴黎有了密切關係的時候，頭幾天就看出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決定他必須賺得足夠的進款來資助卡爾，使他能夠盡力於完成他們所共同主張的經濟的和哲學的理論。因此

他雖不願意做生意，終於決定回到他父親的商業裏去。於是在一八五〇年，他又重新回到孟澈斯特，在爾門和他的父親所合開的紗廠裏做個職員。同年的十二月，卡爾的夫人曾經寫信給他，謝他對於他們夫婦死了一個嬰兒的同情。她說在她悲痛之中得到他的慰唁的信，給她很大的安慰。她還說：『我的丈夫和我們全家的人都非常地想念你，常常盼望你能來和我們相聚。可是我也覺得你去了，正要變成一個棉業大王，是夠愉快的！』

（譯者按：這是含有說笑的意味。）她勸他盡力幫助他的父親。她說：『我常在想像中看見你是腓特烈·恩格斯（指他的父親）的小股東，尤其好的是：雖然你是在做着棉業，你仍然是老腓特烈……並不離開自由的神聖主義……孩子們常常談起恩格斯叔叔，小惕爾（二三）唱着你曾經教他唱的歌……』

高尚的犧牲

隨後的二十年間，恩格斯和卡爾不過每隔幾時作短時期的相聚，但是當他們未見面的時期裏，幾於每天有討論學術的通信。任何時候，一有些關於經濟學或哲學的意思，被他們裏面任何一人想到，就立即寫信告訴其他一個，徵求他的意

見指教；如果其他一個有新事實可供參考，便用來作更進一步的闡明。當恩格斯在孟徹斯特的時候，除商業上的工作之外，他繼續研究，尤其是關於軍事的歷史和科學。他也研究比較的哲學和自然科學。他曾在一八五二年的三月，說起他的研究俄文，他自恨太少時間可以用來研究斯拉夫問題。他整天勞碌於辦公室，此外每星期要作一份報告給他的父親，要替論壇報寫文章，還有其他報上的文章要寫，他真忙得不可開交了。

在一八六〇年的三月底，恩格斯失掉他的父親；在一八六四年的九月，他成爲紗廠的一個股東。這樣一來，當然要加重他的責任和工作；這不是他所願意的，我們在前就已看出了。我們在他於一八六〇年三月給卡爾的一封信裏，也可以看出他的意思；在那封信裏說，他要把和爾門訂立的合同盡量弄得苛刻，俾在斷然決定的時候，爾門很願意讓他走。從這裏，我們也可斷言他已無意永留在商業場中了。在這些時候，他的收入增加起來，這在他自己和卡爾，當然都是很重要的。

當恩格斯在孟徹斯特紗廠裏工作的時候，他總覺得快快不樂。他和卡爾對於他的

商業工作怎樣看法，我們只要看看下面所舉述的他們的通信，便可以知道。

恩格斯提起，當他的合同在一八六九年滿期的時候，他要怎樣做；他說依當時的情形看來，他大概要脫離商業。他不能自己再創辦一種新的商業。他認為倘若他那樣做，便等於毀了自己。他說：『我最所盼望的，無過於從怯懦的商業裏把自己解放出來；埋頭在商業裏，不但消失了許多時間，而且完全腐化了我自己。我仍然埋頭在這裏面的時候，我簡直毫無用處；尤其是自從我做了股東之後，情形更壞，因為我的責任愈益加重了。倘若不是爲着較大的收入，我真是甯願再做一個職員。』他的唯一憂慮的事情是他如於兩三年後脫離商業，怎樣好好地安頓卡爾。他當然更希望卡爾在著作上終能得到勝利。（同時也從經濟方面着想。）

卡爾無疑地了解恩格斯爲着他的犧牲。卡爾在同復上面的這封信，表示他希望再過一年，他在經濟方面能夠自立。（雖則這希望在物質方面是沒有實現。）他在這復信裏，曾經有過這幾句話：『倘若沒有你（按指恩格斯），我就不能夠把這工作（指資本

論）完成。我可以告訴你，我的心上好像負有萬鈞的重担，因為你主要地爲着我，讓你自己的奇才異能在商業裏面消耗侵蝕了。」

在一八六五年，卡爾自己已慨嘆着倚賴的地位，他在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裏，敘述了當時經濟的困難情形之後，（恩格斯在可能範圍內，總是盡力接濟的。）接着說：『使我勉強支持着的唯一的念頭，是我們兩個人好像合開着一種商業公司，在這裏面我所盡的任務，是貢獻我的時間於這個商業的理論的和黨務的部分。』這誠然說得不錯。恩格斯的犧牲不是僅僅爲着他所認爲具有最高天才的朋友，同時也是爲着促進他們兩人心裏所共同嚮往的，黨的利益和理想，才對於自己的傾向和才力作高尚的犧牲。

#### 軍事

在一八五一年開始的時候，卡爾被紐約論壇報特約著文，恩格斯對他也很有很大的幫助。第一，在那個時候，卡爾對於英文的寫作還未曾熟練。恩格斯把他的文章譯成英文。第二，遇着卡爾沒有時間寫，或人不管服，或所要寫的是關於軍事的問題，或其他關於恩格斯尤爲擅長的問題，恩格斯就自己動筆代寫。往往恩格斯在自己

辦公室的工作和自己的一切研究及著作之外，每星期還要抽出時間來趕寫一兩篇這樣的文章。這些文章寄給論壇報的時候，都用着卡爾的署名；無論是卡爾寫的，或是恩格斯寫的，都很受讀者的珍視。（雖則所得的稿費是怪可憐的。）

在一八五四年的二月五日，卡爾會寫信給恩格斯，告訴他說，他的軍事文章（關於克里米亞戰爭的形勢，曾被論壇報於一八五三年的十一月十五日和十二月十六日登出，作為社論，）竟「震動一時，有許多人認為是斯各特將軍的手筆」（General Scott 是當時的軍事權威。）

困苦中  
的支持

在其次一年的年初，卡爾的唯一一男孩——一個非常聰明而嬌弱的孩子，——生病死了。卡爾寫給恩格斯的信裏有一封說：「我不知道怎樣感謝你為着我而工作的友誼，以及你對於這個孩子的同情。」

同年的四月六日，這孩子死了，卡爾在信裏說：「可憐的默希（Musch）這孩子的綽號（沒有了，——我永遠不能忘記你的友誼怎樣在這樣可怕的時候拯救了我……）」

一個星期之後，卡爾又有信給恩格斯：「自從這可愛的孩子死了之後，這屋子當然是很荒涼孤寂的了。（他是這屋子的有生氣的靈魂。）我們怎樣隨處感覺到喪失了這可愛的孩子，這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我雖經過各種各樣的不幸，但是現在我才了解什麼是真正的哀痛。我覺得哀痛欲絕！……我在這些時候，遭到一切這樣可怕的苦難，只有想起你和你的友誼，只有希望我們在這世界上還有合理的事情要共同努力，這才支持了我。」

## 資本論

的商榷

當卡爾在寫他的主要的著作資本論的時候，他不但在這裏面所發揮的每一理論都要和恩格斯討論，而且關於製造家怎樣準確地運用他的資本的種種部分，他對於這資本的看法，他在賬簿上怎樣分法，等等，卡爾都要向恩格斯詢問正確的材料，恩格斯也把正確的材料告訴他。還有關於工資的價值、剩餘價值等等，恩格斯也把重要的材料供給卡爾，因為他自己做了製造家，他能把最直接的材料供卡爾參考。

卡爾怎樣珍視恩格斯的幫助、指教和意見，在他的信裏有許多段的話可以顯示出

來。例如在一八五九年的六月七日，他在信裏提起批判，他說：『最先讓我告訴你，我知道你喜歡這書的第一部分，我是怎樣的愉快，因為關於這件事，只有你的判斷在我是重要的。我的妻看見我等着你的判斷，焦急得什麼似的，她也感到怪有趣。』後來在一八六七年六月間，卡爾又寄幾張資本論的稿子給恩格斯看，並在信裏說：『我希望你對這四張能滿意。以前的稿子得到你的滿意，這在我比世界上其餘的人說的什麼，都來得更爲重要。』遇有必要的地方，恩格斯對於卡爾的著作也自由地加以批評；卡爾對於他的批評總是從善如流，常常依照他的批評把稿子改換過。

最後在一八六七年的八月十六日，卡爾校對完了他的偉大的著作第二卷最後一張，同日他寫信給恩格斯：

親愛的腓特烈：

我，剛才校完最後的一張……

序言昨天校完，已送去。這樣，這卷是完成了。這件事的可能，要感謝你。倘若沒有你爲着我的

的自我犧牲，我永遠不能成功這三卷的繁重的著作，我要充滿着謝意來抱你。

附上兩張改正過的校樣。

十五鎊已收到了，非常感謝。

祝願你，我愛，我親愛的朋友。

你的卡爾

——資本論出版了之後，恩格斯無孔不入地替它大做廣告，使全世界不得不注意它。當時全世界都極力用緘默來埋沒這部偉著。

暫  
疏  
的  
時  
疏  
遠

在一八六三年的一月，恩格斯和卡爾之間發生了一次唯一的疏遠，這件事也適足以表明他們的深深的永續的友誼。

在孟徹斯特的時候，恩格斯認識了一個愛爾蘭的家庭，姓柏姆斯（Burns），他對他們的女兒裏面的一個發生熱烈的戀愛。這女兒名叫瑪利，他和她同居爲夫婦好多年。她是一個聰明的、嫵媚的、善談諧的女子，對恩格斯也有着熱烈的愛。在一八六三年一月

六日，瑪利突然地死了，大概是由於心臟病；在死的前夜，他與她還在一起，她在那時的身體還是很好的。她的死對於恩格斯是一個可怕的打擊；但是恩格斯寫信把他的喪妻的哀痛告訴卡爾之後，卡爾的回信只用兩三行來表示他的悼惜，隨着就敘述他自己的家事的困難情形。恩格斯把這封信攔下了六天才寫回信，在回信裏責備卡爾得到他的不幸消息後的『冷淡』。恩格斯在信裏對卡爾作這樣的對照：『一切我的朋友，甚至庸俗的人們，對於我的哀痛，都表示比我所預料的更多的同情和友誼。』卡爾顯然很爲之感動，就寫信去爲着他的似乎冷淡的態度道歉。其實這倒不是因爲卡爾對於恩格斯的不幸沒有感覺，却是因爲恩格斯那封報喪的信到的時候，卡爾的債戶剛剛來到他的家裏，收買舊貨的人正在屋子裏，各種商人正在叫囂着討債，家裏已沒有糧食，他的女兒燕妮（Jenny）又在生病。他在那個時候簡直愁慮得幾乎發狂，不能工作，不知道向什麼地方向什麼人去商量。

但是恩格斯很快地就原諒他，立刻寫回信給他說：『我要謝謝你的誠意。你前信給

我的印象，你自己也能了解的。一個人和一個女子同住了許久，她一旦死去，是不能不悲痛傷悼的。我覺得我的青年的最後殘餘和她一同埋葬了。當我收到你的前信的時候，她還未曾在墳墓裏。我要告訴你，你那封信縈迴於我的腦際者一星期；我當時不能忘記它。現在請你不要介意，你這次的來信已經消釋一切了。我覺得愉快的是：我沒有連同瑪利失去了我的最老的最好的朋友。』他在這封信裏接下去敘述他立刻救濟卡爾經濟困難的計劃。

卡爾再復他的信也有着同樣的口氣。他說：『我現在可以毫不拘束地告訴你，我過去幾個星期裏的苦惱，都不在乎，我所唯一焦急的事情，是恐怕要破壞了我們的友誼。我屢次對我的妻說，這全部困苦的事情，在我看來，都不在乎；我所難過的，是這些布爾喬亞的愁慮和這些愁慮的煽動，竟使我在這樣的時候，不慰唁你，而反把我私人的困難來麻煩你。』

結

婚

在一八六四年的年底，恩格斯和瑪利的妹妹利西 (Lisa) 結婚。他們相處非常地快樂，直到她在一八七八年死去。恩格斯夫人是一位很聰明的女子，和她的丈夫志同道合，終身是一個熱心的新芬黨黨員。（按新芬黨是主張愛爾蘭脫離英國統治的。）他們沒有子女，但是恩格斯夫人有一個姪女，名叫瑪利愛倫 (Mary Ellen)，和他們同居，他們給她受教育，待她同他們自己的女兒一樣。

拋棄

商業

在一八六八年的年底，恩格斯和爾門的關於紗廠的合夥合同結束了。有一件事表示恩格斯是一個怎樣的商人，他的合夥股東爾門情願用一宗大款買他的股子，不過要他答應不另外自己再開一個廠來做同行的生意。（其實恩格斯無論如何是不會再做生意的，這我們在上面已經知道的了。）

但是恩格斯最注意的一件事，是他應該得到足夠的收入，來適當地資助卡爾。因為爾門所願意出的買價，可以足夠使恩格斯每年給卡爾三百五十鎊，（臨時的意外費用如醫藥費等等在外，）約可資助五年或六年，所以恩格斯請卡爾讓他知道他（卡爾）

所欠的債務確數若干，並問卡爾倘若他（恩格斯）替他完全把這債務還清，以後每年三百五十鎊夠不夠用（臨時費在外），這樣是不是可以不必再借債？他所以要這樣問清楚，因為他要根據這件事去和爾門進行交涉。五年或六年之後怎麼樣，他不知道。他想到那時候他還能每年至少給卡爾一百五十鎊，他並希望那時也許還有更好的機會，使他能夠更出得多些，同時也希望那時卡爾的著作也許還可以替他得些收入。他問卡爾倘若三百五十鎊還不夠用，要立刻讓他知道每年需要多少。無疑地，卡爾的回信說恩格斯待他這樣好，已使他喜出望外了。

最後在一八六九年的七月，恩格斯寫信給卡爾說：

『赫爾拉（Herrnhut）歡呼聲）今天我和甜蜜的商业絕緣了，我是一個自由的人了！……各特佛來（爾門的名字）樣樣都答應了。塔西（Tina）卡爾的最幼的女兒，當時在恩格斯夫婦家裏玩幾個星期）和我今天早晨作鄉間長途步行，慶祝我的第一次的自由日。還有一件事，我的眼睛（他的眼睛當時病了一些時候）也好得多了，再略加保養，不久就要全愈了。』

### 卡爾給他的回信說：

「竭誠恭賀你從埃及的束縛裏的解放爲慶祝這件事，我多喝了一杯酒……」

遷到

倫敦

最後在一八七〇年的九月底，恩格斯勸服了他的妻，（她的親戚都在孟徹斯特，）遷到倫敦。在這裏，他和卡爾間的分工更加明確了。無論那一個做的一篇東西都經過彼此討論之後才發表。但是他們也各有專責：卡爾的主要的工作是有系統地完成他們的基本的、經濟的和哲學的理論；恩格斯便從這些理論的觀點，對於當前的重要問題，加以爭辯、討論、解決。

在一八八三年，卡爾死了，全部的工作都負在恩格斯的肩上。

當卡爾死的時候，恩格斯已經六十三歲了；但他不但是依然勇銳地衛護他和卡爾的理論，不但繼續運用唯物史觀於當前的一切重要的問題，——寫了無數的小冊子和文章，——並且繼續他自己的哲學和歷史的研究，担任各國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的一般的顧問；最後還有一件事，在他認爲是最最重要的，認爲是他的第一個責任，那便是他。

要完成卡爾所開始的工作。

他所完成的最後的工作，是替卡爾的一八四八及一八五〇年間的法國階級鬥爭一書寫了一篇導言。這篇導言的寫成，距他的死才五個月。在一八九五年的三月，他患喉喘扁桃腺病，同年八月六日因此病死去，他遺囑要把遺屍焚化，把屍灰投入海裏去。這最後的悲哀的職務，是由他的幾個最好的朋友執行，卡爾的最幼的女兒愛麗娜（Elsator）即上面所說的塔西（名叫 Eastoume）把他的屍灰投在海裏去。恩格斯懂十國文字；前最喜到的海邊（名叫 Eastoume）把他的屍灰投在海裏去。恩格斯懂十國文字；在他七十歲的時候，他還學習挪威、威國的文字，要能讀易卜生的著作原文。

恩格斯為人非常地謙虛。例如有人替他祝賀七十歲的生日，他對這件事寫過這幾句話：『我希望這都成了過去。我一點沒有興緻做生日。……終究說起來，我只是許多人裏面的一個，拾取卡爾的盛名的收獲。』他和卡爾的關係，終身都是充滿着熱愛和真誠。這不但是他們來往的信札可以證明，從卡爾的夫人和她的女兒愛麗娜提起他的時候

那樣親愛的態度，也很可以看出，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普卡爾的第二女兒羅拉（Laura）答應和拉伐格（La-fargue）正式訂婚以前，據卡爾說，她一定要先徵得恩格斯的同意。

（The Life and Work of Friedrich Engels, by Zaida Kahan-Costas）

## 恩格斯的自白

(此書上卷頁三三三—三三六)

205

近來有人提起我（按這是恩格斯自稱，下同）對於這個理論（按指卡爾的理論）也有我的分，所以我不得不說幾句聲明的話。我不能否認，在我和卡爾四十年的合作以前，以及在這四十年合作的期間，不但在建立這理論的基礎方面，尤其是在構成這理論的工作方面，我有我的某種獨立的貢獻。但是關於主要思考的最大部分，尤其是關於經濟學的領域，也尤其是這理論的最後的銳利的敘述，那是要單獨歸功於卡爾的。除了兩三椿關於特殊的實用之外，我所貢獻的，卡爾就是沒有我，他自己也能夠很容易地辦到。凡是卡爾所供給的，我却不能夠容易地拿出來。卡爾站得比我們都高，看得比我們都遠，觀察得比我們都更廣、更清楚、更快。卡爾是一個天才，我們其他的人，最多只是有着特長罷了。倘若沒有了他，這理論是不能有今天的成績，那是要差得很遠的。所以這理論是應

該冠着他的名字。

(Feuerbach, by Frederick Engels)

# 伊里奇的時代

力  
的  
量  
基  
礎

伊里奇 (Lenin 原名 Vladimir Ilyich Ulyanov) 生於一八七〇年，死於一九二四年。他的一生包括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和二十世紀最初的二十五年。他的積極行動的時期，包括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和二十世紀最初的二十五年。



奇 里 伊

這時期是一個劇變的時期，是人類歷史的一個轉機；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這個轉機的特著的符號，它的完全的意義才開始被人了解。伊里奇的一生便是積極地站在這個轉變的中心。

伊里奇的力量，使他顯然和這個時期裏的其他的政治思想家和領袖不同。他所以

有這樣的力量，是因為他在很早的時候，在十九世紀結束以前，就根據卡爾理論的強固的基礎，完全看清將來時期的全部特性，加以充分的準備，引伸實際的具體的結論；時機到來的時候，他便成爲適合於歷史要求的唯一人物。

所以要了解伊里奇的工作，必須了解他所根據的卡爾理論的基礎和他所處的時代的特性。

資本主義  
與新勢力

卡爾理論，在十九世紀第二段的二十五年間，就發展起來。在那個時候，現在社會的基本矛盾已經呈現出來了。

在前一時期的長期連續的資產階級革命，已在主要的國家裏，尤其是在英國、法國和美國，建立了資本主義的政權。資本主義的關係已在世界上佔優勢了。機器的工業，已開始它的鉅大的擴充。自由資產階級的概念，在『人權』和『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裏面，受到理想的、反叛的表現；後來在國家的結構、立憲的政府和國際的貿易裏面，更達到它的鞏固的地位。這種自由資本主義的概念，由布爾喬亞的新統治者看來，竟認爲是

人類發展的頂點了。

但是資本主義的統治之消極的方面，也漸漸地在出現了。在勞動人民大眾看來，『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口號所表現的只是空虛的藉口，實際上不過是一個階級替代另一個階級來統治罷了；大眾仍然處於苦工、窮困和奴役的境域。生產和分配的無政府狀態；定期重演的經濟恐慌；貧富的絕端和日益加深的懸殊；全世界的瘋狂的商業掠奪和利潤榨取；這一切都表示資本主義的內在的矛盾。

資本主義的財富所靠以造成的勞動階級，這正在抬頭的將來新的社會勢力，現在已開始出現於社會和政治的舞台，成爲集中大眾反叛的積極的獨立要素；最初雖不免昏亂，但是現在已表示一天天增加政治的目的和意識了，尤其顯著的是在英國的革命的工會初期運動和『憲章』運動（註）布爾喬亞在這個時候，已更顯然地由以前的革命的任務，轉到反革命方面去，自居於現有秩序的保護者，反對新興的勢力。

和勞動階級反叛的開始並行着，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也開始出現了。空想社會主

義者（如聖西門、傅立葉、奧文等）都起來批評資本主義的罪惡，主張合作的社會秩序；但是他們對於社會的發展缺乏清楚的認識，只對於統治的布爾喬亞說話（布爾喬亞其實用不着他們，畏懼社會集團鬥爭）。

思想和哲學

同時，思想和哲學的發展表示一個新的更高階段的條件是成熟了。布爾喬亞的思想已達到了它的發展的終點，開始渡之了。黑格爾的古典哲學，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初二十五年間，在黑格爾的哲學裏已登峯造極了。黑格爾打倒了主觀的觀念論，第一次建立一種活的世界觀，使人們對於世界、人生和社會能有批判的客觀的理解，視爲一種有系統的、彼此互有聯繫的發展過程，依辯證法向前開展，經過矛盾而達到新的形式，這過程的法則是可被了解的，可被熟悉的。但是他仍然聽任這種種的基

譯者註：憲章運動指 Chartism。這可說是英國歷史上的一種革命的民主運動，起於一八三八年間，終於一八五〇年，主要的要求爲普遍的選舉權，取消選舉權的財產限制，要求秘密選舉等。

本的要素停滯在神秘的理想的範圍。於是他的哲學仍然免不了觀念論的弊病；不是完全批判的和科學的，結果不免陷入神秘和反動，徒然成爲普魯士專制君主制度的護符。但是無論如何，他的哲學總是布爾喬亞的最後的最偉大的哲學體系。

同樣地，布爾喬亞的經濟學也於十九世紀最初的二十五年間，在李嘉圖的經濟學裏達到了頂點。古典的經濟學家，雖也已經想要對於新社會的經濟基礎，作一番科學的分析；但是他們却受束縛於不自覺的成見，認爲布爾喬亞的社會是自然的，永遠不滅的秩序，因此對於地租、利潤、和利息，終於找不到科學的解釋。於是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拋棄使經濟學成爲科學的企圖，只自限於市場計算的經驗的水準；結果，完全不能了解或預料主要的經濟過程，這事在今日竟成了一個笑柄。

要對於人生和歷史、社會的和政治的制度，就它們的全般的關係，不是僅就枝枝節節的隔離的狀態，能有科學的了解；這樣的企圖，在卡爾以前，簡直還沒有人想到。

在卡爾以前，人類是在盲目地發展着；經過各種相反勢力之盲目的相互作用，常常

發生可怕的結果，從沒有整個了解的企圖。

這種盲目的發展，在舊的勢力仍在猖獗的範圍內，仍在繼續着。（例如世界大戰和現今全世界的經濟恐慌。）但是整個的科學的了解之新的組織力，（由國際勞動階級所代表的卡爾理論或國際的社會主義）在每一個歷史階段的效用都在增加着，最後終於能夠控制這個過程的。

危急  
階段的

在這樣的十九世紀的危急的階段，新的勢力、種種問題和衝突，在各方面都洶湧起來了；同時統治的布爾喬亞的思想力量，却已減弱萎縮，不能應付裕如了。就在這樣的危急階段，卡爾根據於他的對於以前的一切思想和知識的深刻的研究，對於當前的世界現實的深刻的研究，獨能衝過重圍，指示前進的途徑，於是在十九世紀卓然獨立，成爲近代世界的改造者和建設者。

卡爾第一次造成一個完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

卡爾的這個世界觀是建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上面的，但他却使辯證法不再含有摻

定的唯心的因素。他和費爾巴哈（黑格爾的主張唯物論的弟子）一同看出：理想的世界並不是從無物之中出來的神秘的創造，却是物質世界的反映。但是卡爾的理論和費爾巴哈的被動的唯物論，或法國和英國的機械的唯物論，却不相同；其不同之點是：卡爾闡明了思想過程和人類活動之實際的任務，不是僅僅物質世界之被動的反映，却是能對物質世界起反作用，能改變物質世界。所以辯證唯物論的特異的性質，是它的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哲學家曾經用種種方法解釋世界；他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去改變世界。」（卡爾費爾巴哈論綱中語。）這個概念，在卡爾和伊里奇的一生中，達到了它的完全的實現。

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法則之發現，是卡爾實用辯證唯物論的方法於社會發展的現階段之特殊的工作。

卡爾在一八八三年死去的時候，尤其是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死去的時候，卡爾理論已是國際勞工階級運動的公認的基礎。

但是資本主義和普羅革命的決勝的戰爭，直到卡爾和恩格斯死後才到來。雖然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鬥爭，尤其是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當時工人握得政權六個星期），已指明前進的途徑，但是在資本主義達到崩潰時代以前，在世界革命的時期能夠開幕以前，資本主義仍有一個在全世界擴大的時期。

資本主義之世界的擴大，引進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裏，世界的大部分，都直接受制於少數的資本主義的強國，歐洲和美國。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間，世界的瓜分，主要地已達到了完全的境域。西方各強國的獨佔資本主義，使世界供它們的掠奪，鉅量的利潤向着統治的金融階級奔流；它們抽出一部分的贖物，來作有限的改良政策的讓步，並腐化勞工的領袖，想用這種手段消滅正在興起的勞工運動。資本主義踏進了崩潰和寄生的階段，由此引到了世界大戰和現今的一般的經濟恐慌，——這是帝國主義的階段，或用伊里奇所下的定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的階段。

帝國主

義時代

帝國主義時代是伊里奇的時代。

卡爾和恩格斯在世的時候，還來不及親眼看到帝國主義時代的完全顯露，雖然他們的著作已預示了這時代的端倪。

國際社會主義的領導，由卡爾和恩格斯遞傳到伊里奇。

在帝國主義的初期，——在卡爾和恩格斯逝世以後，——國際勞工階級運動，在革命的目的方面陷於混亂和薄弱。自從一八八九年附屬於第二國際的各國社會黨和工會的民衆組織，在數量上和力量上誠然都大大地增加。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國際社會主義者達一千二百萬人。卡爾理論的綱領在名義上仍然存在着。但是在實際上却一天天跑到機會主義方面去；這意思就是說，爲着有限的目的的小利，和當前資本主義的統治妥協。

這帝國主義時期的真正的特質，在最初就是許多社會主義者也不能了解。在國際社會主義的羣衆裏面，機會主義的全部理論漸漸地發展起來。這個理論認爲帝國主義

的時期足以駭倒卡爾的學說；認為帝國主義時期是資本主義進展到新的生命和更高的組織，能夠克服它的衝突；認為帝國主義時期是矛盾的逐漸調和的時期，是社會改良和一切人的情況逐漸改善的時期，是和平地進展到社會主義的時期。這些理論，在原則上雖被國際社會主義者所駭斥，所責難；但是在實際上却一天天佔優勢。

世界大戰給與這些幻想一個致命的打擊，顯出帝國主義的特質，顯出帝國主義是暴烈的恐慌和爆發的時期，是大眾的窮困愈益擴大的時期，是進展到普羅革命的時期。伊里奇一生的大部分，他的積極的政治生活的三分之二，都費在世界大戰前的帝國主義時代；當時在國際社會主義的羣衆裏面，機會主義的猖獗和否認革命的說法，一天天厲害起來。伊里奇爲着革命的卡爾理論，對機會主義作奮勇的鬥爭；他在這戰場上生長起來，強有力地生長起來，磨鍊他所領導的黨，應付即將到來的衝突。

世界大戰帶來了危機，促成舊的國際社會主義的崩潰。這空前的危機，和一切矛盾的強烈的爆發，（這些都經卡爾在很久以前就指出了的，）使國際社會主義受到空前

的試驗。舊的國際社會主義爲機會主義所腐化，一經這試驗，便陷入崩潰的境域了。舊的國際社會主義既瓦解，它的主要的各黨公然地替種種參戰的帝國主義效力！

這個時候是人類歷史最黑暗的時候。人類的命運，要從帝國主義所引入的破壞的泥坑中逃避出來；這和國際社會主義的前途，有着密切的聯繫。

但是國際社會主義終於未失敗。推進革命運動的力量，應付這危機要求的力量，推動勝利的世界革命的力量；這種種力量都仍然存在着。這種種力量的中心就是伊里奇。卡爾死於一八八三年。恩格斯死於一八九五年。

在一八九三年的時候，伊里奇已開始他的領導的政治活動，繼續不斷地邁進，直至他在一九二三年的臥病不起爲止。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V. I. Lenin, by R. Palm Dutt, 1934)



# 伊里奇的生平

## 一 基本的概念和工作的基礎

三十年的  
工作準備

一九一七年俄國布爾塞維克 (Bolshevik 意譯為多數派) 革命的勝利，在事實上並不是好。像由無物之中突然射出光輝的奇蹟的爆發，却是在俄國的以前革命運動長期過程的頂點；在這過程裏面，伊里奇三十年的始終不倦的準備工作，實有決勝的效用。

在俄國革命之後，伊里奇自己曾經在著作裏告訴我們，布爾塞維克怎樣是以前的全部革命發展的結果：

大約在半個世紀裏面，即約在前世紀的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九〇年間，俄國的前進知識分

子在最野蠻的、最反動的沙皇虐政壓迫之下，迫切地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對於歐洲和美國的關係，關於這方面的材料，都無微不至地加以注意，用力之勤奮和研究的周密，都令人驚異，目的就在於尋得正確的革命理論。

卡爾主義，是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俄國階上卡爾理論的道路，是由於經過了五十年的艱苦和犧牲，是由於最偉大的革命的英勇精神，最使人難信的精力量，是由於公爾忘私的經營、訓練、教育、實際的試驗、失望、檢討和歐洲經驗的比較。由於沙皇所強迫的國外亡命，在十九世紀的下半段，革命的俄國便獲得了充分的國際聯繫，對於革命運動的形式和理論，都有着良好的領悟，爲其他國家所不及。（見 Lenin,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俄國革命運動的這個無匹的特質，它的實際的革命工作的長期訓練，革命的犧牲和英勇精神的長期訓練，它的深邃的理論的特質，和它的無比的國際背景，我們對於這種種都須先能領悟，然後才能了解這基礎是怎樣準備起來，使俄國能在其他各國以前，發展强有力的、不被歪曲的、勝利的革命的卡爾理論。

個人  
法與大  
衆方法

在一八八七年，伊里奇十七歲，剛入喀山大學做學生，因為參加革命的示威運動，被該校開除。在這同年的初期，他的哥哥亞歷山大因為圖謀刺殺沙皇，被絞死。這些都是伊里奇在革命運動中所受到的較早的直接經驗。

伊里奇的父親是一個學校的視察員。他的父親有兩個兒子和四個女兒，都好學深思，而且都是革命者。伊里奇的長兄亞歷山大，是在採用卡爾理論以前的舊的革命組織（名人民意志黨）的最後的主要代表；這組織是要用個人的恐怖政策來推翻沙皇制度的。伊里奇對於他的哥哥和這個組織的革命老鬥士們，都有着很深的敬仰，他們都遺下了慷慨赴義的風尚。但是他覺得他們的方法已不適用於推翻沙皇制度。他於是殷切地尋求這等取解放問題的答案。他在卡爾理論裏尋到了答案。他從卡爾學得用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發展的法則；知道推翻當前的統治權力不能單靠個人的行動，須靠大衆的行動；並知道將來的勝利的革命領導者，必然地是工業的勞工階級。伊里奇對卡爾的著作，研究得極為周密。同時他繼續求學，一八九一年在彼得斯堡得到法律學位。當他在

喀山和薩滿拉，他都參加卡爾理論信仰者小組，這些小組是在未有黨的存在以前，社會民主團體的最初形式。他在一八九三年，第一次寫作關於農民的問題。一八九三年的秋季，他到彼得斯堡。從那時起，他的領導的政治活動就開始了。

第一  
任務

他的第一個任務，是要指明社會民主運動的路線，並根據這路線，開始把工人組織起來，其目的在組成一個社會民主黨。這個任務，他在一八九四及一八九八年間成功了。

在這個時候，在革命的、和半革命的、社會主義方式的思想及行動方面，見解和傾向都有着很大的混亂。在一方面，有着人民意志黨，就是在採用卡爾理論以前的、革命運動的殘餘的代表，（他們的見解後來傳遞給社會革命黨，）這一派的人把農民理想化，他們否認在當時的俄國有發展資本主義和機器工業的必要，認為鄉村的公社就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和這一派對立的有卡爾的信徒。但是在卡爾信徒裏面，有許多不革命的、合法式的。（所謂合法的卡爾理論，）他們採用卡爾理論的經濟分析，藉以駁斥感傷的、唯

心論的、反資本主義的概念，但是在實際上却畏懼革命，畏懼工人的組織，仍使工人受制於資本主義；這樣一來，在事實上竟成爲資本主義的宣傳者，這一派的領袖後來轉變爲自由主義者，就是這種傾向的佐證。此外，便是革命的卡爾信徒。伊里奇到了彼得斯堡之後，很快地就成爲他們的實際的領導者，此時普烈哈諾夫是在國外亡命中的領導者。

一開始，伊里奇就絕對明白地規定好社會民主運動的路線和其他種種相反的傾向分清楚。這在一八九四年他就已成功了。

他在一八九四年發表（非法地）他的第一次的重要著作，誰是人民的朋友？他們怎樣反對社會民主主義者？由於發表了這著作，伊里奇清算了人民意志黨，明白定下了俄國的社會民主運動的路線。他根據事實，說明經濟發展的途徑；說明勞工階級是將來的革命領導者（這革命的目的，是專制的推翻和社會主義的成功）並說明組織社會民主黨所需要的其次的步驟。

同時在別一個前線，伊里奇於一八九四年發表民粹派理論的經濟的內容和斯脫

魯威的書對於它的批判，對於合法的卡爾信徒們開火進攻，說明合法的卡爾信徒是要陷入布爾喬亞的營幕裏去。

這樣在兩個前線的鬥爭；使革命的社會民主的路線，和相反的種種傾向有着顯明的劃分；同時對於實際的工作加以具體的解釋：這是伊里奇在領導的任務上從開始就有的特質。

同時，伊里奇和各組的革命的卡爾信徒，把彼得斯堡各工廠的工人分組組織起來。他們根據工人的切身的條件，和社會集團鬥爭的初步的形式，把鼓勵和組織合併起來進行訓練他們，使他們能有政治上的了解，能明白卡爾理論的原則，能感覺到他們是將來的革命領導者，使他們認識自己有着這樣的政治上的任務。這樣把政治和大衆聯合起來，把革命的政治鬥爭和日常的社會集團鬥爭聯合起來；這是布爾塞維克主義和它的偉大力量之澈始澈終的秘訣之一。

在一八九五年，伊里奇和他的一羣，進一步組織勞工階級鬥爭和解放聯合會，這就

是社會民主黨的前驅。這聯合會已能領導在彼得斯堡正在興起的罷工運動。在同年（即一八九五年）伊里奇往瑞士訪問普烈哈諾夫之後，（他已認識伊里奇是將來俄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就準備發行一種非法的工人日報，名叫工人的前途，（原名叫做“Workers' Cause”，想不出好的譯名，勉強譯意爲這個名稱，）目的在藉此團結工人，並指導正在興起的運動。但是在剛要出版的時候，伊里奇被捕了；他被監禁一年之後，被充軍到西比利亞。三年，到一九〇〇年才滿期。但是他在這種情形之下，仍繼續他的工作；他從彼得斯堡的監獄裏幫助罷工運動的領導，在彼得斯堡和在充軍的時期內，仍繼續他的寫作。在他所寫的著作裏有一本是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當時和現在，都是一種經典的著作。他被充軍到西比利亞的時候，克魯普斯卡雅（Krupskaya 按即伊里奇夫人的名字）到西比利亞來陪伴他。她是在彼得斯堡的革命的卡爾理論研究組的一個主要會員；他們倆繼續他們的共同生活和工作，從來沒有間斷，直到伊里奇的死。

一八九八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在明斯克（Minsk）白俄羅斯的首都，開第

一次大會；但是這時伊里奇還在充軍中，不能參加。其實這大會的宣言，就是合法的卡爾信徒的領導者斯脫魯威（Struve）所起草的。

混亂  
和  
軟弱

在這初期的社會民主運動裏面跟着來的是一段在指導上混亂和軟弱  
的時期。自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八年間，在伊里奇左右的革命的卡爾信仰者  
的老領袖們，有的關在監獄裏，有的被充軍，沒有一個倖免的。這時跑到前面的人們，都受  
到機會主義觀念的影響，尤其是從西方社會民主主義所傳播來的。就在這個時候，伯恩  
斯坦（Bernstein）發表他的書，開始宣傳修正派的社會主義，反對革命的卡爾理論，  
利用『批判自由』的名稱，（在實際上是轉變為布爾喬亞的觀念，）對革命的卡爾理  
論開始作國際規模的攻擊。同時在俄國，機會主義在理論和實踐方面有了顯明的特質，  
被稱為『經濟主義』，反映某種西方的模型。主張這個傾向的人爭辯着說：『政治』是  
超出工人的腦子所能應付的範圍；社會民主主義者應該根據工人們對付僱主的日常  
經濟鬥爭的直接的實際利益，集中力量在這上面來領導和組織工人，好像英國的工聯

主義一樣；由這樣的經濟鬥爭，後來會發展到政治的意識和政治的鬥爭。這個概念，在事實上就等於把政治的活動範圍放棄給布爾喬亞；在事實上也就等於做了布爾喬亞的奴隸，英國的工聯主義便是一個例子。

不容  
情的  
猛攻

這種傾向要危及俄國勞工階級運動的全部的將來，只能產生奴役的勞工主義，毀壞革命的社會民主運動。伊里奇對於這種機會主義的傾向，立刻開始。不容情的猛攻。他由西比利亞回來之後，就開始連續地寫了許多文章，最後集成了一本書，名叫幹什麼？於一九〇二年出版。在這本書裏，布爾塞維克主義對於勞工階級運動的顯著的貢獻，第一次表現出來；它的內容，即在今日的國際勞工階級運動裏面，也仍然佔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幹什麼？這本書的重要內容，是闡明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所負的政治上的領導任務，同時揭發虛偽的「卡爾理論」。這虛偽的「卡爾理論」認為：社會集團鬥爭可由「自發的」發展，達到社會主義的意識和革命。其實工人反抗資本家的「自發的」鬥爭，

迄今還未能達到社會的意識，所達到的只是工會的意識，仍然隸屬於資本主義的觀念。卡爾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意識，必須對於社會的法則和社會的改變所必要的條件，具有完備的科學的知識；這在和知識隔離的工人，却不是可以自然發生的；這是必須經過教育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就是工人對於他們的歷史的任務，具有革命的意識；明白他們在歷史上的任務，不是僅僅社會裏的一個特殊的部分，爲着他們的有限的眼前的利益而努力，却是社會的改變之領導者，一切被壓迫者的鬥爭之領導者，舊社會的破壞者和新社會的建設者；這個意識，必須由於社會民主運動之積極的領導，在工人們裏面喚醒起來。這就是社會民主運動的任務。所以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可滿足於自限在爭取特殊的、有限的、狹隘的，似乎是「勞工階級」的利益；他們的鼓動和領導，必須超出於每個政治的問題，必須隨處喚起對於現秩序的鬥爭。要成就這些工作，以前那樣的鬆懈的、消遣似的組織和工作方法，是沒有用的；用這樣的組織和工作方法，和現代的國家機構發生衝突，便好像原始的手工藝和大規模的機器工業格鬥一樣。社會民主運動必須根據民主

集權制，組織成爲有訓練的集中的黨，領導着以革命爲專業的革命者，共爲革命而努力。這些革命者都是經過訓練的；在每一點，在鬥爭的全階段，都能夠對於現秩序從事積極的鬥爭。

這些概念，藉着真正革命思想的一切偉力，表現出來；把卡爾理論切實地運用於當前鬥爭的一切問題上面去。這些概念，通過俄國的社會民主運動，好像炸彈似地爆發出來。根據這些概念，伊里奇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被建立起來；根據這些概念，在俄國的革命的勞工階級運動被訓練起來。這結果，在今日是顯然可見的了。俄國的勞工階級能夠負起它的革命的使命，在今日統治着它的國家，建設一個新的社會。西歐和美洲的勞工階級，它們的運動雖有較久的發展，到現在還仍然受着束縛。

## 二 多數派和少數派

正確路  
的領導

伊里奇的政治的生活所表現的，是爲着革命的卡爾理論的路線，反抗機會主義的一個長期的鬥爭。（在必要的時候，還要反抗機會主義的學生兄弟空虛的發空論的「左翼主義」）從他在一八九四年領導活動的開始，至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勝利，他在社會民主運動裏面，不停地領導這個不可少的內部的鬥爭；俄國勞工階級的將來，就靠着這個鬥爭的命運。他大無畏地、不容情地領導這個鬥爭；當他深信爲着建立一個革命的大眾的黨，決裂是無可避免的時候，他從來毫不躊躇地實行分裂。在這個時候，他的鬥爭，除了擁護他的人們之外，很少能了解它的。在國際社會主義的領袖們裏面，有多數人都責備他犯了無可救藥的宗派主義，主義的拘泥，咬文嚼字的吵鬧，分裂主義等等，屢次自告奮勇來居間「調解」或「聯合」互相抗爭的各派。——可是他們的這種建議，都被客氣地，但是堅決地，拒絕了。伊里奇所選的這條路誠然是困難的；但是他知道他正在做的事情，他知道他的路線和畛域主義及主義的拘泥絕對不同，却是對於革命的大眾的黨的需要，有着真正了解的反映。事實已經證明他的見解的正確。伊里

奇對布爾塞維克黨的綱領、策略、和組織，慘淡經營，無微不至；他所辛勤手創的這個黨，今日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眾的黨。

當時因見解不同而分成的派別，爲世界所聞名的，就是布爾塞維克（多數派）和孟塞維克（少數派）。布爾塞維克主義和孟塞維克主義的區分，推溯起來，已開始於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第二次大會，雖則在進攻「經濟主義」和「合法的卡爾理論」的時候，這個爭點已露出了它的端倪。

這兩派的區分是怎麼來的呢？伊里奇在幹什麼一書裏所闡明的主要的主張裏面，有一件事是要發行一個集中的日報，作爲「集體的鼓動者和組織者」目的在團結分散着的各羣，並幫助建立一個集中的黨。關於這個工作，他由充軍釋放回來後，就開始積極進行。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北斯哥弗（Petrov）開會決定，派當時在俄國的三個著名領袖，即伊里奇、馬托夫（Martov）和樸脫勒索夫（Potressov）出國，會同在外亡命的一羣老領袖（普烈哈諾夫、愛克塞洛 Axelrod 和薩蘇里屈 Vera Zasulich）

創辦一個集中的機關報。一九〇〇年在國外出版的火花 (Iskra) 便是這個目的實現。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火花建立了集中的黨和它的政治路線。由於該報的工作和聯繫的基礎，使伊里奇等能夠於一九〇三年召集一個代表大會，參加的有四十四個代表，來自二十六個機關，代表中有四個是工人。這個大會首先在布魯塞爾（比國）開會，後來因被警察驅逐，改在倫敦續開。

在這個大會裏，火花擁護者的人數，壓倒地超過「經濟主義者」的反動勢力和猶太同盟的反動勢力。（猶太同盟的人們不願意加入一個單獨的集中的黨。）但是在火花擁護者裏面，仍有分歧。這分歧便釀成布爾塞維克主義和孟塞維克主義。布爾塞維克由伊里奇領導，（最初和普烈哈諾夫一同領導，）在選舉中央委員會和火花編輯部的时候，得到多數的擁護，所以他們被稱爲「多數派」。（即布爾塞維克，）孟塞維克由馬托夫領導，只是少數。在事實上這兩派的人數差不多。在重要的問題裏面，有一個是關於黨章的問題，孟塞維克就得到了勝利。差不多一在大會閉幕之後，普烈哈諾夫就參加到

孟塞維克方面去。伊里奇在領導的任務方面完全孤立，不得不辭去火花的職務，另行創辦一個新報，名叫前進 (Vpered)，並在俄國組織多數局，藉以維持布爾塞維克的組織。由於這些工作的努力，在一九〇五年的開始，第三次大會組織成功，在倫敦舉行。這第三次大會是完全布爾塞維克的會議，由於它的決議，第一次很明白地規定布爾塞維克策略的路線。

分裂的問題  
的是：

什麼問題使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分裂呢？有若干問題，其中尤其重要

(一) 革命的概念 因為將來革命的最先的任務，是要推翻沙皇制度和封建制度，也就是說，要實踐在西歐已經完成的布爾喬亞的民主革命，所以孟塞維克派主張接替沙皇制度的統治和政府，必然地是布爾喬亞的統治和政府，勞工階級的任務，是要在擁護這統治的範圍內，爭取統治者的讓步。布爾塞維克派却加以辯駁，認為革命的成功不能靠布爾喬亞的領導，必須靠和農民結成同盟的勞工階級的領導，認為勞工階級

必須奮鬥建立革命的、民主的、工農獨裁制，拿這樣的國家形式來接替沙皇制度。

(二) 對於自由布爾喬亞的關係 孟塞維克派主張：只須自由布爾喬亞答應支持工人的要求，在這個條件之下，可和他們結成同盟。布爾塞維克派雖要根據形勢的需要，準備利用一切的策略，但却堅執主張：對於自由布爾喬亞的目的和反動的作用之真正的特質，有盡量暴露之必要。

(三) 黨的概念 孟塞維克派對於黨的組織，主張採用較有伸縮性的形式，只須個人擁護它的綱領，(隔離孤立的知識分子等等)，雖不是直接做地下工作的各團體的會員，(譯者按，當時俄國的革命運動是秘密性的)，只須能在各團體控制之下，工作的，都可容許他們加入做黨員；換句話說，這在實際上就等於容許那些同情者，不敢參加直接的革命工作，深怕這種工作有危險的人們，都可以加入為黨員。布爾塞維克派堅決地認為，如容許這些分子加入，結果徒然使黨懦弱；主張黨員必須限於直接參加黨的工作者，必須是在黨的組織裏做負責的黨務工作者；必須建立於這樣的基礎之上的黨。

才是有實效的、革命的、有訓練的、能抗爭的力量，不致含有懦弱的、被動的、或動搖的成分。

這是幾個主要的問題，在較早幾年的時候，使布爾塞維克主義和孟塞維克主義分道揚鑣。這些問題的歧異，已含有胚種，使以後革命的社會主義和改良主義，爲工人革命的鬥爭和對資本主義的妥協，這兩方面有着主要路線上的分歧。這種歧異，在以後幾年間的事實上的表現，一天天地更顯出它的真正的特質。在世界大戰的時期裏，孟塞維克主義發展到『國防』的路線，即擁護帝國主義；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後，和布爾喬亞共同參加混合內閣，維持帝國主義，把布爾塞維克主義者投入牢獄；到了『十月革命』成功，布爾塞維克派得到政權之後，他們竟發動武裝的反革命，參加布爾喬亞和保皇黨的白色陣營，公開對工人的統治進攻。孟塞維克主義的全部的特質，一步一步的在事實上的暴露，在實際上並不專限於俄國的現象，却是一種國際的傾向；後來在事實上的種種表現，證明伊里奇一開始對於它的特質的判斷，就是完全正確的。

一九〇  
五年的  
革命的

一九〇五年第一次的俄國革命，使關於理論和策略的一切問題都受到事實上的試驗，顯示一九一七年的將來路線。在這次革命裏，證明工農的大眾鬥爭是動搖和制服沙皇統治的力量；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和他們的黨的組織，在這鬥爭中負有領導的任務；自由布爾喬亞在危急的關頭，反過來對沙皇統治妥協。工人的罷工運動發展到政治的總罷工，再發展而至武裝的起事；這種罷工在革命運動中的任務，也在這次革命裏得到明顯的證實。這個鬥爭的方式和方法的新經驗，在國際的社會民主運動方面，喚起了熱烈的爭辯和新的英勇的覺醒。國際社會民主主義的最前進的理論家，如考茨基，（他當時仍為革命的卡爾理論的原則而奮鬥，）在那個時候都承認國際社會民主運動的領導任務轉到了俄國普羅的肩上。第一次的蘇維埃，即工人代表會議，工人政權的將來的機關，就是在彼得斯堡、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一九〇五年革命鬥爭中生長起來的。

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策略的相反，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裏又得到一種證明。孟

塞維克仍承認布爾喬亞是當時革命的領導者，工人鬥爭的任務只是要督促推動他們罷了。布爾塞維克却努力推動普羅之獨立的領導任務，促進罷工運動之政治的作用，訂立新的農民政策，組織分地的農民委員會，使農民由土地的鬥爭參加到一般的政治鬥爭裏面來，使大眾鬥爭進展到十二月在莫斯科武裝起事的最高點。這次的武裝起事，就是在布爾塞維克領導之下，由莫斯科蘇維埃主持的，和沙皇的軍隊抵抗十日。孟塞維克責備這次的武裝起事，（這次起事在血戰中被擊敗了，）認為時機未到，這次起事是錯誤的。伊里奇雖批評這次起事在策略上有錯誤，但却認為這次起事是『俄國革命在歷史上最大的功績，』是將來勝利的南鍼。他說，

……普烈哈諾夫認為這次罷工是不合時機的，是不該發動的，『不該拿起武器來。』他的這個意見，一切機會主義者都附和着。其實沒有意見比這個再短視的。恰恰相反地，這次罷工應該更堅決地，更英勇地，更猛進地拿起武器來；同時更應該對大眾說明：單是和平的罷工是沒有用的，而需要大無畏的，不顧惜的武裝鬥爭。我們如對大眾掩飾拚命的、流血的、根絕的戰爭之必

要；掩飾這是將來的革命行動的最先的任務——這便是欺騙自己 and 民衆！(Lenin, "The

Lessons of the Moscow Uprising" in "The Revolution of 1905" pp. 30—36)

沙皇統治暫時勝利了。『民主的』英國和法國的金融資本家急來拯救這反動的沙皇制度，用鉅量的借款來支持它，倘若沒有這樣的支持，它是無疑地要崩潰的。經他們這樣一來，殘酷的反動又來了。伊里奇於一九〇五年回到俄國領導鬥爭的進行，於一九〇七年不得不出國亡命了。

在反動的時期裏面，當然要運用不同的策略，不得不有忍耐的堅毅的工作，要利用每一個微小的可能性。有許多人因此心灰意冷，退了出來。布爾塞維克的犧牲最重，死的，入獄的，入獄。在反動的時期裏面，孟塞維克却抬起頭來；他們宣言這時沒有革命運動的餘地了，所需要的工作是要『取消』非法的革命的黨，集中力量建立合法的工會和一個合法的工人的黨，只須有一個關於要求目前利益的有限的綱領。在同時，伊里奇還要力矯布爾塞維克裏面有些人的『左』的宗派傾向。（這個傾向被稱為『召回主

義』“Otsarism”，即主張召回該黨出席國會的議員。這班人建議要抵制反動的第三屆杜馬（Duma）俄國在革命前的國會。這表示他們不了解在反動的時期裏，於非法的工作之外，還要利用每一個微小的合法的可能性。此外還有些人徬徨於哲學的理論，附和當時布爾喬亞思想的最新流行的傾向，想要『修正』卡爾和恩格斯的『陳舊』的觀念，其實只是陷入最舊的布爾喬亞的謬誤。伊里奇在哲學思想的領導任務方面，看到這些傾向的危險，對於這些哲學的問題，加以完全的矯正；這就是他所著的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一書的內容；現在這本書，在要了解辯證法唯物論的人們，仍然是一個不可少的指導。

再接

再屬

伊里奇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一年間的反動時期內的領導，以及他對付『取消主義者』和『召回派』（“Otsarists”）傾向的合併的鬥爭，其教育的力量，比之早年建立黨，或一九〇五年的正確的鬥爭，有過之無不及。在這幾年裏面，布爾塞維克主義不但不會被反動勢力所消滅，反而在勞工階級裏立下了很深的根據，成爲

大多數工業工人的領導者。孟塞維克主義的領袖丹恩 (D. E. E.) 後來在孟塞維克主義的正式的黨史裏，對於這個時期，不得不這樣寫着：

本黨的布爾塞維克的部份變成一個戰鬥的集團，用鐵的紀律和有集中力及領導效用的議決案，團結起來；同時孟塞維克的羣衆却因為意見分歧，態度冷淡，更無組織得厲害了。

在一九一一年，新的鬥爭波浪又興起，布爾塞維克成爲不可少的領導者的時候，這個再接再厲的鬥爭和大衆工作，顯現出它的結果了。布爾塞維克於一九一二年一月開過大會之後，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便完全分裂，分爲兩黨了。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布爾塞維克聯合着百分之八十的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孟塞維克只聯合着百分之二十。

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伊里奇在加里希亞 (Galicia) 在波蘭南方，即接近俄國的邊境，領導這正在洶湧起來的鬥爭。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前夜，革命的信號已接近了；在彼得斯堡，風靡一時的罷工運動已展開了。帝國主義的戰爭雖暫時抑制着這狂潮，但是在一九一七年復發的時候，反而使它有更大的力量。

### 三 世界大戰和革命的國際主義

重要  
關頭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是個重要關頭：表示資本主義已踏進了強烈的危機和崩潰的時期！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已發出它的信號了。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於一九一七年在帝國主義鏈條最弱的一環（俄國）在伊里奇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最前進的最強的社會主義的黨）領導之下，開始爆發了。這是伊里奇一生的重要關頭，也是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關頭。

社會主義國際（即第二國際）在議決案裏早已預見戰爭危機的迫近，認為這是革命的出發點，並一致通過共同遵守的議決案，規定一切社會主義的黨在這個狀況下應負的責任。這是一九〇九年在司徒加特（Stuttgart）在德國舉行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所通過的議案，一九一〇年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在丹麥）和一九一一

年在巴塞爾 (Basle 在瑞士) 的會議，並有同樣議案提出，它的內容有：

倘若戰爭有爆發的形勢，有關係各國的勞工階級和國會代表，要由國際社會主義局的調整支持，儘量運用各種方法阻止戰爭的爆發……

倘若戰爭仍然爆發，他們的責任是要迅速地使這戰爭終止，並盡量利用這戰爭所引起的經濟和政治的恐慌，喚起民衆，加速資本主義階級統治的推翻。

一九一二年在巴塞爾通過的議案，對於這個宣言還加上有力的補充，直接引證巴黎公社是普法戰爭的結果，第一次俄國革命是日俄戰爭的結果。

第二國際的這個舊的戰前的最重要的議決案，在事實上是由伊里奇和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起草的，由盧森堡用俄國布爾塞維克黨特派的代表名義提出。這議案被各國的社會黨所採納，英國的工黨也在內。

等到一九一四年戰爭的試驗來到的時候，這議決案有變成事實的必要了，可是在這個時候，第二國際竟至瓦解。主要各國的社會黨，有多數爲機會主義、合法主義及對資

本主義統治的妥協所腐化，它們的領袖們在實際上早已失去了革命性。這次戰爭把這種內幕更公開揭穿了。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和奧國的各黨，都公然地跑到帝國主義政府的方面去。只有俄國和塞爾比亞（Serbia）的黨，堅守着國際社會主義的路線，毫不動搖地執行他們的信約。國會裏的布爾塞維克議員，因投票否決戰爭債款，被驅逐到西比利亞去。

伊里奇是國際社會主義的第一和唯一的領導者，對於第二國際瓦解的全部結果，力謀補救，並引伸關於未來路線的實際的結論。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他在奧國，被奧政府投入牢獄。兩星期後開釋，他設法跑到瑞士去，在那裏繼續進行他的鼓動的工作，直至一九二七年俄國的革命。在一九一四年九月的初期，他寫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運動在歐戰中的任務，這裏面已經包含有他的全部的路線。這路線被在俄國國內及國外的布爾塞維克黨人所採納。

自一九一四年以後，伊里奇是國際社會主義的直接的領導者，其先只有若干擁護

者為核心，幾年之後，全世界上受他領導的以千百萬計。

伊里奇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中心主張是：『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內戰。』這個口號受到各方面的嘲笑和排斥；不但受到直接的反對者的嘲笑和排斥，甚至受到多數社會黨的領袖們的嘲笑和排斥。但是歷史不久便表示真實所在，這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革命的爆發就證明了。

#### 四 俄國革命的勝利

二月  
革命

俄國革命，從開始就是由下層起來的大眾的反叛。這革命的開始，是由於彼得格勒（Petrograd 即聖彼得堡，現為列寧格勒）的工人罷工，在街上示威運動，喊的口號是『打倒戰爭！』『打倒沙皇統治！』『給我們麵包！』到了三月初旬，罷工和示威的繼續不斷的，勃興的運動，達到了它的最高度；這時整千整萬的工人都到街上來了。哥薩克騎兵拒絕打擊工人。這時被派出鎗擊工人的兵士，愈益加多地跑到工

人這方面來，反而幫助他們來鎗擊沙皇的特別警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革命的勝利是固定的了。到了這個時候，沙皇除遜位外，沒有別條路走。

二月革命（註）是勞工大眾和兵士所單獨造成的勞績。在三月的時期內，一切權力在事實上都在工人和兵士的手裏，倘若他們知道怎樣運用，並明白他們的目的。三月的大眾革命，其目的在原則上是和後來在十月革命所實現的一樣：這些目的就是和平、麵包、土地和一個新的社會秩序。但是在二月革命的時候，除了在數量上仍居少數的布爾塞維克的先鋒之外，還沒有任何清楚的政治意識，還不知道怎樣可以達到這些目的途徑。於是在這些目的能被實現以前，自二月至十一月的八個月的時期裏面，還需要經過一個深入的政治啓蒙的過程。在這個大眾啓蒙的過程裏面，重要的任務是勞工階級

譯者註：推翻沙皇的革命發生於俄國舊曆二月，即新曆三月，故稱爲二月革命。推翻臨時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布爾塞維克革命，發生於舊曆十月，即新曆十一月，故稱爲十月革命。

的政治的先鋒所負起的領導責任。這先鋒就是布爾塞維克黨；它隨着大眾的前進而增長它的力量，由少數進展到多數的地位，推動大眾更向前進，組織並領導大眾爭取政權，建立新的政府。在布爾塞維克黨領導的任務裏面，其重要的任務是伊里奇所負的領導責任。

在二月革命勝利之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立刻建立起來。全國其他各處，也有同樣的蘇維埃紛紛興起。成爲大眾的自然的民主工具，比任何巴立門都更爲民主化。但是在最初，這些蘇維埃並沒有自覺的用意要接收政府的職責。

在蘇維埃（即工兵代表會議）裏面的大眾，在政治上還缺乏經驗，他們最初還信任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政客；布爾塞維克在開始時只是少數，只建立在有階級意識的工人的基礎上。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們，依次掛在布爾喬亞的尾巴上，乞求最著名的布爾喬亞政客出來組織政府。這樣，對革命毫無貢獻的布爾喬亞，居然也組織臨時『革命』政府，由勒佛夫親王（Prince Lvov）和米留科夫（Milyukov）

立憲民主黨領袖）主持，拉社會革命黨的絕端右派的克倫斯基（Kerensky）加入，標榜爲『大衆化』的代表！這樣一來，便成立了『雙重權力』的統治局面。在一方面，有着布爾喬亞閥員所組成的臨時政府，繼續沙皇的機構和帝國主義戰爭的目的，但是，工人和兵士對於它的服從一天天減低下去。在另一方面，有着蘇維埃，它有着真正的權力，它所投票通過的議決事件，使臨時政府和參謀部爲之震驚，可是這些議決的事件却被工人和兵士所服從。它在軍隊裏的權力，是由各軍隊裏所選出的兵士委員會建立起來的。同時，蘇維埃裏的右翼的領袖們，却繼續仰着臨時政府的鼻息，懇求他們進行『民主的』戰爭等等。

顯然地，這雙重權力是不能長久拖延下去的一個階級或別個階級必須統治。在這八個月裏，這兩方面在事實上發生了連續的衝突和攻擊；在這樣的過程中，一天天愈益明顯的是，只有兩條路走：要末由工人和農民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政府，如布爾塞維克所主張；要末完全反革命，如科尼羅夫將軍（General Kornilov）和克倫斯基的陰謀。

所企圖。小布爾喬亞的代表們，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們，都在這兩者之間動搖着，不可避免地一天天失掉他們的立足點。

伊里奇  
的  
遺歸

伊里奇於三月十六日由瑞士回到彼得格勒。當時協約國（即世界大戰時以英法俄為中心的協約國）只給便利與那些替它們服務的、馴服像綿羊似的「社會主義者」回俄國去，此外對於一切右翼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亡命徒們的回俄，也給與種種便利；但是它們却盡力阻礙在被逐中的革命的、社會主義者、通過它們的國境回俄國，尤其要阻礙的是布爾塞維克的領袖們。伊里奇和他的同在亡命的伙伴們，不得利用帝國主義的矛盾，經過許多周折麻煩的交涉後，才被准許乘着一輛封閉着的火車通過德國；伊里奇此行，帶有著名的國際社會主義的領袖們加有簽字、表示同意的文件。這個事件，在他回國之後，他的政敵就盡量利用為誣陷他的材料，（連克倫斯基的政府也包括在內），用來證明伊里奇和布爾塞維克黨員都是「德國的好細」！這個事實所以值得提到，只是因為它徒然表示布爾喬亞反對布爾塞維克的宣傳之無

聊。據盧登多夫（Ludendorff當時的德將）在他的回憶錄裏所記載，他說所以當時聽任布爾塞維克黨人的通過，實在是因為希望他們回俄後能使俄國的軍力分裂，但是後來他感覺到他的錯誤，已經太遲了；他認為這件事的最後的結果，只是破裂了日爾曼帝國革命的國際主義是為着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而奮鬥。這個意義，在布爾喬亞看來，仍然是好像一本關着的書，他們對於書的內容還是莫明其妙。

伊里奇在離開瑞士以前，對於這次俄國革命中各階級勢力的關係，對於必須前進的途徑，都已有着完全明瞭的見解。他在三月十六日，僅收到關於革命消息的簡單的電報，在他寫給同志們的信裏，就已指出當前的任務是要「由工人代表的蘇維埃爭取政權。」他在三月十七日所寫的論文裏有這樣的幾句話：

我們須有一個工人的政府，它第一、要聯合最大多數的農村居民，農村工人，和最窮的農民；第二、要和交戰各國的革命工人結成同盟；只有這樣的工人政府才能給與人民以和平、麵包和完全的自由。

四月八日，他在遠方來信裏說明當時所要做的工作如下：

- (一) 尋得最可靠的途徑，由此引進革命的第二階段，或第二次革命。
- (二) 這第二次革命，要把政權從地主和資本家的政府，轉到工人和最窮農民的政府。
- (三) 這後者的政府，必須在工農代表蘇維埃的模型上組織起來……

他還寫着說，只有這樣的政府才能鏗而不捨地爲着和平、地主的土地充公、和工業的控制而鬥爭。他認爲這種種步驟都是「達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主義在俄國是不能立刻地、直接地、無須過渡的策略，就可以實現的，但是由這樣過渡而達到的社會主義，是完全可以實現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

當伊里奇回到俄國的時候，正在第一次革命勝利的五星期以後；他在當時所對着的形勢，是在各蘇維埃裏面，小布爾喬亞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們佔着壓倒的優勢；他們依次又掛在布爾喬亞政府的尾巴上。

爲着對付這樣的形勢，伊里奇一到之後，就立刻開始鬥爭，並發表他的著名的論文：

普羅在現革命中的任務。這論文指出了達到十月革命的途徑（這裏所引證的信件和論文，都包括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一書裏，該書包括伊里奇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六月的著作和演說詞。）這些論文包括十個要點，現在簡要地敘述在下面：

（一）對於在資本主義政府之下的『革命的防守主義』，不得讓步；一個革命的戰爭，必須在工人和最貧農民得到政權，一切霸佔都取消，完全和資本的利益斷絕關係之後，才有同意的可能。

（二）要認識革命的現階段只是第二階段的過渡；第二階段是普羅和最貧農民對於政權的取得。

（三）不擁護臨時政府。

（四）布爾塞維克在各蘇維埃裏雖尙佔少數，但是要進行『忍耐的、有系統的、和堅毅的』宣傳，使多數人反對小布爾喬亞機會主義的領袖們的政策，擁護把政權轉移到蘇維埃的政策。

（五）我們所要建立的，不是一個巴立門的共和國，却是一個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共和國。

(六) 土地收爲國有，由農民蘇維埃管理；最貧農民和農業工人須另有組織。

(七) 銀行收爲國有，併成一個中央銀行，由工人蘇維埃管理。

(八) 『不是要把社會主義的「採用」作爲目前最先的任務；目前的任務，是要立刻使

工人代表蘇維埃統制貨物之社會的生產和分配。』

(九) 舉行黨的大會，修正綱領。

(十) 創立一個新的革命的國際。

這『四月論文』的震驚發曠，好像炸藥在昏亂的烟霧中爆發似的；因爲在二月革命之後，有許多人對於前途都是糊裏糊塗的；這種昏亂的烟霧，大有使俄國革命也要陷入後來在德國所遇到的同樣的命運危機，倘若機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所探的途徑被採用。伊里奇却把革命的真正問題顯露出來。可是他的綱領在當時却受到各式各樣的政敵的排斥，認爲是無政府主義者的狂呼；甚至普烈哈諾夫也對他加以嘲笑（普烈哈諾夫是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最早的開創者，這時也竟轉變爲『熱昏』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

但是這個網領既是大衆需要的真正反映，它很迅速地得到很廣大的擁護者。不到三個月，伊里奇的網領被在五月五日至十二日舉行的布爾塞維克黨的大會一致通過採用。再過幾個月，這個網領在事實上已成爲全國最大多數的工人和兵士所採用的了。

十月  
革命

布爾塞維克一天天得到更多的大衆的擁護；在彼得格勒，在莫斯科，在其他大城，在各工會裏面，在北方的軍隊裏面，在波羅的海的艦隊裏面，大家都起來擁護。到九月的初頭，布爾塞維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蘇維埃裏，也得到大多數的擁護者。無疑地在十月間，甚至在九月間，大衆已有壓倒的多數。尤其是在一切大城市，都已宣言擁護布爾塞維克。這是布爾塞維克革命的基礎，是十一月七日得到完全勝利的基礎。

在九月，伊里奇已在催促，認為武裝起事的最後階段已經來到了，在十月間，他的警告更為迫切，恐怕錯過了最適宜的時期，以致使大眾失望，反使反革命抬頭。

伊里奇從他的這時期裏的許多信上，或其他的傳語裏，屢次提及「延擱便是死亡的意思。」他鄭重地說：

我願用我所有的一切力量，勸告同志們說：現在已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了；我們今日的緊急問題不能用會議所能解決，也不能用什麼代表大會（乃至蘇維埃大會）所能解決，必須由人民來解決，由大眾來解決，用武裝大眾的力量來解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六日致中央委員會的信，見 Lenin, "Toward the Seizure of Power", Book II, pp. 144—145）

十月二十三日，布爾塞維克黨的中央委員會對起事作最後的決定，投票議決時只有兩票否決，其餘一致贊成。在十一月六日的夜裏和十一月七日的早晨，政權在完全有秩序的狀況中取得；臨時政府未得到任何方面的擁護，未有何抵抗，便被推翻了。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接收政權，成爲主權的機關，委任人民委員會（包括布爾塞維克黨

員)在伊里奇的領導之下，爲勞工階級新政權的委托統治者和農民大眾結爲同盟的普羅獨裁，就這樣地實現了。

我們先要了解最大多數人民擁護布爾塞維克革命，然後才能了解爲什麼最後的政變竟能這樣的迅速，顯然的安穩，在對方完全無抵抗中成功。這最後的政變，却是一個長期過程的頂點。在後來的內戰裏面，反革命的將軍們只有憑藉外國的軍械、津貼和軍隊，才能組織反抗，而且蘇維埃政府還能在種種困難中，在世界最強的軍力合併進攻之下，把叛軍完全打敗。這種事實都足以顯示布爾塞維克的十月革命是有着大眾的基礎。

自三月至十一月的八個月期間，顯示伊里奇的革命的領導之最高的水準和最緊張的猛進。他在這個時期裏的著作，是卡爾理論的信仰者進行革命和『起事藝術』之永久的經典。同時在那樣衝突紛亂的環境中，他還完成他的最重要的一種，名爲國家和革命；這本書闡明革命的卡爾理論在國家的形式和內容的緊急問題方面所應

取的路線，闡明社會革命的意義，同時對於機會主義者的曲解，（這是在社會民主運動中已在逐漸生長着的，）加以迎頭的痛擊。

鞠躬盡  
瘁的最  
後階段

以後幾年，伊里奇所要負的任務比前更大了，——但很不幸的是他的死使他不能親自完成他最後

的使命。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伊里奇被刺客槍擊，受重傷。（譯者按，刺客是一個反革命的社會革命黨的女黨員。）雖然他和死傷掙扎，仍得保全生命，繼續工作，但是這次重傷所遺下的結果，仍是他後來早死的主要原因。他的工作未得完成，但是他却把主要的路線規定下來，由他的後繼者接下去努力。

在一九二二年的春季，他的右臂和右腿麻痺，（按即所謂中風，）使他早死的致命的病症露出它的端倪了。他仍然繼續奮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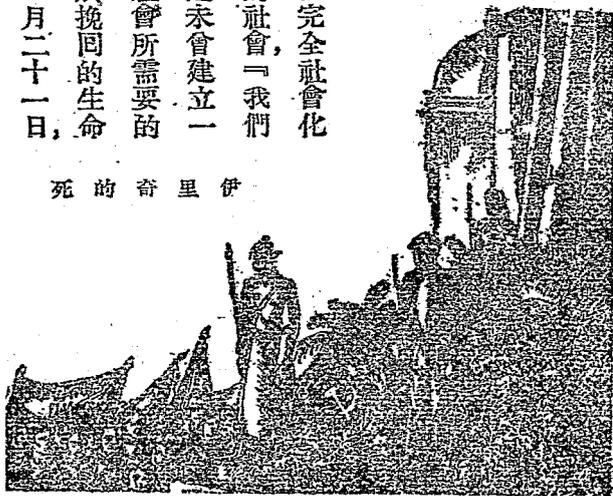
伊 里 奇 被 刺



他仍然繼續工作，但是他已不得不訴苦，說他不能再從他的過於疲勞的身體和腦子裏，得到以前一樣的反應。一九二三年的春季，病又第二次來襲，病勢較前次更重。在同年的五月，他還寫他最後的文

章。題爲論合作。指出怎樣進行『建立一個完全社會化的社會』的途徑；他認爲進行建立這樣的社會，『我們已經有了所需要的工具。……自然，我們還未曾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但是關於建立這個社會所需要的一切工具，却已經有了。』他對於已經難於挽回的生命的鬥爭，仍拖下去了幾個月，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他不得不去世了。

死的奇里伊



伊里奇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的最後階段的工作，即領導世界革命時期的工作，好像一個奇大無比的『托爾素』(Tolsto 無頭無手腳，只有軀幹的雕像)。在這個時期以前的幾個階段，他每次都在開始就提出所要努力成就的工作，陳述得明瞭準確，一點不模糊。他的這些陳述，在最初的時候，和他同時的人看來，往往覺得這只是一個瘋狂者的夢想，可是後來總是完全照他的計劃做到。他明白規定布爾塞維克黨的任務，認為這是一個工人的革命的黨，居於政治的革命的領導地位；他從來不許它變成一個宗派，他使這個黨和大眾以及他們的日常鬥爭和生活好像由百萬的帶子彼此聯結起來。這個概念已在布爾塞維克黨實現了；同時在別國的社會民主運動却陷入了機會主義的泥坑裏，或陷入了宗派的武斷主義。在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他明白規定怎樣使帝國主義的戰爭改變為推翻帝國主義的內戰。這個改變於一九一七年完全在俄國實現了。在俄國革命的開始，他明白規定怎樣進到第二次的革命，怎樣進到蘇維埃政權的建立，怎樣建立和農民結成同盟的普羅獨裁。這第二次的革命也於十月革命中完全實現。

了。在最後階段的開始，他明白規定怎樣同時進展到世界革命，在蘇聯實行社會主義的建設。這個工作他只是開個頭，定下進行的路線和方法。當他的領導地位在全世界上達到最高點的時候，正在進行改變全世界的時候，死使他的工作中斷了。這工作只得留給後死者去努力完成。

(The Life and Teachings V. I. Lenin, by R. Palm Dutt, 1934)



## 伊里奇的理論

現實和理論

伊里奇的理論，是卡爾的理論在我們的時代裏的繼續。他的理論和卡爾的理論一樣，都是不能限於任何和現實隔離的公式的體系裏面，如把他的理論放在呆板的敘述裏，不但要失去它的豐富的內容，多方面的聯繫，和活潑潑的生命，而且是和辯證法的特質直接相反的。辯證的研究法，是要就每個活的具體的形勢，根據它的特異的性質和關係，加以分析，運用社會發展的一般原則於特殊的具體的表現，以及隨後繼續應付所需要的特殊的行動。所以我們要了解卡爾的理論和伊里奇的理論，都不能由任何教科書裏面得到。第一，要就卡爾和伊里奇所應付的具體的形勢，細密地研究他們的生活、著作和活動；第二，要直接參加革命的運動，有意識地和舊的思想形式絕緣，努力把他們的原則發展起來，運用在活的現今的形勢裏面去。伊里奇和卡爾並未曾

留下什麼關於伊里奇主義或卡爾主義的『手冊』；他們却是在直接應付具體的緊急的問題之過程中，顯示他們的原則。

## 一 一般的世界觀

革命的  
辯證法

伊里奇和卡爾都認為，和每個人所處的特殊時代有關係的當前的革命的展望和實踐，也是要根據完全經過思考的、更廣大的、一般的世界觀和了解的。卡爾的理論是以辯證唯物論為根據。伊里奇也是一個辯證唯物論者。他的思想和行動，無論是關於人生的每個問題和每個關係，凡是他所定下來的目的，以及關於達到這些目的所用的方法，都是根據於下面的種種基本的了解：即對於『存在』和人生，對於人類的任務，對於歷史發展的法則，對於階級社會的情況向前發展所必有的形式和方法，對於所要達到的將來的世界秩序，對於控制自己命運的聯合起來的人類，都有着基本的了解。這給他力量，使他和布爾喬亞秩序中的短視的、唯利是圖的和沈溺於幻

的政治家及理論家，截然不同。他一生的功業，便是辯證法唯物論的正確和功效之有力的證明。

伊里奇曾經這樣宣言過：『卡爾理論裏面最重要的東西，是它的革命的辯證法。』（『有關於我們的革命的。』）辯證唯物論打破了以前的理論和實踐間的隔閡。它的世界觀的重要特質是：不但要發現現實的本質，並且要改變現實。因此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是具有革命性的。這個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對於一切問題都完全運用着辯證的辦法。這在伊里奇的全部生命中，有着最有力的表現。伊里奇指出怎樣向前達到將來的人類新型的途徑。

## 二 我們時代的理論——帝國主義

根據卡爾理論的活動，在一個一定的時代裏，是必然地要對於這個時代的特質，它的力量和衝突，以及進行的路線，都須加以明白分析。

煙

幕

就最廣的意義說，卡爾已顯示了人類社會在資本主義階段的特質；已分析過它的運動的法則；顯示了它進展到資本的愈益集中、階級的區分、大眾的貧困和增長的危機；並指出它的必然的結果是普羅革命和普羅獨裁，由此進行建設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但是當卡爾在世的時候，關於普羅革命和普羅獨裁的內容，必然地是仍屬於理論的敘述，以備將來的參考。——其中有個唯一的例外是關於巴黎公社的指示。

在卡爾去世之後，到了伊里奇的時代，資本主義才踏進了它的最後的、垂死的階段，普羅革命方才開始。

在最初，資本主義所踏進的這個新階段，有許多卡爾的信徒還未能明白了解。有許多新的現象開始在各方面出現，在這些現象後面的原則，還不清楚；有許多號稱卡爾的信徒，開始揚言這些事實已經否定了卡爾的預期，認為卡爾理論有修正的必要。合股資本主義的勃興，代替了以前由個人獨有的營業；這種傾向又使他們認為這是「資本的

民主化。』他們認為社會改良立法的傳播，和西歐及美國生活標準的改良，也足以推翻卡爾對於逐漸增長的階級敵對，和大眾貧困的說法。同時他們却驚駭於其他新的政策之發展，這些政策似乎和上面所指出的『社會的自由主義』恰恰矛盾；他們也驚駭於軍備與軍閥主義的猛進，繼長增高的關稅政策，對世界上各處殖民地的掠奪和殘酷；這種種傾向，他們都哀求避免，覺得和這時代的精神是相反的，並且認為這是出於資本家對於他們自己利益的誤解！這是一直到一九一四年，機會主義的『自由社會主義者』的見解；這和真正的卡爾理論是衝突的。

新時代  
的特質

伊里奇是第一人，把這新時代（帝國主義時代）的全部特質，很明白地揭發出來，並顯示這新時代的運動法則，這在他所著的帝國主義（一九一六年）一書裏可以完全看到的。

他分析這新時代的一切病象，直至抉出這些病象的基礎是在獨佔的資本主義。此競爭的，比較小規模營業的，自由貿易資本主義，（卡爾曾經分析過，）因為資本的愈

益集中發展到獨佔資本主義。(卡爾也曾預言這是必然的。)獨佔資本主義成爲近代佔優勢的形式，也可說是發展到金融資本。(這就是指大規模的「辛狄加」和「托辣斯」(註)在一個單獨的指揮之下，把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併合起來，和國家的機構密切合作，進行它的營業。)

和這個獨佔資本主義時代相應的，必然地有着新的資本主義政策的方向，和自由貿易資本主義的舊路綫相反：向全世界各處爭取獨佔，爭取剝削、市場、和特權的獨佔區域；由少數強國瓜分世界，實行積極侵略殖民地政策，關稅、津貼、和入口貿易限額；和殖民

譯者註：「辛狄加」原文爲 *syndicate*，是資本主義的一種聯合方式，由各企業聯合組成的，加入的各企業，出賣製成品，購買原料，都須經過「辛狄加」總機關之手；出品數量和提高價格等等，都由「辛狄加」來規定，雖則每一企業仍繼續着獨立的生產。「托辣斯」原文爲 *trust*，聯合的程度更大，各企業都完全合併起來；從前每一個企業的老闆，參加後都做「托辣斯的股東」。

政策有密切聯繫的資本的輸出；增強官僚的和軍事的機構；爲着世界的重新分割而往着世界大戰的路上跑。改良主義者只對於這些政策（關稅、或軍備、或殖民地政策、或戰爭、）作枝枝節節的攻擊，並不攻擊獨佔資本主義的本身，或是希望獨佔資本主義採用不同的「更開明的」政策，這好像希望老虎可以吃草過活一樣！

但是獨佔資本主義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的寄生時代。世界的大部分都變成極少數的大強國的附庸；人類的大多數都供一小羣金融寡頭政治的榨取。不工作而坐享的階級，靠紅利過活，和生產沒有任何接觸；這種寄生階級，在各帝國主義的國家裏發展起來了。服侍他們的人數一天天增加起來；從事生產工業的人數比例，却反而一天天減少。

同時在帝國主義的各國裏，有一部分「額外利潤」被用來收買勞工階級的上層分子；利用讓步、社會改良計劃、腐化勞工領袖等等方法。因此，在帝國主義的各國裏，發生「勞工貴族」和「布爾喬亞工黨」的現象；這些「工業」的領袖們，和資本家攜手進行，狼狽爲奸。這是歐美機會主義或改良主義的基礎，也是勞工階級運動分裂的原因。

但是獨佔資本主義的寄生的傾向既已顯露，它是將死的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之下的生產已達到了最高度可能的發展；它的更前的發展，現在已被資本主義獨佔的形式所阻礙，被用着人爲的方法所限制了。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的形式彼此發生了衝突。

### 三 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

伊里奇時常堅執地指出，世界革命勝利的最重要的鎖鑰之一，是在主要的鎖鑰的帝國主義國家裏的普羅門爭和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裏的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的解放鬥爭彼此聯合起來。

在原則上，卡爾已經說明過民族解放問題在勞工階級運動和世界革命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他討論波蘭問題和愛爾蘭問題的著作裏。

在帝國主義的時代，這個問題有着新的、更緊張的重要性。人類的大多數，都被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壓迫者。對殖民地的剝削，成爲布爾喬亞力量的主要的基礎。帝

國主義各國裏的普羅列達利亞特，必須和殖民地的人鬥爭，結成同盟，方才能夠得到解放。

舊的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完全不了解這個問題的重要意義。他們雖通過議案，贊成『民族自由』、『自主』等等，但總是拘守在帝國主義統治的機構內，對於獨立的革命鬥爭，並沒有給與實際的支持。還有一部分却爭辯着說，『民族自由』只是布爾喬亞的利益，不是社會主義者的利益，因此和勞工階級沒有關係；他們說，社會主義反對較大的經濟單位之分裂。（這一部分的爭論，伊里奇稱它爲『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這兩種傾向，在實際上的結果都等於擁護帝國主義。

伊里奇最先闡明這個問題在帝國主義時代所有的革命的重要意義。在世界大戰以前，他就已經密切地注意到亞洲鬥爭力量的勃興；在一九一三年，他寫了關於退步的歐洲和進步的亞洲的論文。在世界大戰的時期內，他對於這個問題的每一方面都下過一番分析的工夫，並指出『民族自決』的口號具有革命的重要意義。

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這個問題有着更重要的意義。伊里奇曾經這樣寫着：

在世界革命時代以前，民族解放運動只是一般的民主運動的一部分；現在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和世界革命時代開始以後，民族解放運動便是世界普羅革命的。一部分了。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V. I. Lenin, by R. Falm Dutt, 1934)

## 後記

我譯這本書的小小緣起和用意，已在開頭的話裏面略有說明了；把二校看完之後，覺得還有些意思要提出來說一說。

我向來有所寫作，都偏重於事實的評述；關於理論的介紹，這本譯述還是破題兒第一遭，雖則理論和事實本來就不能截然分離的。依我個人看來，——也許是由於我向來工作的性質或方向，——評述事實似乎比介紹理論來得容易些，尤其是比用翻譯來介紹理論來得容易些。因此，我在譯這本書的時候，時刻注意的是要盡量使讀者看得懂；倘若更能進而使讀者感覺到不但看得懂，而且覺得容易看，看得有趣味，那更是我的莫大的愉快！同時被羈押的老友李公樸先生聽到了我的這個願望，在我看完第一次校樣的的時候，他自告奮勇，說他願『代表』未來的讀者，仔細替我再看一遍；每遇有他認為不很

容易懂的地方，無論是一字一句一段，都很熱心地提出『質問』，我也很虛心地領教，認為有修改必要的時候，就盡量修改。我在這裏應該很誠懇地謝謝李先生。

張仲實先生的學識湛深，尤其是對於政治經濟學的造詣，是我所非常敬佩的，我的這本書的第二次校樣還請他很仔細地看過一遍。承他給我不少切實的指教，有好幾處的名著譯文，還承他對俄文原本仔細對了一下。本書裏用的畫像，有許多都是承張先生替我從各處搜集擁來的。他爲了我的這本書，費了不少時間和工夫，這都使我非常感謝的。

在羈押中寫作，不能多帶參考書，遇有需要查閱參考的時候，往往寫條子麻煩外面的幾位朋友，托他們代爲一查。受到我的麻煩的除張先生外，還有金仲華和胡愈之兩先生，我應該在這裏一併誌謝。

韜奮記於江蘇高院看守所

廿六年七月十五日炎暑中揮汗寫

# 讀 書 偶 譯

每冊實價國幣

元

著 者 韃 奮

出版者 韃 奮 出版社

總經售 生 活 書 店

重慶·上海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利後第二版

# 韜奮先生重生要譯著

- |               |         |
|---------------|---------|
| 韜奮漫筆（雜感集）     | 一九三一年著  |
| 革命高爾基（傳記）     | 一九三三年編譯 |
| 萍踪寄語（初，二，三集）  | 一九三四年著  |
| 萍踪憶語          | 一九三七年著  |
| 經歷（自傳）        | 一九三七年著  |
| 大眾集（論文集）      | 一九三六年著  |
| 坦白集（論文集）      | 一九三七年著  |
| 展望（論文集）       | 一九三七年著  |
| 再厲集（論文集）      | 一九三八年著  |
| 曙光集（論文集）      | 一九三九年著  |
| 讀書偶譚          | 一九三七年著  |
| 蘇聯的民主（英·斯隆原著） | 一九三九年譯  |
| 從美國看到世界       | 一九三九年譯  |
| 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     | 一九四〇年著  |
| 抗戰以來          | 一九四一年著  |
| 患難餘生記（最後遺著）   | 一九四三年著  |

3  
=4

1  
0.80

